

目 录

康乾中梵交往及其世界史意义：《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导言·····李天纲	1
英译者序言·····Fortunato Prandi	1
第一章 早年生活——难忘的布道——忏悔师的职责——决心加入教会——神秘念头——到中国去的命令——到罗马去——教士学院的驻留·····	1
第二章 到罗利托朝圣——罗马的警察——不好客的僧侣——圣伽拉的心脏——回到罗马——到卡布拉多索传教——族间仇杀——和解·····	6
第三章 前往中国——教宗的告别礼物——布隆那风景——布里克森的可怕造访——在科隆滞留——装扮——到达伦敦——英国女人——抽签决定圣人·····	11
第四章 航行去孟加拉——丢失行李——飞鱼——洗礼——刻板的安息日规定——捕捉鲨鱼——爬上桅杆——好望角——海外谈话·····	18
第五章 恒河口——僧侣的无知——招募传教士——给作者们的忠告——太阳崇拜者——圣多玛的预言——灵魂的转世——一个妇女修炼者·····	23
第六章 出发去马尼拉——奇迹般地逃脱——最真诚地传教——铎罗主教囚禁在澳门——铎罗之死——受命为皇帝画像·····	28
第七章 启程去北京——蜡烛山——中国挑伕——南赣河航行——烧香——鸬鹚·····	34



第八章	行医的危险——传教士的骄傲——弃儿——穆斯林	38
第九章	向皇上觐见——磕头——气候与服装——丰盛的猎物——中国火炉——北京描述	42
第十章	油画——中国人的精致——新年——家长的权威——嫉妒——代受惩罚——妇女裹足——访问帖子	48
第十一章	祭天——焰火——北京附近的皇宫——花园景致——中国式奉承	53
第十二章	中原、鞑靼和高丽的测量——命令刻印——跌下马来——满族大夫——水疗	57
第十三章	长城——热河附近的山——尝试刻印——热河描述——皇上的行宫生活	61
第十四章	皇上的随员——小猎——猎鹿——猎虎——摔跤和箭术——营地里的寂静	65
第十五章	中文字——皇帝的赏赐——基督宗教的危机——谈话——严格的纪律——废黜太子——皇上的六十寿辰	70
第十六章	公众的欢庆——各省代表——草莓和芦笋——第一个学生——中国人对胡须的看法——俄罗斯教士	75
第十七章	对瘟疫的恐慌——蒂里希神父之死——基督徒中的警报——皇帝的确认——他的贪婪——中国学院的起源	80
第十八章	妇女小教堂——中国人的嫉妒——德理格被捕——针对学校的图谋——路西奥——般若望退出——般若望父亲之死——般若望归来——一个梦	84
第十九章	俄国公使到达——礼仪要点——皇帝的声明——彼此妥协	90
第二十章	招待伊斯梅洛夫伯爵——宫廷晚宴——对欧	

	洲传教士的赞颂——礼物——皇帝给沙皇的劝告·····	95
第二十一章	皇帝在床上——热河生活——一种报答——艰难生存——希普病了·····	100
第二十二章	康熙皇帝之死——葬礼——惩罚两个高官·····	104
第二十三章	把欧洲人驱逐出宫廷——密谋——皇太后之死——困难重重——最终决定离开·····	109
第二十四章	准许离开中国——告别礼物——离开北京——便宜的旅行——多样化气候——到达广东——资金困难——超自然的使命——主的显现·····	115
第二十五章	驶往英格兰——中国人遇到麻烦——留在风暴中——又来了——中国人的忠厚——爱德蒙·戈德弗雷先生——代替指南针——匿名的慷慨解囊·····	120
第二十六章	在戴尔下锚——小艇船夫的强索——海关职员贪婪——民族纪念物——国王乔治一世的慷慨解囊——东印度公司经理——爱德蒙·戈德弗雷先生——驶向利伏诺·····	124
第二十七章	到达那不勒斯——圣亚努阿里之血——准许建立中国学院——接受两个中国学生·····	129
第二十八章	两个中国学生的考试——他们去中国——殷若望之死——尤路西奥的逃跑——逮捕和审讯——规避和再次被抓——神秘的结尾·····	133
	结语：参观马国贤神父创办的那不勒斯中国学院·····	138
	附录：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陈 垣整理 李天纲校点	141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陈 垣	142



一、康熙为白晋事谕多罗朱笔	145
二、康熙朱笔谕多罗凡今年来明年去之人不得在内地居住	146
三、康熙教西洋人带信与多罗说	147
四、康熙在苏州谕众西洋人	148
五、康熙为多罗事传旨与众西洋人	149
六、康熙朱笔删改德理格马国贤上教王书稿	150
七、康熙面谕德理格并德理格誓词	152
八、康熙谕广东巡抚调查费理薄等是否系教王差使	154
九、康熙谕新来西洋人探问艾若瑟去信消息	155
十、康熙谕利国安	156
十一、康熙于嘉乐来时面谕西洋人	157
十二、康熙为德理格不写名字谕嘉乐	159
十三、康熙朱笔删改《嘉乐来朝日记》	160
十四、教王禁约译文并康熙朱批	169

第一章

早年生活——难忘的布道——忏悔师的职责——决心加入教会——神秘念头——到中国去的命令——到罗马去——教士学院的驻留

1700年，我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游逛了一天，无所事事，来到维萨戈尔宫(Vicergal Palace)前面的开阔地带，正好看见一个方济各会的僧侣攀上长凳，正要向人们演讲。当时我只有18岁，尽管很年轻，但生活的走向说起来却很难不让读者们感到吃惊。幸运的是，在我深陷恶习时，还能怀着愉快去倾听宗教说教。我倒不是想从中获得益处或教诲，而仅仅是好奇。布道人拿出《圣经》，读起了《阿摩斯书》：“为了大马士革再三再四犯罪，我不收回成命。”他证明说，有几种原罪，神是会宽恕的，除此几种罪恶以外，就概莫能教了。用这些证据，他提供了道德戒律。在此，布道人带给了我们一个美妙的天平，左右平衡，最最小的一点点添加，就会翘起来。“所以”，这位可敬的神父说：“如果原罪已经平衡，那么我们把保证不犯的下一个错误再加上来的话，天平的横竿就会跌落，把我们定在内心的地狱中；还有，我们并不知道天平何时平衡，如果违犯行为是冒着受到永久惩罚的危险，那就是罪有应得了。”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幅具象的图景。它是一缕天堂之光，让我觉察到自己正行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我想我是看到了上帝在上警示着我；同时，地狱之苦又在下面等着接收我。从恐惧中恢复过来后，我感受到了长久显露着的，而我自己一直没有好好想过的危险信号。我热烈地感谢全能的上帝把我召唤进



他的怀抱，并满心悔恨地下了决心，要把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他的事业。为了巩固我的想法，这个方济各会上刚刚结束了他动人的讲道，我就马上去附近的“印度使徒”（Apostle of India）——圣方济各教堂。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个耶稣会士。按天主的意愿，他正在众人之中传播同样的道理。我非常荣幸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我在暮色中回到家里，考虑着如何才能最好地为天主服务。我感到了一阵冲动：不但是要加入教会，还要多做些什么，尽管我不停地沉思默想，却还是不能想出个所以然。我想要加入某个修会，但还没有哪一家能激动我的灵感。我想象在充当一般布道人的时候，或许会找回宁静，但这并不能满足我的内心渴望：就像一个饿人，吃到美味佳肴，若是半饱，反而食欲更强。尽管还不知道这里的“更强”到底意味着什么，单单根据这强烈程度，我就感到寻找一个常规传教新团体的强烈愿望，尽管我对这样一个团体的情况所知甚少。我没有把这情况告诉任何一个告解神父，因为我对宗教事务太无知了，以至于根本不知道在这类德行上需要有人导引。在这无知状态下，我又活了八个月。今天找这个神父告解，明天找那个，也没有碰到什么人能够费心指导我的路向。那些仅仅听听罪人说话，又不努力给他们面临的问题指明出路的告解师的错误，就应该由天主去解释了。好在很幸运地结识了唐·尼阁罗·维尼西亚（Don Niccolò Vinaccia），他推荐我去读塞勒斯的圣法朗索瓦写的《费罗帖亚》（*Filotea*），从中我得到了所需要的灵性指导。1701年5月10日，我听从唐·尼阁罗的建议，第一次向虔劳会（Order of Pious Labourers）的安东尼奥·托勒斯（Antonio Torres）神父作了告解。我向他公开了自己的愿望，要加入教会，并听取他的意见。这个仁慈的人像往常一样拥抱着我，听到了我这告解，他忽然松开双手，盯住我看了许久，没有一句话语，然后又重新合抱住我，带着狂喜，还是没有问任何问题。正如告解师们必须处处安慰他们的告解者，他说：“好，我的儿子，加入神圣修会，如此我就能成为你的教父。”多么高兴啊，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我的



灵性导师。

经过教父的批准，同月26日我加入了教会，还加入了圣洁玛丽亚会(Holy Mary of Purity)。我开始了一种积极的生活，尽全力推动我身边的各种救恩。可是，我还时时刻刻感到一种冥冥中的召唤，想建立一个宗教团体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为了天主的荣耀，我们有责任报偿他美妙的创造之功。我一定要把那些降临于我身的召唤，与这样一个团体机构联系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不太轻松，我不得不和一个病得很重的年轻神父到蒙塔纳拉(Mentagnala)去换换空气。我们在那里待了大约六个月。我的伙伴是一个杰出的年轻人，因为费心改进了精神状态，我可以大胆地说：感谢他的好榜样，我度过了一段值得嘉许的时间。一天，正当我的朋友在他的房间祷告，我则在自己房间祈祷时，一种燃烧般的冲动抓住了我，要我退回到某个地方，以便能够取得一个神职者必要的知识，那一刻，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声音震颤着我的灵魂，说：“到罗马去。”

我被这敬畏所震撼，同时深深地印入脑海。这神秘的声音多么奇妙，伴着光怪陆离，形形色色的事物淌过我的眼前，不是以那种肉体的或精神的形式，而是以那种我难以描述的，纯粹知性的样态。此时此刻印入我脑海的，日思夜想要建立的那个机构，是由长期布道者组成，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专心致志地祈祷、研究和布道。为了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还应该另有一个像“虔劳会”这样级别的教团，来满足他们的不时之需。例如服装，那些第一流的教团，应该和其他宗教团体的穿着有所不同。不用头罩或帽子，但总要有冠戴；不穿鞋子或便履，却也要有另外式样的裹足。这个幻影一闪而过，但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尽管它发生在三十多年前，我却仍能清晰记起，宛如昨天。

22周岁的时候，我应了托勒斯神父的紧急命令到萨勒诺(Salerno)去受领神父圣职。临行之日，当我前去向他道别时，神父吩咐我回来后就从虔劳会士开始见习期。尽管我回答说无意于这样一个位置，他还是坚持要我无条件地服从他。我满足了



他的意愿，可是随后在路途上，脑子里却一直缠绕着被迫成为虔劳会士的事。尽管我曾经对那个修会有过最强烈的崇拜之情，但现在却感到了哀伤和沮丧，甚至不能继续前行。但是，我决定还是服从托勒斯神父，一回到那不勒斯，我就向他报到，要一个差使，开始我的见习期。神父刚从罗马回来的第二天，还被他的告解者们团团包围着。一看见我，他就说：“早上好啊，好人。准备去中国吧。”

我惊呆了，搞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中国的事情，我一点都不了解。托勒斯神父觉察到这些，解释说：中国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度，在根据《福音书》行事的虔劳会士看来，他们都生活在异教的黑暗中。在位教宗克莱芒第十一（Clement XI），想救治这班妖魔，最近在传信部里附建了一个学院，给那些欧洲籍的教师们教中文，让他们把神圣的福音之光带到那些晦暗的异教徒中。按教宗的圣谕，要他专为此事送几个见习生去罗马。

托勒斯神父道完这些后，我脑子里的一头雾水消失了，现在我恍然大悟，这正是天主一直召唤我所要做的事情。剩下我们两人独处时，我又问他的话是玩笑还是当真，如果是后者，我就可以按意愿去中国了。“不管你是否愿意，你会到中国去的。”他答道。

“如果为了到中国去，加入罗马的这个学院，那什么时候我能通过您的见习期呢？”我说。

他开始没有理解我的问题，因为他忘记了要我当他的虔劳会士。当我提醒了他以后，他回答说：“虔劳会士，虔劳会士！天主已经命中注定了你要去中国。”

这使我高兴极了，回家的路上我神清气爽，脚好像不是踩在地上。

1705年11月26日，我和一个卡拉布兰会（Calabrain）的神父任掌晨（Don Gennaro Amodei）一起去罗马，他也是被托勒斯神父提名到中国去的。30日，我们到达目的地，被将要派我们去中国的会长们，还有教宗，友善地迎了过去。传信部还没有把住的房间预备好，我们就在一个小旅馆住下。但是，住在这种地

方对教士们来说不太文雅。更有甚者,当我们没钱付给房东时,我们只能到“教师学院”(Ecclesiastical College)寻求庇所,来解决问题,那是教宗英诺森第十二(Innocent XII)为救助那些因住房危机而露宿街头的教士们所建立的。即便如此,每月还是要为食宿付出大约20先令。我们除了做弥撒每天得到5便士外,对凑齐这笔数目一筹莫展。没有办法,为了付出余下的钱,我只能怀着羞耻和不情愿,去请求救济院。

如此这般,我就只能尽量省吃俭用。衣服自己缝补,晚上洗掉唯一的衬衫,甚至睡在草席上。因为这些,我落下了可怕的风湿病,深受折磨。困顿之中,我们请求教宗的帮助。教宗给我们每月10先令,正好够得上我们的需要。在教师学院留住期间,我们意识到建立一个有条理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就把一天划分成学习、告解和做其他事情的不同时间段。晚上,经过严格的自省后,我们相互间作告解。任掌晨跪在我面前,谴责自己所犯的过错和所受的诱惑,吻我的脚。然后我也对他做同样的圣事。任掌晨是一个最杰出、最虔诚的青年,有各种天赋的德性。他用最精细的审慎看管着精神上的纯洁,鹤立鸡群。不幸的是,有时他被自己的宗教热情带得太远,尽管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却坚持靠粗茶淡饭活着,遵行各种各样的禁欲戒律。



第二章

到罗利托朝圣——罗马的警察——不好客的僧侣——圣伽拉的心脏——回到罗马——到卡布拉多索传教——族间仇杀——和解

有一天，在圣餐前祈祷的时候，我们哀求着天主赐予的在传信部的房间快点备好，我们俩都为—一个炽热的愿望所焕发，即向圣母寻求眷顾，到罗利托(Loreto)去做一个朝圣。获得会长的允许和教宗的祝福后，我们上路了。

朝圣的第一天，我们唱着赞美歌——任掌农非常擅长的歌曲——到达了甘多尔弗城堡(Castel Gandolfo)。一个骑马的绅士被我们的行为所感动，赶上我们，一定要我们用他的马匹。在他的好意被断然拒绝后，他又坚持要我们至少在他的房子里歇息。我们就依了，他给了我们一顿丰盛的大餐以及舒适的招待。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市民城堡(Civita Castellana)——按朝圣规定落宿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幸运。在那里得不到晚餐，还只能睡在草褥上，也没有被单和毯子。

在途中另一个已经忘记了名字的地方，我们到一家商店去买些食物。在等候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柜子，放进去两支手枪，主人却没有看见。不久来了几个城堡督管，直接走到柜子前，取出手枪，以私藏武器的罪名把乳酪商抓了起来。这个可怜的人不断说自己是冤枉的，但是没用。他们把他铐了起来，要把他关进监狱。因为见证了事件全过程，我们当即就向城堡督管们替这囚犯作了证，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说

的。不过我们的话在管制这个地方的主教那里较有分量，这位受伤害的人被释放了。他和他的全家都过来，以天主的名义，感谢我们从如此危急的险境中救了他。

朝圣开始时，我们每天步行 20 英里。但是因为任掌晨越来越虚弱，老是在发烧，我们花了 40 天才走完了别人可能只需不到 14 天就能走完的路程。除了他和我的行李外，我还常常不得不背着他走上相当一段路程，特别是上坡的时候。最后他变得如此虚弱，以致于倒在雷蒂（Rieti）地方的树林里，说自己再也不能继续走下去了，尽管当时我们在平地上，并且只有 2 英里就可以到就宿地了。我心怀忧伤，觉得有必要离他而去，去寻找帮助。在离那地点不远的地方，我发现一间农舍。可当我敲门的时候，一群狗围住了我，发疯般地狂吠和撕咬我。农人就在边上，他把我当作了贼，用石头和辱骂对付我。我费尽口舌向他说明我不是个贼，而是一个寻求他帮助的神父，求他去救一个垂死的人。最后我成功了，他带了他的驴子，把我的朋友驮到一座女修道院。按了半个小时的门铃，才现出了一个门人。然后有一个僧侣气冲冲地出来，叫喊道：“啊，是你啊，是吗？是你敲了这么久的门吗？”他“砰”地把我们关在门外。

遭此对待，我们都吓坏了。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个可恶的僧侣又开了门，用一只粗瓷盘子，给了我们几滴醋，还有两片面包。那个面包黑得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弄到了食物，但还在找住处。他打断我说：“你要么就拿着，如果你愿意。”他又一次使劲地在我们鼻尖上关上门，消失了。

于是我们走到修道院的教堂里，把自己委付给了天主，在祈祷中等待天主神迹的降临。幸好来了一群仁慈而诚恳的女士，看到我的伙伴精疲力竭的样子，就和我们攀谈起来，表现出深深的怜悯，并问我们为什么不到修道院里去休息并恢复一下精力。回答了她们的问题后，教堂里出现了一个手持蜡烛的神父。女士们告诉我们，他是本修道院的守卫僧侣。我立即赶上前去，求他赐给我们一晚住宿。他明白了我的意图后，马上逃走了，好像我就是魔鬼一号（Evil One），对我的话语没有丝毫同



情。过了一阵,就是那个在门口粗暴对待我们的僧侣过来了,把我们带到底层的一个小房间,给了一顿非常糟糕的晚饭。我们告诉他,已经吃了一些行囊中的食物,倒是要借点灯光,读一下我们的告解文。他严厉地斥责了我们,说我们的建议正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还没有从羞辱之中平复过来,为了愉悦天主并安抚我们,那些与我们交谈过的女士们,给我们的小房间派来了一个跟班和一个仆人,他们带来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刚吃完美味,我就去感谢女恩主们对我们的慈善举动。我发现她们都在教堂的门券下,围坐在一张奢华的桌子前,款待着那个守卫僧侣以及另外几个同会神父。次日早晨离开前,我们渴望向他表达承蒙招待的感激之情,尽管我们在修道院里找了很久,却还是没有见到他和他的僧侣们。

遍尝艰辛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罗利托,访问了圣屋(Holy House)和其他教堂。在此当中,有一座蒙特佛科教堂吸引了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它保存的圣伽拉(St. Chiara)尸体是如此地栩栩如生,她的手和脸之新鲜、红润就像是活的一样。我们仰慕着她那被打开了的心脏。并且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我们在那里一个浅浮雕上,看到了天主的情感体现,我们看见了天主就在十字架上。对此我必须完整地说,当我躺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小教堂那里的岩石下面,等着轮到我来读弥撒的时候,我从天主那里收到了他的原罪的赦免。一条巨大的毒蛇自上而下,靠近我的脸,但立即爬走了,没有对我做任何伤害。

经过40天的朝圣,我们回到了罗马,任掌屣的健康状况接近于半死,他去了教士学院的医务室。一场严重的疾病后,医生送他到那不勒斯去作康复。

一个人孤独地留在罗马,我就努力地申请去学伦理神学。在大斋日(Lent)那天通过了必要的考试之后,我被送到卡布拉多索去传教。在我的传教事业中,见证了各种富有教益的例子。下面的例子,显示了具有不可言说仁慈的天主,是如何被我

年轻的热情所感动,乐意调解一场举族若狂的家族内的死仇。

在那个地方,一位老人有6个儿子,他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个谋杀了他第七个儿子的侄子。无论是几个神父的劝告,还是巴贝罗尼大主教的权威,还有其他显赫人物的干预,都不能成功地使他们重归于好。不幸的谋杀者日夜在山里和树林间躲藏游荡,以逃避追捕。许多人都告诉我这个情况,恳请我能尽力让这个家庭平和下来。逃亡者本人由他的几个朋友陪伴着,都拿着武器,晚上借夜色下山,恳求我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一直等到复活节,知道那天叔叔和堂兄弟们会来作告解。堂兄弟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我跟前来了,我劝他们平和下来吧。他们都回答说,他们都已经不再对行刺者怀恨在心了,但是父亲掌握权力。如果能得到他的允许,他们都准备宽恕。最后,父亲也来作告解了。我劝告他很久,他说自己并没有从对侄子的仇恨中得到什么乐趣,只是想要求个公道。我马上知道在他狡猾托辞下的真实心思,因此就让他重读天主的祈祷文。他读了,并没有对我的用意起疑心。当他读到:“原谅了我们的冒犯,就像我们原谅了他们对我们的冒犯一样。”我希望他解释这段话的力量和意思。就此,借着神圣的恩典,他忽然泪如泉涌。他回复镇静以后,答应为了耶稣基督的爱,原谅和宽恕他的侄子,第一次愿意见他。我怕他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感情冲动,而不是神圣的意愿,就暗中给这个逃犯侄子捎信,让他在某一天我准备讲解“对敌施爱”的题目时,于当晚把自己藏在钟楼里。布道的过程中我会叫他,有这里的院长和他的朋友们陪着,他不用害怕前往。

在神的帮助下,我的努力得到了快乐成果的最高酬报。大约到了黄昏,我在受伤害的家族全体出席的情况下,结束了关于爱仇敌的讲道。我宣示说,妇女们可以和平地回到家中,男人们所应做的只是保持苦修。随后我敦促说,教会的大门将要锁上,在一个简短的话语中我劝告他们自我鞭策。说完这些,我把事先安排好的五花大绑的犯人从圣物储藏室中带出来,置于两个点燃的圣火之间。与此同时,我又重复了我在布道中提到的



最有说服力的要点，并敦促全体教徒按他们听到的去实行，相互原谅，用和平的方式相互拥抱。许多曾经有争端和分歧的人们来到我的跟前，相互拥抱。全体教徒都含着热泪，感情和情绪是如此热烈。我观察着他们当中那个谋杀者的叔叔，叫了他的名字，他立即前来，跪在我的面前。我问他在这样的场合，是不是愿意原谅他的侄子。他用认真负责的口吻回答说是。我询问他，如果他是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来承诺这件事的话，天主的形象就会在他的手中掌握。他满怀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我让他大声地重复了好几次。然后，为了他对基督的爱，为了他赐予宽宥，原谅了那曾经伤害他的人，并把大牺牲献给天主，我以天主的名义祝福了他、他的家族和他所有的亲戚朋友。最后我问他，此时此刻，如果他那该受惩罚的侄子，为天主的爱，跪在他面前请求饶恕，他会做什么？他回答将欣然地接纳他。随后我就发了一个信号，这个冒犯者被院长押到我的面前。看见他过来的时候，人群中的抽泣声更响了起来。老人大吃一惊，因为他背对着门口站着，一时没有看见他的侄子，等到他看见的时候，他的侄子已经跪在他的脚下，以天主之爱的名义，请求原谅。老人开始无动于衷地站着，还没有缓过神来。他看来是被这不平常的场面弄得手足无措了，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努力地让他冷静下来。我手持耶稣受难像，重申着我的观点，要他原谅。终于在天主恩典作用的敦促下，他突然拥抱了他的侄子，亲吻并宽恕了他，还给了他祝福。他的儿子们马上都随着他，一个个地抽泣并抹着泪拥抱了他们的堂兄。此时此刻，教堂里所有的信徒都泪流满面地赞美着天主。

第三章

前往中国——教宗的告别礼物——布隆那风景——布里克森的可怕造访——在科隆滞留——装扮——到达伦敦——英国女人——抽签决定圣人

回到罗马不久，教师学院院长就去世了，我被任命来继承他的位置。我进了新办公室没几个月，教宗收到了铎罗先生(M. de Tournon)的好消息，他作为教宗的使节去到中国后，受到了皇帝的热情款待。教廷决定给他配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并加派一些传教士。教宗因此任命了在罗马佛罗伦萨圣乔万尼会(San Giovanni de Fiorentini)教区的神父芬那利博士(Dr. Funari)、图卢兹奥古斯丁会的(Augustine friar of Toulouse)山遥瞻神父(Father Fabri Bonjour)、卢卡小辅祭者会(Chierici Minori of Lucca)的庞克修神父(Father Ceru)、圣母会(Order of the Mother of God)的潘如神父(Father Perrone)，以及鄙人我。此外，还有一个从萨勒诺教区埃佛利(Evoli)来的俗世传道人，另有一个名叫顾阿玛尼(Guarmani)的绅士作为外科医生随行。

任掌屣也是一个世俗传教人，并没有被包括在这份名单里，因为他不在，并且身体不好。我告诉他这个消息后，他给传信部主任萨克日潘特枢机主教(Cardinal Sacripante)写了一封信。此信与其说是墨写的，不如说是泪写的，写得如此动人，以至于教宗和枢机主教都非常感动，立即让他参加到我们当中。他来丁后，我们都被允许亲吻教宗的脚，并接受他父亲般的祝福。在向我们作了庄严的激励，并要求我们全心地实现我们的

神圣使命后，教宗给了我们每人一个银奖章，还有免罪的临终声(*articulo mortis*)。他还授予我们全体成员每月一次完全宽免；每星期一次的特别祭典；发放五千个一般宽免的祝福奖牌、受难十字架和念珠的权利；我们这次旅途中相互告解的特权；给予完全宽免的临终声权力，这些不需要可能会丢失的受难像，而是用我们自己的人格；最后是旅途中根据投票的多数来决定疑难问题的权力。枢机主教的帽子和传信部书记的指示交给了芬那利博士。他还带有指示令，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不能完成其使命的话，就要将之交给下一个资深的使节成员。

10月13日，我们出发去伦敦，希望东印度公司有船能够带我们去中国。在布隆那，我们去了一个显赫人物的居所，向他呈递了传信部书记以教宗的名义写的几封指示信。这个人读了这些信后，以很不情愿的口吻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芬那利博士告诉他，如果有一些施舍能支付使团的费用，我们将感激不尽。刚听到“施舍”一词，这个人就大发脾气，一点都不能自持其态，他骂我们，赶我们出门，好像我们是什么骗子似的。我强烈抗议他的举动，维护我们的尊严。我让他知道，从他读过的信里一定了解到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我们会立刻把在这里受到的待遇报告给我们的上级领导。他给了我们20个意大利金币(*sequin*)，大约合七英镑，并带信说他对我们充满敬意，我们就不必写信给罗马了。

我们从波伦那(*Bologna*)经过了曼图亚(*Mantua*)，到了著名的城市特兰托(*Trent*)，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德语的声音。继续往前走，跨过了蒂罗尔(*Tyrol*)的高山，我们到达了爱各拉(*Egra*)，那是一个小镇，他们用那种不打开的玻璃窗，住在用板拦起来的房间里，用火炉取暖。第二天我们到达了波尔萨诺(*Bolzano*)，见到他们在教堂的空地外安葬死者，在坟头安装了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面还挂了一盆圣水。此后的二天，我们到达了布里克森(*Brixen*)。当时，卡布钦斯(*Capuchins*)的教堂正在举行弥撒。芬那利博士忽然得了中风，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惊愕与悲伤，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这次可怕的打击之后，他被迫回

到意大利，并把枢机主教的帽子和随身文件都交给山遥瞻神父照看。

10月15日，我们到达了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一个小而美丽的城镇，有着其他奇妙的东西，一些铜做的坟墓，非常引人注目。然后我们到了梅特伏尔特（Metvolt）。再去了奥格斯堡（Augsburg），于19日到达。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一个女教士，是其中一个新教传教士的妻子。第二天，我们又出发去法兰克福（Frankfort），花了七天的行程，安全到达。我们沿路看见的房子，都没有墙基，墙体的下半部，是由石头和灰浆砌成的，其他的剩余部分是由泥土和秸秆构成，用一些细木条做桁梁连接起两部分。教堂的顶尖是圆形的金字塔状，塔身是一个非常尖的锥体。教堂的下半部是砖木结构，上半部则是木头的。

从法兰克福，我们从水路到科隆（Cologne）去。在这里，收到了州务卿的一封信，通知我们说，因为从伦敦到中国去的船只载不下我们所有的人，教宗命令我和任掌晨回罗马。但是，我们又同时听说仓位不够的消息是假的。实际上我们被召回，是因为陪同人员中有人打了一个污蔑的小报告。我们决定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并在科隆等候进一步的命令。我根本不能表达出我感受到的被排除出自己满心欢喜所加入教团时的悲惨心情。我彻夜不眠，那一天我什么都不做，只是躺着。和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常常被迫离开座位，退到我的房间里，发泄郁闷。幸好，芬那利博士和我们意外分别后，天意般的就像是不可思议地设计好的那样，在最佳时机回到罗马，为我们作了辩护。

经过此次陈情以后，我们得到允许继续行程。我们把自己装扮成俗世人，并在12月23日离开科隆去哈格（Hague）。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一群人被发现都是传教士，英国使节就拒绝给我们护照去英国。教宗、潘如神父和任掌晨把我们一行推荐给孟斯特主教，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以假名成功地取得了护照。1708年1月3日，我们从鹿特丹起锚，开赴英国。7日，我们安抵伦敦。第二天早上，我们赶快去拜谒威尼斯公使西格诺·考那罗（Signor Cornaro）。他以最大的善意接待了我们。没有浪费



一点时间，我们就随潘如神父和大使先生到东印度公司去敲定一艘带旅客到中国去的船。但是因为严厉禁止捎带任何神职人员，公使就告诉公司，说我们进入中国只是要去为皇帝服务。任掌晨是数学家，我是画家，潘如神父是我们的仆人。看见潘如神父站在我们俩面前，帽子拿在手里，向我们作出一个仆人应该对主人作出的尊敬之态，确实是很有趣的。这位经理是个警惕的人，对我们的解释显得并不满意，并说他们可以相信我和任掌晨是俗世人，但潘如神父不像。他特殊的穿戴和举止，眼神望下，双手总是插在袖管里，种种迹象使得他们认定他是个教士。于是他们就问公使先生潘如是不是个耶稣会士，而在回答的时候，大使早就准备好了发誓给予否定的回答。就这样他们给了我们登船的允许，即可搭乘公司一条名字叫做“董那高号”（Donegal）的预定要去孟加拉的船只。

取得了船位后，我们三个在荷兰加入的伙伴：山遥瞻、庞克修和顾阿玛尼，以相似的方式提出了他们搭船的意愿。尽管公使有兴趣，他们还是几次三番地被拒绝了。同时，顾阿玛尼拒绝继续走下去，他装作病了。公使只是为两个新增的人提交了必要的许可申请，最后也被恩准了。

在我们等待“董那高号”预定出发的日子时，有消息传来说詹姆斯国王（King James），即“觊觎者”（Pretender），当今女王安娜（Queen Anne）的兄弟，带着 15 艘战船，已经离开了法国，要去重新占领苏格兰王国。他的父亲詹姆斯第二，为了宗教的原因被迫逃离，到法国寻求庇护。安娜女王立即下令所有英国船只都不能出港，否则将被课罚重款。还有，所有在首都的天主教徒都必须关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公使要我们不要延误，赶快登船。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护照，女王和东印度公司也就允许了。

2月11日，我们急急地坐了一条小船，驳到在泰晤士河下锚的“董那高号”，大约有 20 英里远。“董那高号”只有 180 吨的载重量，铺位全满了，只有向船员们要求几个额外铺位。结果，我马上在舵仓的桁梁下面有了一个铺位。轮子从一边到另一边

剧烈地晃动，睡觉的时候让人害怕得要命。但是我在整个旅途中遭受的最大不便，却是因为老被暴露在视线中，而水手们又傲慢无礼。水手们一直待在船体的这一部分，吃、喝、唱、玩，或是洗手，造子弹，还有一些其他同样性质的事，无休无止。我的床正好是在火药库的上面，几乎每天我都发现它被扔到某个角落，上面放了枪枝、木桶或缆绳。这张床还经常被啤酒、烈酒弄脏，有时爬满了寄生虫，有些水手还躺在上面。然而我还是能够承受这样或是那样像登错了船般的其他悲惨和烦恼，正如每一个决心承受这种生活的传教士所应该做的。但比这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靠近我床的是三个职员的铺位，四个月里，我们还逗留在泰晤士河上，他们的妻子们还经常来造访。那些知道英国妇女是如何放纵自己自由权利的人，就可以理解一个被迫要留下来日夜陪伴的可怜的传教士必须要忍受的是什么。其中一个女人的行为是如此的不要脸，以至于她丈夫刚刚离开，她就有一副最不名誉的举止。

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诱惑之事，好在只限于轮船抛锚时持续的四个月。轮船一起航，万事严格，井然有序。比较而言，这艘船看起来还有点专制。

选择几个圣徒或许能在航程中保佑我们，于是我们几个人集合在一起，通过了以下的方式。我们同意每人都在三张纸上，分别写下圣人的名字，然后把这些人一个盒子。谁的名字被首先抽中三次，他就是我们的主保。抽出的第一张纸，上面的名字是圣若瑟，第二次还是他。第三次是圣保禄，第四次又是圣若瑟，于是圣若瑟被宣布为我们的保护圣人。选好了主保以后，我们决定在航程中履行宗教义务的顺序如下：早上，独自静默祈祷，宗教阅读和自我反省。然后是背诵教士巡回布道文，圣徒连祷文，一章殉教史，一章《圣经》。每个星期二和节日的下午是一些灵性阅读，接下来是我们个人的自省和反思，再接下去是背诵圣母连祷文。晚上，在自我反省后，如果有谁发现他已经侵犯了某位兄弟，他就会当着其他人的面，请求原谅。星期三和星期五，举行一段违背讨论，每个人都一一地告解自己的原罪，并为

他人祈祷,提及他的过失,大家就能够理解他。我们还为道德事件举行会议,每个人轮流着说。只要我们有两人以上聚在一起,就应该用拉丁文。

大斋日近了,我们开会来决定是否要遵行。我们的疑虑主要是来自当时的环境。由于仍然被阻留在泰晤士河里,我们每天都可以得到鲜肉补助。此外,我们自己分开做饭并不方便,除了咸鱼和一点汤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山遥瞻、潘如、任掌晨的意见是我们应该谨守大斋日。我和庞克修坚持相反的看法。最后,少数服从多数,随后就持守了大约一个星期的大斋日。当确信节食活动这样坚持下去,会毁坏我们的健康时,我们一致决定停止守斋。这一事件为我们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提供了一个警示:要规范过度的热情。天主当然不希望我们做任何会打断执行他的直接诫命的事。一种宗教生活无疑需要许多禁欲和苦行,但是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必须相机而行。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摄生法造成了不能履行自己重要职责的后果,这就会是一种有罪的轻率。

我们被注定了还要经历进一步的耽搁和失望。3月3日的晚上,来了一艘小船,政府命令强行征用我们的部分水手直接为女王效劳。其他在我们周围下锚的船只,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配备13艘船只去抵抗那些正在泰晤士河口游弋的船只,当时怀疑它们是法国人的武装劫掠船。水手们被夺去后,我们就担心出发的日子将会延续到下一年。接着传来法国军舰带着“覬覦者”登陆苏格兰的消息,我们的这种担心更是加剧了。这样,本来是要捎带我们的商船会变成军舰,受命去抗击法国舰队。因为所有商人都不得离港,泰晤士河里面不久就挤满了大小船只,仿佛是在波涛之上又兴起了一个伦敦。这一美妙的场景,充分展现了英国人在海上所拥有的宏伟的和破坏性的力量。

伴随着这种焦急而恼人的状态,马上又发生了另一个震惊我们所有人的事件。爱尔兰主教和他的代理主教,还有我们以前的伙伴顾阿玛尼就在街道中央被逮捕了。两位主教都是我们



的朋友,通过公使的影响,我们派出了一个医师,但我们得不到两位教士的一点消息。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我们自然也担心自己。尽管我们在甲板上遇到这么多悲惨的事情,却从没有离开过这艘船。幸运的是,就在我们饱受折磨的时候,引航员登上甲板,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我们可以立即起航。同月8日是复活节,我们终于和其他许多船只一起开始航行了。

第四章

航行去孟加拉——丢失行李——飞鱼——
洗礼——刻板的安息日规定——捕捉鲨鱼——
爬上桅杆——好望角——海外谈话

出了泰晤士河，过了英吉利海峡，我们的航行极端乏味。我不想陈述我们怎样常常被逆风吹得停滞不前，甚至被赶回头去；也不想陈述我们怎样常常突然被迫中断航程，抛锚后又起航，以免被巨浪和狂风把我们吹上沙岸和浅滩。在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峡上航行，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我只要这样说就够了：我们是4月8日起航的，可是直到6月4日，还没有到达大海。我和任掌晨马上就有了另一个烦恼的原因——失落我们的语言。但是因着主的荣耀，我必须说，我不久就适应了这个困顿。我想象自己更加自由地呼吸，仿佛我刚刚从重力的压迫下释放出来。我想象自己像一只从紧缩的鸟笼里放出来的小鸟一样，可以展开翅膀，任意地到处飞翔。我想象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使徒，被黑色教服包裹着，手臂里夹着每日祈祷书，胸前挂着十字架，就在中华帝国广阔的国土上飞翔，向那些未受启蒙的人传播天主的神圣之道(Holy Word of God)。

过了纬度27度，我们开始看见飞鱼。它们的翅膀是由像蝙蝠那样的软骨组织构成的，扩展到尾巴的底部。当被别的鱼追赶的时候，它们就跳出水面，在浅滩上飞行。由于无力再飞了，一些飞鱼落在了船上，水手们很容易抓住它们。通常它们越出水面不超过三英尺。有时候，因为风力的推动，或被恐惧触动，它们会跳得更高些。



29日，我们通过了北回归线，在一阵和风之中进入了热带。去印度的船上有一种风俗，就是每个第一次通过南北回归线、赤道和好望角的人，都必须行一种所谓的“受洗礼”（Christening），或者说就是新手们要给老水手们罚金。那些拒绝付钱的人，就会遭到老水手们无端的谩骂，成为很多脏话的目标，还会被叉腿绑在一块木板上，拖到主甲板的头部，猛地扔进海里。如果船上哪一艘救生艇以前没有经过赤道，就也要被罚3瓶白兰地，因此我们的船长就需要为他的两艘小艇付出6瓶白兰地。至于我们自己，被善意地告知说：无论我们或多或少地给些什么，水手们都会满意的。我们每个人都贡献了2个先令。拿了这些钱以后，这些人买了白兰地和糖，做了他们特别喜欢的混合甜饮料。我听说那些习惯这种饮料的人认为它非常爽口并有益健康。

当我们走近赤道的时候，明显地感到气温升高，但还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厉害。赤道地区的空气和水都像火一样的烫，所有的东西都会腐败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水变得墨黑，气味难闻，但很快就自我纯净了。开始时还是一个小小的卵虫，很快就变成了飞蝇，船上的医生和其他人都向我确认了这一点。船长下令说谁如果缺席星期天的祈祷，无论是早祷，还是午祷，都将被剥夺他的那一份面包和水。在这艘船上，有几个水手是天主教徒，就没有参加。可是他们并没有受到骚扰。曾经有过一些水手没有出席了二三次，船长下令把用细绳子把他们捆住并吊了起来。但其中有一个人逃脱了惩罚，他说自己是天主教徒。船长相信了，或者说假装相信了他所宣称的，豁免了对他的惩罚。然而，这个人下午就来祷告了，证明了他能够多么轻易地否定自己的宗教。

几乎每天都有重要人员在通风口玩耍，但星期天就没有人这样做。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阅读，一天中的很大部分就看见他们把《圣经》拿在手上。有一个家伙受雇来画地理学的地图，想在星期天继续工作，受到了船长的严厉申斥。主日里，船上对那些异教习俗是如此严厉地禁止。

在离赤道不远的地方，提到了一种英国人叫做鲨(shark)的鱼。这种鱼在热带地区经常看见，但总是单独地游弋。我们捉了约有15条这样的鱼，最大的一条长达9英尺，相应比例大小。它是用一大团鲨鱼特别嗜好的咸牛肉作诱饵，用叉子捉住的。它的颚部先被刺中，拖出水面，但又逃走了。看到这种动物，我不禁联想到故态复萌的原罪。诱饵又扔了下去，这个贪婪的动物，不顾危险，尽管它一定还感到颚部被刺中后的痛苦，却仍然贪咬住牛肉，这下自然就被捉住了。把它拖上甲板的时候，它还在垂死挣扎，尽管一大块肉从背部被割下来了，它还继续乱跳。为了杀死这条鲨，不得不用小斧不断地砸它的头，然后把它割成三大块。这项活动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参加者常常还有危险。

这种动物没有鱼鳞，由一种像鳗鲡一样深色，却坚硬、粗糙得像劣质皮革般的皮肤覆盖着。腹部着地躺看时，你不可能打开它的嘴巴和眼睛。只有把它翻过来，后背着地才能看见。按照与身体的比例关系，它的嘴巴非常大，装备着三排硕大而尖利的牙齿。打开它的头颅，我们发现两大块白色的，像凝结了的牛奶一样的东西。水手们小心翼翼地保存好它，他们告诉我说，对接生婆来说，这是不得了的好东西。鲨鱼血又冷又黑。如果是大鲨鱼，它的肉就很粗糙，不是好的食物。于是我们就食用那种较小的鲨鱼，发现它们又嫩又好吃。这个动物游水的样子很有意思。它打开了那翅膀一样的鳍，看上去身体的宽度要大于长度。鲨鱼准备捕食诱饵的方式也很奇怪，它必须要转过来背朝下，因为它巨大嘴巴的上颚部悬着遮住了它的下颚部。

一个同伴告诉我，他曾经在一条捕获的鲨鱼胃里，发现其中完整地藏了一只带角的牛。另一个名叫詹姆的船员肯定地对我说，有一个年轻人在船边上游泳的时候，被一条鲨鱼攻击，把他的身体从中间一咬两段，带了其中的一半就游走了。船长补充说了另一些同类的故事：他曾经在一条鲨鱼的胃里，发现过一个水手的身体，是24小时之前在船边游泳时被吞噬的。这个人的骨头正在消化之中，能轻易地被砸断。最离奇的细节是：这



个人放在口袋里的刀子也已经变得脆弱，可以像一张纸那样弯过来。在我们捉到的鲨鱼的胃里，什么也没有发现，除了一些3英尺长的鱼，一半消化了，一半还是完整的。

这些鲨鱼特别眷顾自己的孩子们，但是它们的方式和其他已知的动物很不相同。一旦它们察觉有危险，就张开大嘴，把自己的幼子收进肚子里。危险过去后，它们又把幼子从胃里放出来。船长和其他人都证实这是事实，他们都亲眼见过。

7月27日，有天主的偏爱和荣耀的圣安纳的保佑，我们在丰裕的大风中跨过了赤道。我们全体一致复诵《啊，神》(Te Deum)，感谢上主赐予了我们如此轻松的航行。几天过去了，继续是一路顺风，我们跨过了南回归线，因此进入了南温带。英国轮船的甲板上有一个习惯，无论是谁第一次爬上主桅杆，就要被禁食，直到他付了罚金。船上的首席医生看见一些水手和商务人员爬到了桅杆的这一部分，他们可能是设了圈套诱惑他，因为不知道这规矩，首席医生立即随他们爬了上去。他根本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就猛然地被水手们捉住了，用细绳索紧紧地捆绑住看管起来。在幸灾乐祸者的喊叫声中，就是不放开他，一直到他同意罚款为止。同样的玩笑后来也在一位商务人员的身上练习过，但是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他已经在以前的航行中被罚过了款后，他就被放了。

9月6日，我们进入了好望角。风景非常美丽，景色相当壮阔。这地方属于荷兰人，但是很多被路易十四从他们国家驱逐出来的法国新教徒也居住在这里。此外还有许多德国人、佛莱芒人，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天主教徒，生活在精神无助的境地中。看见他们在信仰上的冷淡和摇摆，我就劝他们都回到欧洲去。两周以后，我们又起航，驶向孟加拉。几天以后，我们看到了一条鲸鱼。但是关于这种巨型动物，我所能够学到的只是说，它不可能和吞食了先知约拿的鲸是同一种类。因为它的喉咙是如此细小，以致连一枚鸡蛋也很难咽得下去。在印度洋里，败血症给我们轮船的甲板导致了可怕的浩劫。虽然我们这几个被投放到异教集体中的传教士，曾努力掩饰我们的真实性格，但是在

这样的场合，我们还是相信：为了三个遇难水手的永恒的救恩，抛弃一切伪装是我们的职责。他们都曾是天主教徒，但已经在罪恶中沉溺多年，完全疏忽了他们的宗教职责。

1709年1月1日，有一位水手，因为败血症，使得健康状况到了极端虚弱的程度，掉进了海里。我们立即放下了救生艇，为了救他，用尽了所有方法，都失败了。我为这次事故陷入了悲伤，因为这可怜的小伙子已经表示要公开放弃他的异端邪说，我们同意一旦上岸，马上由我给他做告解，接受他加入真正教会的怀抱。我们不敢在船上做这些，以免被发现。特别是因为我不懂英语，告解必须要经过翻译。为了避免被发现和受惩罚，还要关上门。在仍然为此损失而悲伤的时候，我被告知有一个英国年轻人，是伦敦大商人的儿子，他觉得自己几乎已经被同一种可怕的细菌带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也非常焦虑地要放弃他的宗教，在我的手中接受赦免。但是这魔鬼，那些异教徒中间的统治者，一直把他揪按在病床上，直到他死去，留给我的的是苦涩的失望。



第五章

恒河口——僧侣的无知——招募传教士——给作者们的忠告——太阳崇拜者——圣多玛的预言——灵魂的转世——一个妇女修炼者

2月1日，我们在全体人员的大狂喜中，终于进入了恒河口。当我们逆流而上的时候，我的同伴们仍然因为败血症躺着。一天，我独自站立在轮船的一角，读着日祷书。出于谨慎的动机，书本用白色书皮包裹起来，就像一本通常的书一样。正在读的时候，忽然听见旁边有声音用葡萄牙语问我是不是一个神父。我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印度年轻人，大约有15岁，和其他商人一起从加尔各达来看我们。我以严厉的口吻申斥了他。他察觉到我是害怕暴露自己，就告诉我说他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为了证明，他划了十字，然后热切地要为我服务。这年轻人认出我来，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天意会”(Divine Providence)给我们派来的。该会知道我们在这个国家遇到了敌视，弄坏了身体，还耗尽了钱物，没有一个特别的协助行动，我们就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从这个年轻人那里知道，奥斯丁会士在附近有一所房子，我们有奥斯丁会总会长给他们的一封信。一到加尔各达，我丢下我的通盘考虑，马上前往。到达他们的住所后，我被介绍给一个老僧侣。他是一个聋子，极端地无知，但实在是个好人。他取过我的信，认真地读了。但是因为沒有拉丁文知识，他根本不懂信的内容。他急于要知道总会长的名和姓，却反过来要问我，还装出一付好像知道全信内容的样子。指着签名处，他说：“字

迹太恶劣了！请给我破译一下这个签名吧。”当他听过了总会长的名和姓之后，他暴露出更大的无知。他问我这个人是谁还是代理总会长。我已经适应了他的无知，就肯定地对他说，实际上那是代理总会长，他就显得非常高兴。随后他又问我是否真的是“圣伯多禄”(St. Peter)，即罗马教廷派来的。得到了我的确定性回答后，他对我刮目相看，用足了他的权力来满足我们的愿望。

鉴于读者无疑会对这位僧侣的无知感到吃惊，我来说明一下，他的事情为什么会至于此。葡萄牙“最尊贵的国王”(Most Serene King)们都急于在这些地区维持和扩张我们的神圣信仰，于是宣谕所有路过的官员和水手，都应该表示遵守圣训。因为收成太充裕了，缺乏收割者，只要葡萄牙船只一到达果阿(Goa)，不同宗教修会的传教士们就登上甲板，大声叫喊：有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的修会。在这些人当中，总会有什么人在危机时刻发誓改变，或者希望生活得更舒服些，因而回应了这召唤。所以许多这样出身的传教士都非常无知，其中有些人更坏，非常堕落。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传播我们神圣宗教远远不是有所贡献，恰恰相反是使我们的神圣宗教丢尽了脸。

几天以后，我们受一个爱尔兰绅士巴讷比先生(Mr. Barneby)的邀请赴宴。他十分慷慨地在他装货去马尼拉(Manilla)的船上，送给了我们三个铺位。在各种各样让我们娱乐的事情中，他制造出一种“孟加拉的《路伊勒斯》之作”(Leuilles' work on Bengal)的游戏，点出了书中充斥的大量而荒谬的无知。很多年以后，我仍然和几个传教士朋友一起，欣赏一种类似的娱乐：把插入在有关“中华帝国的报道”(Account of Chinese Empire)中可笑而荒谬的说法挑出来。如果对所写的对象没有确凿的了解，对道听途说的东西不加分析地采纳，这样的作者理当受到应有的嘲笑和批评。所以我总是警告我们的年轻人：当他们在一个国家生活过足够长的时间，并完全了解它之前；或者至少是从一些曾经领悟过，也值得相信的人那里取得信息之前，不要尝试着去做那种事情。如果他们被传唤卷人



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争议，我就建议他们先去掌握那个国家的语言，尽最大的可能去谨防各种各样的错误印象。

一天早上，我在恒河边散步，看到很多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洗澡，带有教诲意义的行为。我看见他们中有一个人，把他的脸转向太阳，一只手拿着一块玻璃眼镜，同时用另一只手往身上擦水，手势动作很像是十字架，口中喃喃作语，似乎是在祈祷。询问之下，我被告知说，这人正在顶礼膜拜太阳，其他的人也是偶像崇拜者。他们在恒河里洗澡，是因为相信这条河的河水含有神奇的力量，可以清洗他们身上的罪恶。

大家都知道使徒圣多玛 (St. Thomas the Apostle) 在这个地方传播基督宗教，随后他在克罗曼德尔 (Coromandel) 海岸的梅里亚坡 (Meliapor) 痛苦地殉难。随后，真正的信仰就被景教徒 (Nestorians) 异端玷污和压倒了。但是葡萄牙人到达之后，在热心传教士的劳作下，基督宗教又恢复了。古代先知圣多玛留下的圣工，那刻在离海不远的梅里亚坡附近一根石柱上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葡萄牙人。这预言是用当地语言撰写的，表明说：“他栽种的宗教会重新繁荣，那时从海上，四十英里远的地方，将看到这石柱。白人将从遥远的地方进入这里。”因为有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所有这些预言都实现了。

传教士们改化了大批的景教徒，还皈依了大量的异教徒。印度教政府只是禁止自己的信众皈依基督宗教。从最大限度的情况来说，他们认为没有比印度教更好的宗教了，但是基督宗教还是比偶像崇拜要好些。

模仿天主教的做法，英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也向这些国家派遣了许多布道者。但是天主的恩宠并没有伴随他们，还由于他们糟糕的行为和他们传播的不良教义相一致，使他们的活动没有产生好的效果。每种偶像崇拜的异端教派在这里都有自己的庙宇。盲目的、未开化的群体中存在着数不清的错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教义就是灵魂的转世。所以他们对待所有的动物和昆虫都非常友善，既不杀生，也不食荤，相反地还饲喂它们，非常仔细地照顾它们。他们怀着这信念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他

们有一些为跳蚤和甲虫医病的医院，那些人还自由自在地花费时间，很高兴地用自己的血喂昆虫。他们这样做是相信自己死后的灵魂，会根据前世的善行与作恶，进入或多或少让人讨厌的一些动物体内。在所有以上提到的动物中，他们对羊和牛有更高的评价，十分尊敬它们。根据一种信念，羊和牛曾经用它们的角支撑了土地。还有，一头牛能够在他们的偶像“摩诃提婆”（Mahadeu）为了人类的罪恶，决定要摧毁整个宇宙的时候来平息他的愤怒。他们还相信，因为人死后都必须越过一条大河，只有紧紧地握住羊或牛的尾巴，才能渡过去。

受到这种迷信的影响，他们清早起来用牛的粪便涂抹自己，就像我们用圣水在额头划十字一样。弄污以后，他们走出去从事他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天主教徒到了临死的那一天，如果能够取得认识的虔诚教士的帮助，就会心满意足。这些人是相反的：如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抓住一条牛的尾巴，从而相信会容易地渡过那条大河，他们就感到幸福了。这就是他们对这些动物——特别是对牛如此崇拜的状况。当任何人皈依基督宗教的信仰时，传教士们总是用强迫吃牛肉的方法，来测试他们的虔诚程度。他以前的异教徒亲友们恐怖地看着他，以后就不会和他一起吃、喝，也不会和他说话了。

这个宗教一些更严格的规定，表现在成为圣人的决定上。那些人因为对真实信仰盲目无知，相信在同一地点暴露在严酷的天气下，一直保持同一姿势，修炼过了一定年限后，就取得了最高程度的完美。我亲自见过这样一个说起来是虚幻的“圣人”。他已经把他的手臂举在同一位置好几年了，手指甲已经长到可怕的样子，深深地嵌到他的手臂里，以至于已经不能松开手指。他的自然需求，都要靠其他人来伺候。确实，所有这样的赎罪者都是由人伺候的。那些有幸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人们，将被认为是幸运的，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未来幸福。

达·法诺神父（Father Giovanni Da Fano）告诉我，他听说一个妇女受到这个圣人形象的启发，把她的手举起朝着天堂，夜以继日地站在同一个地方。神父很好奇地去看她，说服她说：没

有“魔鬼一号”的帮忙，她不可能一直站着不动。他走过去在背后靠近她，用很低的声音命令恶魔灵魂离开这女人。她的手臂立刻放了下来，愤怒地转过身来，用她自己的语言尖叫道：“啊，恶魔！恶魔！”这很清楚地证明，像这样一种艺术，只能在人类最大敌人的指导下，在他统治的领域内实行。



第六章

出发去马尼拉——奇迹般地逃脱——最真诚地传教——铎罗主教囚禁在澳门——铎罗之死——受命为皇帝画像

我本是应该对我所尊敬的孟加拉多说一些，但我在这个国家停留时间很短，所以还是省略这样做，以免说出来的情况并不真切。2月22日，我们乘“圣老楞佐号”(San Lorenzo)，启程去马尼拉。虽然船很小，载了50个乘客，但其中有23个是天主教徒，其他人都是印度教徒和拜偶像者。其中有6个人是奴隶，买来的时候就有要教导他们，给他们做洗礼的想法。上了“圣老楞佐号”以后，我重新穿上了教士外套，把从科隆出发时一直穿到现在的那件俗世便服扔掉了。为了让甲板上那些掉落在罪孽中，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宗教职责的人找回天主教，我用最大的热心将自己完全投入了这项工作。在马来亚做短暂逗留的时候，我被另外两艘船的船长请去，帮助他们的水手们做精神修炼。怀着成功的希望，我非常乐意地做了。

从马来亚去马尼拉，我没有乘“圣老楞佐号”，而是应船长之邀，乘坐“关达卢坡圣母号”(Our Lady of Guandaloupe)，给他的水手以宗教上的教诲。在离新加坡不远处的马来海峡里，我们几乎要迷航了。在这处海而上航行是极端危险的，因为面对波涛，各个方向都有大群的小岛，由急流和旋涡构成了浪的迷宫。一天我正在做早课，突然一个可怕的声音从船底传来，接下来在头顶上听见了巨大的轰鸣和骚乱。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一个美洲商人闯入我的舱位，不由分说，用手臂抓起我就把我拖



到甲板上。这时候我才察觉，船撞到岩石上，几乎要沉没了。我马上跑回我的舱位，拿了圣水，还有神圣的因诺森第十一神父的蜡烛，先是向海祈祷，再把蜡烛分成小块，把它们扔在波涛中。我十分清楚在类似情况下出现过神奇的力量。做完这些之后，我们马上走出了险境。也就是说，天主用他不可言说的善拯救了我们——另一条船赶过来，在相当的距离内减速行驶，接住了我们的一根锚绳，把我们的船只拖离了可怕的地点。

在马尼拉，总督十分希望我给8个关在炮台里的荷兰叛教者讲一讲我们的信仰。我感到极大满足的是，经过40天的努力，我使得他们公开宣誓放弃异教。我利用自由出入炮台的便利，每逢星期天就带着十字架去唱圣诗，直到后来集合起了一小群信众，随后又向他们教授天主教义，并传播一些我们圣教里重要的训诫。训诫以后，我又把殉难十字架持在手上，作了一个熟练的奉献，每一个字都是从我那热烈的灵魂中发出来的。然后，为了让我的听众得到更深的印象，我解开了教士服，表示我的坦荡和诚意；我还惩罚自己，直到双肩流血。有的时候，我的伙伴们觉得这样的惩罚是可笑的。但是当他们发现船长因为我的这种热情而被感动得决定改变信仰，像一个天主教徒那样生活时（他曾经对我的规劝是那样地毫不介意），就不再反对我的做法了。回到那不勒斯以后，我就不再继续这做法了。不是因为我听从别人的意见，也来指责这行为，而仅仅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逐渐地理解，理性和祈祷是最有力的说服工具，而暴力和夸张最多只能产生一些稍纵即逝的火花。

马尼拉没有船只去中国，因为西班牙国王禁止他的臣民和“天国”（Celestial Empire）之间的所有交往。经过一个已经在这个地区好多年的传教士德理格（Don Teodorico Pedrini）的预约，我们用预订的方式准备好了一艘小船，完全为我们所用。这位传教士为了订到这船，还假装自己是个船长。他对航海事务缺乏经验，有二三次几乎要了我们的命。尽管如此，我们终于还是于1710年1月2日，在靠近澳门的一个群岛处下了锚。

第二天早晨，德理格穿着假装的船长制服上岸，下午才由



铎罗枢机主教使团的两个教士陪同回到船上。这位神圣学院(Sacred College)的光辉人物,刚刚到达中国的时候受到皇帝不同凡响的评价。但是由于拒绝执行清朝礼部(Board of Rites)颁布的某些有关传教士的规定,他被囚禁在澳门。黄昏后不久,我们在刚刚提到的两个教士的陪同下前去访问,向他表示我们的敬意。我们避开了卫兵的警戒,从一个面向海面的私家小门进入了他的囚室。这位神圣人物以极大的热情和善意接待了我们。经过长时间兴趣盎然的谈话,我们带着十足的教诲离开了他的住所。

在澳门逗留的最初三个星期内,尽管枢机主教和大约40位不同宗教修会的传教士仍然被看管着,我和我的伙伴们还是相当自由的。1月23日早晨,突然有5个官员来访。问过山遥瞻神父之后,他们开始用严格的法律方式来询查:我们到底是谁,什么时候来的,来干什么,等等。他们的问题和我们的回答都被记录下来。问完这些后,他们走了,留下了一些中国士兵看管房子。为了给这些士兵居住,还马上搭建了一所附属的小房。

在反复思考了我们的圣教及他的人民、他的传教士所遭受的侮辱之后,枢机主教决定给广东总督写一封申辩信。同时,他也给皇帝呈送了一份急件,告知他以枢机主教的级别来促进相互关系的愿望,另外还宣布新来了六个传教士,其中三个通晓数学、音乐和绘画。枢机主教大人想到走这一步棋,是因为他回忆起自己在北京的时候,皇帝曾经要主教以他的名义,给教宗写一封信,派一些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有技艺的传教士过来。枢机主教现在希望重新从皇帝那里获得这样的恩赐,把具有以上所称才能的山遥瞻、德理格神父和我本人派到北京去。听说有这样的安排,我马上终止了我所钟爱的假期,目的是想赶快去进修我的仅仅具有一点基础知识的绘画技艺。我不可抑制地想要表达我内心的不满,但是又想到在这样困难的时候,要像一个真正传教士那样对我们的宗教事业作出贡献是不可能的,因此不久后我也就转而遵从了。

枢机主教大人以基督徒的坚韧不拔,承受着他所有的麻烦

和困顿，实在是值得赞扬。但是，他的躯体却变得与之不相称，不能支撑他那伟大心智的活力。经过三个月的病情弥留之后，他去天堂接收了那份殉道者的宁静。辞别今世的时候，他才41岁，为所有认识他的人所真心爱戴和悲伤。

尽管直观和启示性的描述容易导致误解和幻觉，不足以证明像铎罗枢机主教如此确定地具有伟大德性的基督徒的慈悲心，但我还是不禁要把下面一段赞美插在这里，因为其中拥有我们最高权威当局所需要的所有条件：

穆伦纳主教 (Bishop Mullener)，一个具有真正圣徒虔诚的人。他属于苏州县 (Soo-chow-yen) 的祈祷者。一天他忽然察觉铎罗枢机主教就在他面前，面容闪闪发光，穿着一件大祭司的袍子，对他说：“我到天堂去了。”然后就消逝了。这是主教告诉阿皮亚尼神父 (Father Appiani) 的。该神父为了执行铎罗枢机主教的指示，而不是中国礼部的旨令，在中国受了18年牢狱之灾。当我经过广州回欧洲的时候，我去监狱访问了他，阿皮亚尼神父几次三番地对我说这事。

就在枢机主教去世不久，我们接到了皇帝的命令。我们随后就离开澳门，前往广州府 (Quang-chow-foo)，欧洲人称之为“广东” (Canton)，是从广东省的名字来的，广州府即该省省会。中国的城镇按它们的大小，分成三个不同等级。最大的城市称为“府” (Foo)，其次称为“州” (Chow)，最小的称为“县” (Yen)。所以广州府是第一流的城市。它的街道一般都是既长又直。根据中国流行的风格，广州的房子也都是单层的，由围墙围起来。墙上没有任何窗口，所以看起来就像是女修道院。这里的人流是如此地繁忙，以至于看上去整年都像是一个集市。

鉴于在谈到广州庞大人口数量的时候，要避免被认为夸张的嫌疑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就把下面一桩事情告诉大家，让读者们自己去得出应有的看法。1724年，我回到伦敦后，一个英国绅士邀请我参加晚会，共进晚餐，听我讲一些在中国长期居住的故事。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他们问我广州和北京到底有多少人口。我告诉他们说根据中国人的说法有百多万，他们哄

堂大笑，表示不相信。我告诉他们：如果不相信中国人的说法的话，他们至少应该相信自己的同胞和朋友。法扎卡雷先生(Mr. Fazacalei)也在聚会中，他曾到过广州五六次，毫无疑问，他可以证实我的说法。但是因为他加入谈话时，他们已经表示出不信任，我的问话只能引起他们更大的嘲笑。我就只能以此方式向法扎卡雷先生提问：

“你是否曾经从广州的大塔顶上看过全广州？”

“是啊，我看过。”

“你想它有多大？”

“至少两倍于伦敦。”

“两个城市中，哪一个居住密度最高？”

“广州，远远超过伦敦。它的通衢大道上，整天挤满了人。”

“主要是男人还是女人挤在街道上？”

“啊，广州的街道上从来见不到女人的。”

“好了，先生们”，我说：“如果伦敦容纳了 80 万居民，如你所说，广州有两倍这么大，男性人口就足以塞满街道，那一定应该有 160 万吧？如果广州容纳了 160 万人口，北京的面积更大，人口更密，说它有 200 万人口，肯定不会错的。”

说完这些，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反对声了。

当说到中国城市的城墙里生活着几百万的人口，我们欧洲人确实会感到吃惊。但是所有那些看见过中国城镇、村庄、居民点和马路上蜂拥人群的人们，就不再会吃惊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查究中国的人口怎么会增加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但是在许多导致这种社会状况的有关原因中，我仅仅提一下这几点：第一，像我们的教士和修女那样专心独身，中国把自己献身于偶像崇拜的僧侣和女僧侣的数量很小；第二，流行的风俗是每个男人应该尽他的经济能力多娶妻子，而不顾会带来多少孩子；第三，不结婚对这些人来说是不名誉的事；第四，帝国享有了很长时期的和平安定；第五，完全没有什么传染性疾病；第六，妇女们特别旺盛的生育能力；最后，早婚——通常是在发育成熟的成年礼一完成后就结婚。我可以补充一个例子，作为中国人

多子多孙的图解。一天我在和总督管家吃饭的时候，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自己搞不清楚有多少，就边说名字边计算起来。等到他数到18个的时候，自己也糊涂了，还叫来了仆人来帮助他计算余下的孩子们。

把在澳门开始为皇帝画的两幅肖像完成后，我把它们送给了总督，然后由他转送给陛下。他们还为此点燃了火炮，无论什么时候，送任何东西给皇帝，燃放礼炮已经是一个习惯了。总督后来送来一幅表现孔子跪拜在李老君（Lee-lao-keon）偶像前的画像，希望我画一个副本送给皇帝。因为不能做这种偶像崇拜式的事，我马上赶过去解释清楚。由于我马上就要开始为皇帝效劳的缘故，他出来到门口迎接我。一看见我，他就问：“南礼呢？北礼？（Nan-lee noe, Pay-lee）”他的意思是问我想用南方的礼节，还是用北方的礼节。南礼是那些汉人用的礼节，在数量和风格上都更加适合神性的崇拜，而不是人际交往。北礼属于满人用的，数量少且比较简单，和我们的礼节比较相近。所以我就回答说：“北礼！”此后他马上拉着我的手，把我引进内堂，让我坐在他的左边，按满人的规矩，这是上座，就像汉人把右面作为上座一样。当我告诉他我的宗教不允许我临摹这幅画像，他表示道歉，说他不知道我们的教义。他还补充说会给我另外送一幅。经过相当长的谈话之后，我告别了。出于尊重，他把我送到门口，随后又送来了一幅画像。为了澄清广泛传播、称我对绘画一无所知的说法，他同时还让我画一幅中国活人的画像。他派了人批人来看我画画，当最后证明我是被人造了谣以后，他下令抽了那个最初诬蔑我的人三十鞭子。我刚画完那个副本和肖像后，他就要我再画八幅。就好像画像能够像吹玻璃瓶一样吹出来的似的，他第二天就派人来问我已经画好几幅了。

第七章

启程去北京——蜡烛山——中国挑伕——
南赣河航行——烧香——鸬鹚

遵照皇帝的旨令，广东总督为我们订了几艘船，自己花钱送我们到北京去。11月27日，我们经大运河起航。我们一行人有蒂里希神父(Father Tilisch)和考德罗(Cordero)，两人都是数学家。还有德理格、山遥瞻神父和我本人。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佛山县(Joosh-yen)，中国人认为这座城市只是个村庄，因为它从属于广州，没有自己的办事衙门。但是从其他角度看，它是一个大而富裕的制造业城镇。旅程还没有走出很远，我们已经有机会赞美这个帝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良善管制的精心周到。每隔四英里，我们就发现一条大船，船头有一门火炮，船上有大量的士兵，明显地是在保护运河上的人免受抢劫。

河道的两岸总是肥沃的土地，眼界里总是大量的人。经过四天非常愉快的航行之后，我们进入了山区，运河在群山中开辟出河道来。这部分的旅行被认为是危险的，原因是匪徒大批出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左边一座被称为“蜡烛山”(Lah-chew-shian)的神山，因酷似蜡烛而得名。山岩高耸而荒芜，从周围的平地里突兀而起。当我们到达“清远之府”(Hing-hien-chee-foo)这个城市附近时，有一些人假扮是总督派来的，命令我们停下，以便让他们上船，检查我们的人数是否和护送我们的总管提交给当地的名单相符。船老大怀疑他们是强盗，拒绝接待他们。因为他们继续靠近，就开了几发火枪，以恐吓他们，他们掉头走了。随后不久，他们又两次试图上船，但这



次我们开了炮，他们终于离开了。

在北江 (River Kiang) 上旅行了六天以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叫做“江洲”(Kiang-Cheou)的村庄，座落于北江口上。我们将要继续航行于其中的南江河 (Nan-kiang-huo)，这河一般宽约一发火炮的射程，到冬天却只有一点点水。它要靠北边山区的溪流注入，但冬天都冻住了。用来在这条河上航行的都是平底船，但是它们经常会触到河底。在有些河段，船夫们不得不用前肩膀背纤拖船，或者是用竹竿撑船。碰到这种情况，连妇女都会上阵，她们还在背上背着婴儿。因为水太浅，我们不能继续航行，停泊在一个叫做“曲江”(Hoang-hang)的集镇。我们在那里注意到一套房子全副武装，且规模很大，我数了一下，发现它包括了48个房间。中国人告诉我，这个堡垒是当强盗团伙劫掠的时候，给逃难人口使用的地方。第二天，我们到达了南雄(Nan-young)镇。我们原是想睡在一个西班牙奥斯丁会的修道院里，但是我们的监护人反对这样，说他接到的命令是不能让我们住在任何有基督徒居住的房屋里。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行李都被称过，分成小份，以便让一两个人能够负担。就是在这里，河道结束了，接下来要通过一个把广东和江西划分开来的山区。这座大山被称为“梅岭”(Mei-ling)，从一边攀上去要爬二英里，从另一边下山也要二英里。下山后，离另一条河流还有30英里，我们在那里才能再次上船。全程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挑夫们搬运的，车辆和牲畜都没有使用。因为这两条河流构成了帝国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所以连接它们之间的路途上到处是人，全长30英里，看上去老是像在赶集一样。

这些挑夫背起东西来，就像荷载的马匹。他们还使用滑竿小轿或四人大轿，不像我们用带子，他们是用一种硬木做的拐杆。如果他们不事先预备毛毡或皮革的垫肩，就会磨破皮肤，甚至割裂肌肉。这群人一天走30英里路，一小时走5英里，只停下来休息了二三次。看着他们不知疲倦地疾驰，实在是非常奇妙。一定要提一下的是，这些滑杆，或者是更华贵些的轿子，都非常轻巧，都是用竹子制成的。

旅行的第十五天,我们到达了南赣府(Nan-gan-foo),被获准在方济各会改革派(Reformed Franciscans)的住所,与费南德斯神父(Father Fernandes)共进晚餐。但是因为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过夜,神父就和我们一起来。在路上,我们有点吃惊地看到八、九岁的男孩、女孩,背着超出他们的年龄应该承受的东西。我们到达了下一个城市赣州府(Kan-cheou-foo)。在这里,耶稣会和方济各会改革派都有传教站。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海关,这是离开广州后的第一个海关。每天早晨日出后二小时,就要搜查在这里停泊的船只,强迫交出应有的税收。那些晚于这个时间到达的船只,不得不等到第二天。当告诉他们说,我们是为皇帝做事的,正在赶赴朝廷,就没有被拖延,也没有被任何搜查盘问所打搅。不过我们航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停了下来,因为船伙们上岸去烧香献祭了。他们供上了不同的动物,还有假的纸制钱币。最后他们烧了这些假币,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它们会转成有用的货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正要进入这条河流的危险地段,那里乱石密布,水流湍急。船只到这里非常容易陷入失控的危险,船伙们需要有非凡的经验和敏捷,才能安全地驾驭航行。特别是在一段叫做“十八滩”(Shee-pah-tan),意思是“十八个激浪”的地段。这里的浪头冲上来的时候,带着可怕的咆哮。正是为了免受这种危险,船伙们才去烧香,向他们的偶像祈祷。

回到船上后,船伙们解开一捆香木,像熏香一样燃烧它们,礼拜他们的神祇。我发现后马上冲上去,把它们夺下来,扔到水里,然后树立起十字架来代替它们。船伙马上嘟嘟囔囔起来,但是我告诉他:根据我们的信仰,这是天主的象征,他才是全能的,能够把船只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因此不用害怕任何不幸发生。这样他们才安定下来。

不久,河床的宽度缩小到只有260步,我们到达了那些可怕的岩石中间,大家非常担心扑向我们船上的狂暴的巨浪。船只的危险在于这难以抵御的急流。我们的船伙用如此令人赞叹的方式把舵划桨,才使大家得以保全。水下的岩石是最危险的。我看见一艘船撞上了其中的一块,马上毁坏了。经过了这样



危险的两天之后，我们真是心怀感激地发现自己终于安然渡过了它们。给我们护航的船队，有六艘丢失了，我们所在的那条船，则侥幸地逃脱了。

当我们继续在河上航行时，我们见证了一种在中国非常实用的捕鱼方式：渔民们用一种叫做“鸬鹚”（Loo-soo）的鸟来捕鱼。它们比鸭子大些，头颈却像鹅一样的长。因为它们的毛色很黑，所以它们又有“水衣佬”（Shew-e-laou）的名称，表示是水中鸭类鸟。渔民们把它们带在船上，当它们被放出去自由飞翔的时候，它们就在水面上游弋。看见有鱼后，它们就钻入水中，用嘴把鱼衔住。它们的颈部系着一个圈，主人允许它们把较小的鱼吞下去，较大的鱼就吞不下去了。当渔民察觉到它们的喉中有鱼时，他就往水里扔下一根长竿。这些经过训练的鸬鹚就会爬上竹竿，回到船上。然后渔民就挤压它们的喉头，让它们吐出猎物。渔民们每做一次，总能得到两大把鱼。渔民拥有的鸬鹚越多，他就被认为越富裕。养鸬鹚几乎没有什么花费，因为它们捕捉到的小鱼通常都足够负担它们自己的食物了。我还要提到：当这些鸬鹚潜完水后，它们嘴中衔着猎物升到水面。它们再次潜入水下吞食食物前，会在水上停留一刻钟。因此，显然它们被本能教育知道，对于它们，吞下一条活鱼是危险的。



第八章

行医的危险——传教士的骄傲——弃儿——穆斯林

圣诞节那天,我们到达南昌府(Nan-chang-foo),是江西省的首府。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西满(Antoine Simoy)神父不久就来访问我们了。他告诉我们他时时刻刻地等待着北京一个平信徒修士(Lay Brother)的到来。以后几天,天气如此糟糕,以至于不能过河,这里的河面有一英里半宽。于是我们就回访了西满神父。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收到情报说,上面提到的那个修士在距离12英里远的一个叫作“罗华”(音Lo-hua)的地方遭到抢劫。因为会点医术,他受了皇帝的旨令,去探视皇帝生了病的第二十子。可能是因为不知道这里的混乱,或者是不愿意让皇帝操心,他宣称说没有什么危险。不久以后,亲王死了。按着皇帝的谕旨,这个修士被乱踢、掌嘴和鞭打,打得如此严重,以致他马上就病垮了,现在正在澳门疗养,请假休息。因为我能补充一点,所以我的读者一定不会吃惊。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结识一些医生,他们照看着一个皇族家庭。但是由于没有成功治愈病症,结果他们受到了严厉的鞭打,当时还在鞭伤的疼痛之中,按照皇帝的御旨,他们被上重重的锁链,投入了监狱。庆幸的是,另一位生病的皇族成员被他们成功而有效地治愈了病症,这些医生得以释放,但条件是脖子上继续绑一个用扣子系住的小链子,以示警告。接受这些及许多其他类似案件的教训,那些作为数学家、画家、钟表匠、外科医生或者其他什么匠人而供奉在皇帝身边的耶稣会士,从来都不去充当内科大夫为皇帝服务。

离开南昌府后，我们不再走水路，而是坐轿子。随从们骑马跟随，这样我们在1711年1月1日进入了九江府(Kiaou-kiang-foo)。在我们停下来过夜的小旅栈里，通过一个通事的帮助，我与栈主及他的儿子作了谈话，谈话是关于天主教的教义。他们两人都表现出对天主真理的折服，以至于要求接受洗礼。但是我判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件事的性质，我就留下了一本中文的关于天主教信仰的书籍，并指示他们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给他们受洗的传教士。

两次谈话使我内心充满喜悦，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传教。我借此机会在这里说一下：如果我们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能够少一点夸耀，传教方式上适合所有等级和不同情况的人们，入教的人数就能大量地增加。因为中国人拥有出众的天赋才干，并且谨慎而温顺。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传教士们采用了高傲而浮夸的方式，在中国得了一个名称叫作“启蒙”(Ti-mjen)。他们的外套，是用最贵的材料做的；他们出门从不步行，都是坐轿子，或者骑马，或者乘船，总是有大量的随从跟着他们。除了有几个可尊敬的人例外，所有的传教士都用这种方式生活着。他们从不和人民打成一片，就只能皈依很少几个人。我们的圣教在这一地区的扩展，几乎全部要归功于那些投身其中的当地传教者(Catechist)，归功于其他天主教徒，或者归功于中文天主教书籍的传播。我是说，很少有单个的传教士可以夸口说：他是靠自己的个人传教皈依了人群。因为他们都只能给一些已经被别人皈依的人作洗礼，传教士们不在的时候，婴儿、老人，还有那些病人，都是由本地的天主教徒洗礼的。

18日，我得到了发现的愉快。在我们经过的一个开阔地带，发现一个两天大的弃儿。我马上命令我的两个随从去弄清楚婴儿是不是还活着。发现还有呼吸以后，我努力想弄一点水，给孩子作洗礼。但是我很奇怪，尽管我们不断地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行走，但在当时碰到的每一个人那里，我们没有得到一滴水，那里也没有小溪和泉水。没有办法，我就把这孩子小心地放在我的轿子里，一起到了一个叫做“白树口”(Pey-suy-kaou)的

客栈,在那里我们过了一晚上。在客栈,我穿上了白色法衣,佩了圣带,取了随身携带的圣油,用水做了献祭。作了洗礼以后,为了把我的第一个教女献给圣母,我给这个女婴儿起名为“玛丽”。离开的时候,我留下了12个先令。其中部分是我自己的钱,另一部分是本地区天主教徒为养育女孩的捐款。如果她活着,我还愿意从北京送更多的钱过来。但是,后来这些都不必要了,这孩子不久就死了,她顺利地去了天堂,和主在一起。

弃婴的现象并不罕见,在这个广大的帝国,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当母亲们无力抚养,或孩子太多,或发现婴儿身体有什么缺陷,或有任何看起来会有麻烦和花费的疾病,他们就毫不自责地抛弃了这些小生灵。这个残酷的习俗,也在婚外妇女有孩子的时候普遍流行。特别是那些被叫作“尼姑”(Necoo)的教派成员,她们假装自己是生活在毫无污染的纯洁中。可怜的婴儿们被偷偷地扔在河里,或被放在大路边上,希望有过路人会可怜他们,把他们带回家。有时候孩子被抱领了,但大多数的情况是这些不幸的生命被野兽叼走了。在离北京长城不远的地方,我亲眼看见一个落在狗爪之下的婴儿;还有另一个婴儿在野猪的两齿之间。皇帝慈悲为怀,每天早上都派出很多车子,沿着他的巨大的首都城墙,去收集弃婴们。弃婴们被带到一些指定的庙里,那里用皇帝的钱,雇佣了一些妇女来看护婴儿们。但是因为缺乏适当的关心,这些无数的苦命孩子中,仅仅只有百分之十能活下来。耶稣会士熟知这种状况,他们任命了一个中国天主教徒给带到庙里来的所有婴儿们作洗礼。为了能够做到这些,耶稣会不得不取得僧侣们的允许,僧侣们自然就伸手要钱。用这种方式,每年有不少于三千个孩子接受了洗礼。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没有像这类庙宇的收容站,这些不幸的小生灵就留给野兽们做猎物了。他们很少能够幸运地被陌生人用同情心保护下来。我被此情况深深触动,以至于我决定把我在那不勒斯的一间小房子的房租贡献出来,用来资助一个传授教义的当地人,请他负责每天早晨给这些婴儿们做洗礼。无论这个榜样是多么卑微,我希望它会引导其他人为了同样的目

的而作出更有效的贡献。

第二天我们还是在给那小弃儿作洗礼的同一个地方度过的。因为有大量会冲撞船只的冰块，这河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最后我们用浆砸开了在河岸两边开始冻结起来的冰块，安全地渡过了河流。但是我们等了很久才起程，因为那官员指定我们一起去一个供奉偶像的庙里烧香，献上各种动物牺牲，祈求一路平安。我提到这个情况，只是要让许多天主教徒感到难为情，他们向真正的天主祈祷的渴望程度，还不及这些异教徒们向错误的神祇跪拜的热情。

在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见到大量的穆斯林。后来我才懂得，在这个帝国的每个省份都能发现他们。据说他们都是从西域进入中国的。以前的时候，允许外国人跨越边界，他们便是从印度过来的。他们和中国人建立了复杂的交融关系，其后裔扩展到如此的规模，以至于现在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徒。穆斯林有自己的庙宇，或者说是清真寺。他们聚集在里面，操演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穿中国式服装，除了下层穆斯林有些例外，可以从戴在头顶的一种白色的小帽子上辨认出来。他们还允许留起大胡子。他们和中国人完全和谐地相处着。

到达污池铺(Ool-she-poo)的时候，我问一个伊斯兰教信徒(Moor)仰慕的是谁？他回答说是“拜主”(Pahy-choo)。“什么主？”我问。“泰西样的主”(Tah-se-yang-te-choo)，他回答说。“你拜不拜天？”我又问。“不拜天，拜主。”他带有一些忿懣回答说。山遥瞻神父用同样的问题问了另外两个伊斯兰教信徒，得到的是类似的回答。

当我们还有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的时候，有消息传过来，命令我们停下来，因为皇帝不在北京，他不希望我们在觐见之前见到任何欧洲人。但是第二天，我们又得到命令可以继续前行了。最后，我们在正月五日，大约是中午的时候，到达了个国家的首都。

第九章

向皇上觐见——磕头——气候与服装——
丰盛的猎物——中国火炉——北京描述

安全地到达北京时，康熙皇帝已经回到紫禁城。根据皇帝的命令，我们不允许去见任何欧洲人，立即被带到宫里。我们和几个官员在一个房间里待了一会儿，那儿的主管太监出来见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宽敞的大殿，请我们坐在垫子上。这种垫子是鞑靼人用的，他们的坐姿不像我们，也不像汉人，而是盘腿而坐。我们坐定后，太监和官员们都站立着。有人端来了两个大金盆，一个盛满肉，一个盛满鱼。我们被告知，这些都是“万岁”——一万年寿命的意思，“陛下”的称呼之一，让从御膳房送过来的。我们被命令跪下，这是直接从皇帝那里接受任何东西时的通常习惯。于是，我们接过两个金盆，双手高举，然后就被迫“磕头”（Ko Tow），也就是低首至地而，感谢陛下给予我们的恩惠。再次坐定之后，我们谢绝了品尝肉食，说因为是星期五，我们的宗教不允许，所以我们只用了些其他食品。随后，他们问我们说，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为皇上服务，死而后已。我们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之所愿。

晚餐之后，我们被引到陛下自己的房间内。皇上按鞑靼人的样子在铺着天鹅绒的长椅上坐着。他面前有一张小案桌，上面放了一些书和书写材料。他的左右有一些欧洲教士和太监，他们两腿紧靠，双手下垂，这在中国表示谦恭和尊敬。听从官员们的指示，我们一见到皇上的时候，就疾步趋前，靠近皇上跟前的桌案，双脚紧靠，两臂垂直。看到典礼大人给我们的示意之



后,我们就屈膝跪下。保持这个姿势一会儿后,见有另一个示意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地低头,直到触地。如此地一而再,再而三。三次拜倒之后,我们又挺直了,然后又是重复同样的礼仪,直到他们数到九为止。这个表示臣服效忠的仪节,称为“大礼”(Tak-Lee)——重大而隆重的礼仪。以后我们经常去觐见皇上的时候,就只跪一次,除非是一些年度大礼,如皇上生日,正月初一和其他一些“三跪九叩”必不可免的场合。

行过礼仪之后,皇上问我们当中谁的中文已经有了进步,因为他已经从受命来照顾我们的官员那里知道,我们五人当中有一人已经学过中文。有人告诉他,我就是那个学过中文的人。皇上就问了我的名字、国籍和职业,还有我们是否带过来什么新的数学著作。他还要德理格弹奏几段乐曲,和我谈了一些关于绘画的事。到此为止,谈话都是经过通事们翻译转达的。接着皇上则要求我尽可能地用中文表述,回答下一个问题。这次,皇上在对我讲话时非常慢,为了让我明白他的意思,还使用很多同义词。他对我也非常耐心,让我重复说几遍,直到他理解了我所说的为止。他的问题是关于铎罗枢机主教在澳门逝世的原因。觐见结束的时候,我们被要求尽快离开殿堂,以表示对皇上的尊敬。离开御前的时候,官员通知我:陛下很高兴我到宫里去画画。据此,次日我就到宫中尽职去了。

北京城曾被称为“顺天府”(Se-yun-tien-fu)。现在这个名字,是汉族皇帝为了抵抗鞑靼人的侵犯,把政府从南京北迁到这里的时候定下的。“南京”(Nanking)的意思是南方的皇家居住地,“北京”(Peking)就意味着北方的皇家居住地。Nan的意思是“南”,Pe的意思是“北”,King就是“皇家居住地”的意思。北京坐落于一块往南旅行十日也不见沟壑的平原上,同时,往北走不出很远,就有无数的崇山峻岭。就因为往南是广阔的平原,往北是许多高山,北京就显得夏日酷热,冬天严寒。

气候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变化还是渐慢渐缓的,因此中国的上层阶级在全年里要不断地更换衣服。夏天里,他们穿棉布衫,薄苦布(Ko-poo)做的马甲,一种亚麻做的宽松的褂子,称为“袍



子”(Ppow-zoo),外面还穿有一种叫做“外套”(Why-ttao)的薄绸的短上衣。暑气开始转凉的时候,他们把苦布的换上一种叫“纱”(shah)的皱纹绸,再下去就换上缎子。天气转冷以后,他们换上夹的亚麻外套,然后里外都是夹的。再冷下去,他们就换上貂皮、黑貂皮和狐皮等同一等级的衣服。隆冬季节,除了狐皮的袍子和外套外,他们还穿羊皮的小上衣和夹层的松褂子。下雪的时候,他们还套一件海豹皮的长斗篷。即使穿上所有这些,他们还是冻得发抖。俄罗斯公使伊斯梅洛夫伯爵(Count Ismailov)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伴不得不在他们一般习惯穿的衣服上面再加衣服,因为这里的冬天比莫斯科还要厉害。

寒冷期,即十月到三月,北方鞑靼地区给首都送来大量的猎物,主要有牡鹿、野兔、野猪、野鸡和鹧鸪。南方鞑靼地区则提供大量优质的鲟和其他鱼,都是冷冻的,可以全冬季里容易地保存。旧年结束,新年开始的时候,大量的猎物和鱼在街道上出售,出售的价格便宜得令人吃惊。七、八两银子,相当于四个先令,就能买到一只牡鹿,很少的钱就能买野猪,二个半便士就能买一只野鸡,其他东西也就是这个比例。北京的冬天从不下雨,雪虽然下,但少而不充分。从三月到六月,偶尔下雨,但到了七月和八月,则雨量丰饶。

北京是用炉子的,但是不像我在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看见的靠在房间里,看起来像小炉子的那种。这里的炉子不占地方,热量是通过完全在地下的管道传送到房间里来的。用欧洲人暖屋的方法,头上热了,脚还是凉的。在北京则两脚总是暖暖的,适度的热量均匀地散布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木头是珍贵的,但在附近的山区里能见到完全像英国那样的煤,这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燃料。我在北京的时候,来了一些以前没有来过这儿的莫斯科公国人。他们自己动手,造了一些欧洲式样的炉子,大概是这种更让他们喜欢。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了问题,就把它拆了,还是采用了中国式的。他们发现自己炉子取暖的花费,要超过中国式的一百倍:他们自己的炉子不得不烧大量的木材,而木材在北京是特别珍贵的。中国炉子的燃烧费用非常低廉,煤很

便宜，此外烟囱不超过一平方英尺，深二英尺。在中国的南方，土地被广泛地开发了，木头很少。同时因为煤炭运输的花费太贵，那些干叶子、干草、干籽，甚至动物的粪干都被用做燃料。地面干燥而洁净。

稻谷的产量不是很大，但是和其他本地没有的必须品一样，它可以从帝国的其他地方大量运来。皇帝自己花钱，用一千艘船只，把他所需要的物资运到北京。

水果也有需求，并且水果的产量不够这么人数量的人口消费。但是这里水果产量的不足，同样以输入的方式从北京周围地方得到了补充。榲桲比我们的长得更大些，味道也更加精美。苹果和梨子对健康有益，他们不加烹制就用来滋补病人。在北京，这些水果的价格还是适中的，因为质量非常好，它们都被仔细地用纸包裹好，若送到广州，那里一只就可以卖一两银子，大约等于我们的二个半便士。水果里面几乎全部是水分，所以如果像在欧洲那样晒干的话，就剩下果皮，不太能吃了。这里有两、三种不同的李子，非常的甜美。栗子比较小，其他的干果和我们的都差不多。樱桃是野生的，比较小，肉质也较少。

葡萄非常好吃，但是他们只是用来吃。以前他们曾经用来制酒，在古书中可以看到有“葡萄酒”(Ppoo-tow-tsien)等字眼，就是用葡萄制作的果酒。但是现在他们用一种稻米来制酒。为了制酒，他们把稻米捣碎，压实成饼状，以便于带到很远的地方出售。享用的时候，就把米饼打碎，放入容器，加入热水，使其发酵。这样制作饮料相对于优质葡萄酒来说，可能是错误的。发酵的过程中，他们随心所欲地添加一些香料，来使酒味变得甜或者酸。需要的话，还可以加入颜色，黄色、淡色或深色。这样利用稻谷的结果，就使得制酒时漫不经心。但是，欧洲人是用葡萄酒来做弥撒的。因为葡萄汁是水状的，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在夏天的暑热中，这酒就会发酵，变酸。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传教士把酒弄坏掉了。

北京是由两个不同的城市组成的，一个叫作鞑靼城，另一个是汉城。之所以叫鞑靼城，是因为城里住的是满人，还有一些



虽不是满人,但也被编入了“旗下地”(Ki-hiu-ti),即八旗满族军队的人们。汉城里居住的就只有汉人了。这样说可能恰当些,被称为鞑靼城的城区,以前时代是由伺候皇帝的太监居住的,人数达到一万。但是现在这个朝代,如我已经说过的,是由满人和汉旗人居住的。现在的太监数量大约是六千人,全部住在宫墙里面。鞑靼城四四方方,有黄色的城墙包围着。皇宫就座落在这黄色城墙里面。皇宫被另一座比城墙还高大、还宽阔的墙围起来。住在皇城的人各种各样,除了六千个太监,还有宫室闺房里的佳丽三千,只有皇帝自己才知道数量多少。皇城里还有大量满人,伺候着皇子们,皇子们每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王府。所以,这皇宫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北京的第三个部分,因此北京被描述为包含着三个截然不同的城市。

鞑靼城有九个城门,每侧长三英里。汉城也有城墙,它的北城墙与鞑靼城相连接,整个汉城和鞑靼城却是分开的。汉城的规模差不多大,可形制不同。东西长,南北短。相比其他两城,中等和低下阶层的人们,更加稠密地居住在这里。汉城的四面,有七座城门。因此北京就有16个城门。每座城门之外,都有一个广大的城郊地带。根据皇上的旨意测量了一下,两座城市合起来,共有21英里长。如果把这周长21英里地区,加上人口也很稠密的城郊地带,特别是它的西部,几乎所有进入中国首都的商旅都要经过的通道,统统合起来,就会对这样大规模的城市有了一定的概念。皇宫坐落于鞑靼城的正中,如我说过的那样,坐北朝南,长方形状,二英里长,一英里宽,周长六英里。城墙被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渠包围起来,加以保卫。每侧都有三座城门,当中那座,只有皇帝使用的时候才开启,靠南边的门是皇室人员用的,第三座门则为一般人所用,城门日夜有士兵守卫。皇宫里面还耸立起另一座高墙,构成一个内宫,住着皇帝、妃子、宫女、太监和皇室成员。里面还有一座豪华花园,没有皇帝的特别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那些获得恩准的人,进去的时候要写下他们的名字,离开时又得擦去。宫殿的豪华,可与它的宏大相提并论。尽管它是按着单一的中国建筑风格建造的,没有仿造任



何其他建筑式样(或许除了有略微的一点点哥特式之外),但整体上是令人愉悦的,有很多卓越和优美的东西包含其中。

第十章

油画——中国人的精致——新年——家长的权威——嫉妒——代受惩罚——妇女裹足——访问帖子

根据陛下的旨意,2月7日我进宫,被带到了—一个油画家的画室。他们都是最早把油画艺术引进中国的耶稣会上年神父(Gerardino)的学生。一番礼貌的接待之后,这些先生们给了我一些画笔、颜料和画布,让我可以开始画画。他们画油画的时候,不用画布,而是用高丽纸,就用明矾水刷—下,也不做更多的准备。这种纸买来的时候尺寸大得像毯子—样,纸质非常结实,我几乎不能撕破它。我知道自己的技艺只是在设计艺术上,就从来不敢去画自己发明的题材,而是把我的雄心都限制在临摹工作上。但是因为临摹一点都不为中国人看重,我发现自己不只是有一点点麻烦了。无论如何我必须观察所有别的画家(大约七八个人)的作品,然后鼓起勇气来仅仅画了一些风景和中国马匹。皇上对人物画没什么兴趣,这我后面还会说的。对于任何一个只有中等人物画知识的人来说,是没有办法画好风景画的,我只能把自己的努力交给天主的指引了,开始做一些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很高兴我取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致于皇上非常满意。因此,我就不间断地画到4月份,皇上下令说可以把我的作品拿去刻版了。

习惯上所有进宫服务的人都要给皇上准备礼物。我们三个罗马传信部的传教士并没有被要求怎样做,于是就自备了一些礼品,包括30件各种各样的东西,绝大部分都被皇帝接受了。



礼品中有药品、补酒和蜜饯,还有些类似的东西。皇上则每年都给在北京的欧洲传教士送大量的鹿肉、野兔、野鸡、鱼和鹿腿,来作为新年礼品。本年也这样做了,并且有谕旨急令说,我们三个人应该各得一份。提到鹿腿,我必须补充说:它们都是收藏、晾干和保藏了很久的一包包的小件食物。吃它们的时候,要先在水里泡软,然后才能烹制。在中国人的餐桌上,用它做成的菜肴,属于第二珍贵的大餐。在所有菜肴中,最受珍视的是用燕窝做成的大餐。燕窝只有在广东附近的几个海岛的岩石和山里才能找到。这些鸟巢并不是像我们国家看到的那样,是用土筑成的。这里说的鸟巢是一种白色的糊状物,虽然本身没有什么味道,但是用高汤和调味品烹制后,在中国人的味觉中,尝起来简直是清爽无比。中国人把新鲜狗肉算作是稍次一点的菜,这些动物都是为了端上餐桌才喂养的。

提到中国人的新年,它被称为“正月”(Chin-yue),我要适当地多说几句。不像我们是按照太阳,中国人是根据月亮,来计算年份的。他们把新月作为每月的开始,月亮落入宝瓶座15度时,是2月5日。他们把一年算作十二个月,其中一个月是29天,其余的都是30天。但是每隔五年,他们都要加上一个闰月,以校正阴历年,这样一来他们就差不多像阳历一样地计算年月了。天数是按午夜划分的,来计算一天和另一天。一天被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所以他们的一个时辰等于我们的两个小时。

在中国,一年之始使人想到了我们的嘉年华。新年庆祝是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游戏、盛宴、戏剧表演和其他娱乐。节日开始前几天,衙司都关门了,用官印封条把门封上,一直要到节日以后好几天才重新开门。图画偶像被粘贴在房门的门板上。在中国各地,大家燃放大量鞭炮,实在让人惊吓不已。我可以很有把握并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辞旧迎新,一晚上消耗掉的火药,要比全欧洲在十二个月里消耗掉的还要多。在旧年的除夕,孩子们跪拜他们的父母,幼拜长,弟拜兄,仆拜主,操演这个国家的风俗所要求的一切礼仪,包括了鞠躬、跪拜等,描述起来就太过冗长乏味了。丈夫和妻子,还有和各个不同阶层的女性之



间也奉行有各种礼仪。孩子对父母表达同样的行孝礼节，而父母亲们则在他们祖先的画像前面行孝礼。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这个国家一种严格的古老观念，一种深沉的幼尊长的敬畏感而得来的。这些礼仪做起来是如此地迷信，以至于任何人要不是像我这样亲眼所见，就很难相信和理解。

一天我正在自己的房子里和一个造访官员谈话，他的儿子从帝国遥远的地方处理家族生意回来。他进屋的时候，我们坐着。他立即在父亲面前跪了下来，用这种姿势说了大约有15分钟。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我一直坐着没动，直到最后我突然站起来，向那位官员抗议说我要站着，除非他能够让他的儿子也坐下来。接下来的争议就僵持着，父亲说如果我还是站着，他也要离开座椅了。我就宣布说，只要他的儿子还跪着，我就不可能坐着。然而这儿子却向我抗辩说，在父亲面前，他必须是跪着的。然而最后还是我战胜了这些顾忌，父亲终于发令，可以让儿子坐下。儿子立即遵从了，可是却退到了房间的角落里，小心翼翼地坐在凳子的边角上。一年以后，这个儿子又来拜访我，这次他自己也是个官员了。我向他提供了符合他身份的座位，他却拒绝了，说他还是不能坐这个上座，我应该记得，这是他父亲一年前坐过的。同样道理，皇帝死后，他的儿子永不能坐上同一座皇位，而必须是坐在他祖父曾经坐过的皇位。

不仅仅是孩子们要服从家长，而且如前面提到的，年幼的也要服从年长的。一天在北京城外奉承皇上，一个十二三岁大的男孩来访问我，他的弟弟，一个陪着他的五六岁的孩子，非常活泼有趣。我问了弟弟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如此聪明，所以我就送了他一条手绢。但是我一给他，他就收回了手，放在身后，作拒绝状。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哥哥。”于是我就要他哥哥允许他收下。哥哥稍微点了下头，就足以让弟弟欢天喜地，他马上收了礼物，并回报以感谢。就像中国的普通百姓对地位较高的人那样，小男孩在我的面前跪下，行叩头礼，就是把脑袋碰到地面上的那种礼节。

或许我应该再说一下中国的妇女，她们完全把自己关在宅



院偏远的闺房里。缙绅人家很少让妇女出门，除非是在新年欢庆的时候。即使这时，她们也被关在轿子里。她们实在是如此严格地被看管着，以至于不允许与丈夫的父亲、兄弟，更不要说叔伯及其他男人们讲话了，不管亲戚关系是多么的接近。在新年里，妻子和丈夫一起，向她的公公和自己的父母行上述的孝敬之礼。这些亲戚生日的时候，她也要行这些孝礼。除了这些日子，她公公既不能和她说话，也不能进她的绣房。这里我还不能漏掉这样一种风俗，它证明了中国人良善的社会秩序，刚刚听说的时候我还感到好笑。如果一个男人因为他的媳妇的疏忽或其他什么错事，认为有责任纠正她，按这个国家的习俗，他是既不能进她的房间，也不能和她说话，更不要说打她了。于是他就把他的儿子找来，向他指出他妻子的过错，要他跪下服从，接受严厉的鞭打。然后儿子就屈膝，头着地，感谢父亲的惩罚。接下来，他就去妻子那里，重复同样的教训，就像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一样，给妻子以同等的打骂。

过分的戒心，导致了妇女裹足的习俗，这只是为了使她们走路痛苦，劝使她们留在房间里。我听一个中国人说，最早发明这个计谋的人是一个古代皇帝。他的目的只是想要用小到不能再小的脚来显出妇女的魅力。这个宫廷观念在全中国流行了，每个丈夫都想让妻子赶这时髦，母亲们则为她们的女儿寻求一种通过艺术才能达到的虚幻美感。在三月大的襁褓之中，女婴的脚就被紧裹起来，以致身体的这一部分完全停止了生长，她们走起路来，都是蹒跚跚跚，跌跌撞撞的样子。如果碰到什么场合想努力加快步伐的话，每一步都会有跌倒的危险。即使慢慢地行走，她们也觉得不能保持身体平衡，结果就被迫像鸭子一样走路，左右摇摆。在论及婚嫁的时候，男女双方互不见面，风俗就是把小姐三寸金莲的精确尺寸送她的订婚者去看一看，而不是像我们在欧洲那样，送给对方的是小姐的肖像。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品味实在是悖常理，以至于到了过分的程度。我认识一个大夫，他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和她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其他交涉，就是观看和爱抚她的小脚。

新年里，朋友和熟人互相造访，在一张红卡片上留下他们的姓名，叫做“帖子”（Tia-zoo）。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被访者在家，他也可能让仆人出去说不在，这并不冒犯访问者。在这样的节日时刻，人人都想和最亲近的亲戚朋友们一起，随意地自我享受。

官员们全年都衣着简单，总是穿同一种颜色——穿紫色和黑色的短褂，黄褐色，或浅黄色的长袍。他们从不穿红的和黄的颜色，这两种颜色是作为皇家专用色而加以禁止的。在节日或者在皇帝生日期间，官员们的衣着是用很多金丝绣描过的长罩褂，每人都带有特别的官阶徽章。武将们用龙区别，文官则用鸟表示学问和知识，它们都被绣在胸前。壮观的军阵，走向宫殿，向皇帝表示忠诚，虽然看不见皇帝。大量的人员集合在开阔的朝廷，演示出他们的臣伏和屈从，这时的皇帝坐在大殿的王位上。

我好几次亲见这个礼仪，必须说这是非常壮观和庄严的。所有在京的欧洲人都都做同样的忠敬之礼，只是在宫廷的另一个地方独自地做，并且从来没有官员的陪伴。



第十一章

祭天——焰火——北京附近的皇宫——
花园景致——中国式奉承

一天早上，我正像往常一样进宫，忽然接到皇上御旨，要我随他到畅春园(Chan-choon-yuen)去。这是一座离北京三英里远的行宫，陛下常常加以修缮，一年住上五、六个月。听从这个命令，我马上和指定当我翻译的杜德美神父(Father Jartou)出发去行宫。我们到达后，在靠近帝宫的佟国舅(Ttong-kew-kew)住所安顿下来，佟国舅受命来照管我们。陛下还送马来给我每天骑用，但因为它顽劣而不驯，我就把它留给了下人，而不要使我有什麼危险。我自己花费，用上了另外一匹。另外，我发现我自己的衣着和其他必需品，已经超过了我从传信部收到的每年40英镑的额度。那些为皇帝贴身服务的欧洲人，都被赐给奉禄和马匹。而其他住在北京的欧洲人，虽然也为陛下服务，但只给煤、米和其他一些东西，数量大约是每年20英镑。

不久我们陪着陛下回到北京，为了祭天的庆典，他在那里待了三天。儒家士大夫教派(Literary sect)崇拜天，他们的首领是皇帝。为此目的，在北京和南京建立了两个宏大的庙宇，只有皇帝才有权利以全体子民的名义，在里面祭祀。如果有什么情况使他不能执行这个职责，他的职责就由最高品级的行政官代理。任何其他想要做同样的举动，就是犯了欺世大罪，自然要受到惩罚。

在这些庙宇中祭祀的牺牲品包括大量的宰杀了的羊、牛，祭祀中还举行各种礼仪。中国人为了这些牺牲品，要斋戒、沐浴

和禁欲。禁欲期间，不得食用新宰杀的动物，不过以前宰杀的动物还是可以吃的。

回到畅春园，我们都被皇上请去观赏一年一度为了欢度新年而举行的焰火表演。晚上，我们都聚集到御花园里面的一个大空地上。皇上和他的妃子们一起出席，不过避开了大家的眼光。伴随着一个拔地而起像喷泉似的巨大焰火，盛大的表演开始了。点燃以后，一个大花筒升到了约100英尺的高空，从那里撒下了一个壮观的火轮。马上，一个由无数小星点组成的巨大火柱从花筒降自地面，同时还另外伴有四个由纸灯笼构成的组群，灯笼里面闪闪发光。这场美景持续了相当长时间，随后另一个喷泉式焰火又出现了，和前一个差不多。再后来又是很多种由不同颜色和形状组成的火柱，让观众们看得心驰神往。所有被邀请的欧洲人从没有在他们自己国家看过如此好看的东西。接着这部分表演之后的是烟火术的展示，中国人叫它“打仗”。面对面的两方发射出无数火箭，射在一种板上，产生的声响，酷似对阵敌军呼啸的箭只。表演还在继续的时候，惊人的焰火从地面的四面八方升起，火焰的轮子和圆盘，在四处运动，喧嚣声在持续而强大得宛如万炮齐发中结束了。大小焰火的壮观程度，要视不同的情况而定。这个节日里，有地位的人家里也放焰火，供女眷们取乐消遣。一般的下层民众也非常喜欢这个娱乐。

皇上的行宫叫做“畅春园”，意思是“永远的春天”，是康熙为了自己的疗养而建造的。它座落在一块平原上，被其他都是围有高墙的宫邸环抱着。房子里住着皇太子和其他贵族。行宫的人口处及它的外面，全年都有满族士兵把守。除了太监外，不允许任何人通过。那些得到特别准许的人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一个记事板上。到达门口的时候，那些不认识的人就会被问名字。如果他们给出的名字是符合记事板上的，就能获准进入。走过一个敞开的大厅，又来到一座大门前，这里有太监在一块大白板上写下那些进去人的名字，出来的时候再用一块湿布擦去。用这个方法，他们可以知道过了晚上的某个时辰以后，有



没有陌生人还留在宫中，除了太监，不许任何人逗留于此。北京宫廷和热河行宫，也采取同样的谨慎措施，就是因为要对皇帝的三宫六院实施有效的看管。

畅春园和我在中国见过的其他行宫一样，和欧洲人的趣味完全不同。我们欧洲人寻求用艺术来排除自然，铲平山丘，十涸湖水，砍倒树木，把曲径拉成笔直的道路，花大钱建造喷泉，栽种成排的鲜花。中国人则相反，用艺术的方法，努力地模仿自然。所以在这些园林中，有假山里的迷宫，很多条幽径和小路横断交叉，有的直，有的曲；地势有的平缓，有的如同陵谷。一些其他的路径跨越小桥，另一些用石块和贝壳铺成的小路则通到山顶。湖里面点缀着小岛，岛上建有小型的怡然亭，要靠渡船和桥梁才能上去。钓鱼累了，皇帝就由妃子们陪同，到怡然亭歇息。树林里有着野兔、鹿和大量的猎物。还有一种像鹿的动物，能生产麝香。一些开阔地带种上了谷物和蔬菜，其间散布几块果园和花园。在所有这些提供了舒适环境的地方，都有康乐场所和太监居所。这儿还有后宫寝院，其门前都有大的空地，每个月举行一次贸易集市，让妃子们娱乐消遣。所有的伙计，都是太监扮的，所以他们展示的是最贵重和最精美的货物。

皇上正要出发到北京平原上的一个湖区去狩猎，所有从首都来的欧洲人都祝愿皇帝旅途愉快。为此，我们在非常近的距离内，跪拜着向官员们送上我们的祝词，他们当场就转达给了皇上。皇上回来后，我又去了热河，陛下问我是否能像以前做过的那样，和画家们朝夕相处，还问我的中文是不是有所进步。我回答说自己每天都在宫里，还告诉说我画过些什么。关于中文，我告知他，自己已经能够半是语言，半是手势地理解了。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我就画出我的意思。听了我说的话，皇上说我不再需要翻译了，因为这样就可以被逼着用中文表达各种需求了。皇上还要德理格过来，人住佟国舅府，目的是要给古钢琴和音钹调音，皇上在宫里藏有大量西洋乐器。有人说德理格不懂中文，他回答说不要紧，音钹是用手调的，不是用舌头调的。可是后来皇上还是把巴多明神父（Father Parrenin）配给德理格当



翻译。

皇上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但是尽管他在科学和其他一般认识上的趣味都不错，他对音乐却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每座殿堂里都放了音钗或古钢琴，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妃子们，都不会弹奏。有时候皇上的某一个手指确实触摸了键盘，中国宫廷所奉行的过分地溜须拍马，已经足够让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了，正如我经常见证的那样。我必须说，康熙皇帝确实是一个知识广博的人，他相信他的国家的所有夸张的赞美，还带有一点孩子气的虚荣心。发现他这一点，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这大概是要归结为他八岁登基开始自己的王朝，而奉承的风气持续地滥施于他的缘故。

皇上有一次看见了他要我画的一幅满族人画像，就说非常像。然后他要德理格演奏音钗，还表示他非常欣赏这表演。为了表示他的满意，他随后就送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这是他经常重复的一种恩赐。

第十二章

中原、鞑靼和高丽的测量——命令刻
印——跌下马来——满族大夫——水疗

多年以前，皇上派出了好几个耶稣会上到中原地区的不同省份，责令他们对各地进行准确的测量。他还想把鞑靼地区作同样的测量，于是就把这任务交代给杜德美神父，还任命了山遥瞻神父给他做助手。从事这项事业的花费是巨大的，因为帝国广大的中原、鞑靼地区，还有近 30 个朝贡诸侯和王国，包括高丽，都要测量。经度是用长链测量，纬度就用数学仪器计算。这项任务需要无数的人力及很多官员的监督，用了 14 年时间。然而，高丽王国，还有西藏，是很难进行非常精确测量的。因为高丽人极端地猜疑陌生人，不愿让欧洲人进入。这一部分工作自然就由中国官员们执行，并由耶稣会士加以特别指导。皇帝用派遣大使作为借口，把他们派到那边。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时时刻刻地严密看管这位官员，以至于他不能脱离紧随着看管他的警卫士兵视线的半步，并被记下所有的说话和行动。因为这样没有办法丈量经度，所以只能根据时间来计算里程。这位大使，是我一个相当亲密的熟识者，他告诉我他只是成功地测量了太阳的经度，因为他让高丽人相信他所使用的这个仪器就是“日晷”，所以他停下来看这仪器，以确定时间。虽然西藏已经接近于被皇上征服了，但仍然是喇嘛在统治。因此为了政治的原因，陛下除了派去两个喇嘛外，没有派任何其他的人。这两个人先前受过耶稣会士的培训。

很久以来，皇上一直希望手下的什么人能够把上面提到的



地图刻印出来。为此，他询问过德理格、蒂里希和我，即我们除了音乐、数学和绘画之外，还会什么。他们都作了否定回答。我说我懂得一点光学，还懂得一点在铜版上用硝酸腐蚀的刻版艺术的原理。皇上听说这些，非常高兴。虽然没有做过，我还是准备试一下。皇上立即命令我开始刻印，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用点阵的方法，在一块涂上灯烟碳黑的板上绘制地形图，为硝酸腐蚀制版作了准备。我刚刚做完这些，皇上就急着要看。因为在版面上预备好的东西看起来非常漂亮，皇上非常高兴，命令中国画工画出地形图，以便我能在日后刻印。地图刚刚完成，就和原图一起，让皇上观看了。他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为复制品如此完美地接近原件，没有任何差异而感到吃惊。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铜版雕刻画，中国人自己大致的作法，是把画固定在木板上，然后用雕刻刀把二者一起刻出来。

为了避开北京一贯的酷暑，康熙皇帝已经习惯于经陆路和水路，到中国的南方去巡视。然而，这项消遣带来的花费，对他的臣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于是他就在鞑靼的热河建造了一个行宫。现在皇上在那里从5月初住到9月底，除了大批寻找宠爱和欢乐的人群外，大约还有三万人陪同。我奉命和担任数学家的蒂里希神父，作为外科医生的罗德(Rod)神父，还有担任翻译的巴多明神父和德理格神父，随皇上一起前往。我们骑着马启程了，但是还没有出城，我的马就滑倒了，我一下子被摔了下来，头和身体的其他一些部分受到了可怕的伤害。由于我的同伴们不敢停下来，他们只好把我托付给两个异教徒照看，把昏迷的我留在街上，当街躺了相当长的时间。

等我恢复了神志，我发现自己在一座房子里，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暗淡和模糊的，感觉就好像我是二个月前从马背上摔下来一样。皇上给我送来了一个满族骨科大夫，因为皇上和他的朝廷一致认为：治疗摔伤，满族骨科大夫比欧洲人要好。实话实说，虽然治疗的方法形容起来比较粗野，有些治疗看来是无用的，但是我确实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痊愈了。这个大夫让我坐在床上，身边放了一个大盆，里面盛满了水，水中还放了

大块冰，以便把温度降低至冰点。然后他把我的衣服剥光至腰部，让我把头颈伸直置于水盆上面。他用一个杯子把水浇在我的颈脖上，持续了很长一会儿。这手术把我的那些神经从软脑脊膜中绷直了，造成的痛苦是如此剧烈，不堪忍受，以至于我看起来要挺不住了。大夫说，这可以止血，并恢复神志。情况确实如此，因为在短时间内我的视力就变得清晰了，我的脑筋也恢复了活力。

接下来他用绷带，让两个人使劲地紧紧绑住我的头。两个人握住绷带的两端，接着就用一块木板用力地敲击其中间部分，给我的头颅造成极大震动，使我承受了可怕的痛苦。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说这是要正脑，他认为我的脑子已经错位了。倒是真的，不管怎么说，经过第二次手术，我的头脑感到自由了。

第三次手术马上开始了。他还是让我脱光衣服到腰部，由两个人扶着，到露天地方行走。行走的时候，他冷不防地把一碗冰水泼在我的胸部，这样一来我就得猛烈地深呼吸，因为我的胸部已经被摔伤了，很容易推想这种打击之下我所经受的痛苦。大夫告诉我说，如果我的肋骨脱位了，这个猛然而强烈的呼吸，就会把它恢复到自然的位置。

下一步治疗的痛苦和狂野一点也没有减少。大夫让我坐在地上，然后在两个人的协助下，他用一块布塞住我的嘴巴和鼻子，直到我几乎要窒息。这个“中国的埃斯库拉皮斯”(Chinese Esculapius)说：“这个方法能使胸腔强烈鼓起，会迫使任何已经凹陷进去的肋骨回复原位。”

我的头部伤口并不深，他用烧过的棉花加以塞住的办法来治疗。然后他就要我由两个人扶着，继续多走些路。此外我不可以坐得很久，也不允许在晚上十点以前睡觉。在此之前，我只能喝一点点“稀饭”(Hifan)，就是薄的米汤。持续的行走，使得我几次昏迷过去。但是这些都是大夫早就预见到的，他告诫我不要大惊小怪。他让我相信，这样空腹露天行走，可以防止血液淤积在胸腔里所造成的可能的腐烂。这些治疗方法都是粗野而痛苦



的，但是我必须真实而坦白地说，在这7天里面，我完全康复了，并能够重新踏上我的鞑靼之行。

在我摔下马来那个早上，皇上三次派人来，来察看我这个事故情况。其中有两个官员，三个听差和两个医生，我始终坚定地回答他们说，马是极好的马，完全是因为我疏于马术才摔下来的。这样就使两个人免于受罚，一个是带这匹马给我的官吏，另一个是一直负责安排我们行程的官员。这些可怜的人们曾经活在巨大的恐惧中，害怕我禁不住有些什么抱怨，因为无论多么轻微，都会给他们带来毁灭。为此原因，他们到现在都十分地爱戴我。他们在不同场合，以大量的服务来报答我。



第十三章

长城——热河附近的山——尝试刻印——
热河描述——皇上的行宫生活

皇上现在明白了我不能骑马，他就命令，一旦我康复后出发，我应该坐马车。这次旅途中，我路过了著名的把中原和鞑靼分隔开来的城墙，它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是一个“世界奇迹”。中国人说，长城的长度超过一万里，大约相当于三千多英里。但是我可以肯定说，它不超过 1500 英里。城墙一路上并不平坦。它有时跌进深谷，有的则攀上高山的顶峰。城墙的高度也常常不同，某些地方非常雄伟，有的地方则不会高于 15 英尺。一部分的墙体完全是用石头建成的，其他地方则用砖，还有一些地方则砖石混合。马车可以轻易地在它的顶上行驶，这就是它的宽度。我被告知说，墙体的内部是用土填充的。之所以要建造得这么宽，不但是为了战争时期的方便，而且也是为了建造时期装运材料的便捷。要不然的话，就不可能把材料运过悬崖绝壁，到达精确的地点。事实上，正是中国人的先进文明建造了一条民族的边界，跨越了岩石、沟壑和大山，没有给马匹和步兵留下一条通道。

考察了这个工程后，我非常吃惊地发现长城虽然建造于一千八百年之前，可由于被保存得如此完好，以至于它看起来像建成于一个多世纪前。它只在几个地方有所塌陷，而鞑靼人如今握有中国，他们才不去操心修复这些损毁的地方呢。他们只是守卫交通繁忙的城门。汉人政府统治的时候，曾雇佣了一百万士兵来守卫和保护这项令人惊叹的杰作。

到达长城之前，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有着山丘和平原多样地形的区域。但是到了城门的另一边，除了高山，看不见任何东西。小路沿深谷而行，在两边的高山之间，有关隘出现。在我们到达热河之前，我们没有看到一家鞑靼居民，自从皇帝迁移走了他的鞑靼居民后，这里只有一些汉人建造的用来招待旅行者的小旅馆。除了这些，大约每隔15英里，就有用墙围起来的宫殿，供皇帝和他的妃子在往来热河的途中使用。在这些山区里面，早上非常冷，需要穿裘皮衣服。但是当太阳升起后，则热得让人难受。在靠近热河的地方，一天我兴致勃勃地爬上一座比周围大山更高一些的地方，看到周围的山顶就像无边无际的大海上的波浪。面对如此杰出的景象，我感到非常地吃惊，这种壮观，或许全世界都无可比拟的。在这个地点，我又一次看到了大自然如此神秘和巨大的运动，就像我已经描述过的那样，我曾经在从广东到北京的旅途上也看到过。但是，这里更加高耸，且形制不同，就像是海格立斯寓言中的棍棒一样。

经过20天的旅程，我们安全地到达了热河。次日我就到宫里去，感谢皇上给我的医疗帮助。我还是磕了头，因为只要皇上有了任何恩赐，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这个礼仪就是不可少的。就在这个特殊场合上，我被告知必须要完成已经进行了的铜版画，并马上用它来刷印。关于硝酸腐蚀的雕刻艺术，其实我知道很少，只是在罗马跟一个艺术家学过一堂课，当时还是屈从了一个朋友的意愿，令人幸运的似乎是有着深谋远虑，他极其热情地推荐我去学。

现在我要寻找必要的成分来制造硝酸，即白色的强烈的酒醋、氯化氨和碱性醋酸铜。氯化氨可以大量获得，但碱性醋化铜对我们而言质量就非常差。还有醋，它不是用葡萄酒做的，而是用糖和其他东西，因此不合我们所用。由于硝酸不充分，腐蚀出来的线条就非常浅，加上墨汁糟糕，使得拓印本看起来非常不好。这种雕版的任何程度的小小改进，都花费了我大量的劳力。

为了做好墨汁，必须要有酒石酸氢钾。但是御医馆的药房

里只能找到很少几磅，因此不得不用一些其他材料。经过很多试验，我制造出一种代用品类。

在制造印刷机的时候，我再次遭遇了无数的困难，此前我只见过这东西一次，而且是在不怎么在意的情况下。我现在要人来做一个，下面装的是滚筒，上面部分则是可以移动的。接下来的情况是，机器工作了，印出来的效果却是一塌糊涂，惹得太监、官员和宫廷里的其他人们的大笑并加以嘲弄，这下我的麻烦和混乱都全了。然而，回想起我来到中国的最终目的，我就把这些全都用耐心和幽默感对付过去了。陛下看了我的雕刻印版作品，尽管它们都十分灰淡，可他却是充满善意地谅解了。他甚至宣布说它们都非常好。他总是要求我继续做，从来没有发现我制造出来的错误。

除了我已经提到的烦恼外，我还必须承受其他的干扰。有一群嫉妒者，其中主要是些不高兴我得到皇上恩泽的官员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丢脸。他们有很多恶毒的举动，其中之一就是看到我的工作开始并不很顺，就自己雇佣了一个中国的手工刻工，来雕刻印版。他是忠实地根据画家的设计，把线条大致地转刻到版子上了。可是他没有理解光和影的和谐，因此图画从他的版子上揭下来的时候，外观效果非常糟糕。主要负责照看欧洲人的周大人(Mandarin Chow)非常失望和愤怒，他把印本撕成碎片，还下令鞭打这可怜的人。

陛下知道我的雕版工艺获得了一些进展，决定要印刷一批采自他亲令建造的热河行宫的《热河三十六景图》。因此我就和一个受命画画的中国画匠一起过去，从而有机会观看了全部地方的景致，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授予给任何其他欧洲人的特别的恩惠。

鞑靼的热河行宫离北京大约有150英里，她坐落在一块四面环山的平原上。尽管平时干旱，可在夏雨和融雪时节，水位就可怕地上涨，洪水泛滥。几年以前，它摧毁性的特点还不为人所知，在现在的房子还没有建好之前，它曾经一个晚上把在这里宿营的好几千人一下子都卷走了。一座山丘从平地里慢慢升

起,山坡上密布预定给皇帝的随从居住的房子。丰饶的泉水,从盘旋环绕的不同坡道上下来,构成了一座壮观的湖泊,引人瞩目地生活着大量的鱼群。

自然地形上令人赞叹的得天独厚,外被加上了丰富多彩的植被。在全部广阔的鞑靼地区,很少能见到什么树木。但是在热河,其平原,其斜坡及山丘皆被厚厚的植被覆盖。尽管椿果、芜荑、梨子和苹果都是野生的,但味道鲜美,可以端上皇上的案桌。热河的平地、斜坡和山丘广延很远,我骑在马背上转了一圈,花了一个小时。

在这片土地的不同位置,矗立着各种居所,或大或小,依用途而定。一座给陛下用;后面的一座,给他的宫女,每个房间安置三、四个人;另一座给他的太后,其他的给他的皇后们,另有一些则给太监们。此外还有一座“庙”(Miao),或者说供奉偶像的寺堂,里面常常有大量的“道士”(Taou-she),或者说鬼神的教士,他们全都是穿黄衣服的太监。在热河期间,皇帝和他的嫔妃们就去这座庙里供奉和崇拜。这里还有很多凉亭。凉亭用不同样式建造,但品味都很高雅,且非常干净;亭子四边都有绸缎帘子,以防止外面可能看到的视线;周边都是椅子,中间放着桌几或床榻。这些别墅和凉亭,是供皇帝退朝后与皇后及宫女们享用的。在热河,除了嫔妃和太监们,很少能见到其他人。有时皇上躺在一座躺椅上,被太监们抬着转行,嫔妃们则步行在皇上身边;有时皇上和嫔妃们坐在小船上,在运河和湖泊中钓鱼;吃饭时,皇上总是一个人坐在高台上享用,而陪伴他的嫔妃们则每人一张小桌子,坐在地上用餐。即使在读书的时候,他也被他所喜欢的皇后们包围着,我本人经常看到这场面。

第十四章

皇上的随员——小猎——猎鹿——猎虎——摔跤和箭术——营地里的寂静

每年的9月，皇上常常热衷于狩猎。这一年是1711年，为了让我们欧洲人见识这项运动，他带上了我们五个人和他一起去。11日我们出发到喀拉和屯(Kara-kotton)去，这是一个当年汉人驱赶西鞑鞑人时毁灭了的古代城市。建造前面描述过的热河行宫之前，陛下常常在这个地方度过夏季的几个月。在这个地方，除了那些宫殿外，还有几幢大房子没有被毁掉。部分是皇帝修造起来，合他所用，还有部分就是汉人们修复起来，为贸易所用。尽管皇上放弃了这个城市，但这里还保有相当可观的人口。

12日一大早，我们又踏上旅程。走了20多英里，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蓝旗小营(Lan-cheee-siao-ing)的地方。我们在帐篷中过了这个晚上。除了准备迎接皇上和嫔妃们的宫殿，这个地点没有其他的人居住，余下的所有陪同人员，都住在临近高地的帐篷里。从高处瞭望，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军驻扎的营地。超过三万个士兵随皇上到达热河，但只有一万二千人陪他来打猎。但是他的随从人员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集合时的人数要超过三万。早在皇上到达之前，山坡上就修造好了一座庙宇。整座山被士兵们包围起来，不允许任何人通过，因为皇上要在这里和他的嫔妃们下马落脚，然后再由这里进入宫殿。随他而来的嫔妃们坐的是六辆马车，三辆黄的，三辆黑的。前者为皇后所用，后者是妃子的。那些皇太子们在另外三辆马车里，一辆黄的，二



辆黑的。每辆马车坐四个嫔妃，她们按照满人的风尚，盘腿而坐。这些妇女所经之处，每个人都必须赶快离开，自己躲起来，看不见她们，也不被看见，以表示敬畏。那些履行义务时稍有差迟的人，一定会被官员和太监们一顿痛打。但是我们欧洲人还没有受到如此严厉的对待，尽管我们经常宫廷里碰到她们，来不及回避。中国人被无情驱赶的时候，我们却全然不受骚扰。

13日破晓前，我们就离开了喀拉和屯，前往另一座古城波罗和屯(Poro-kotton)，这里也同样被汉人摧毁过。次日，皇上在一条流经的河里钓鱼，过了一天。然后又出发，到达了一个叫做伊巴旗亚(Epakia)的地方，在这里陛下是最后一次睡在行宫里，因为往后的路上，帐篷就是唯一的住所了。半路上，树起了三顶用白色帆布做成的圆形大帐篷。里面是用同样材料做成的黄色的幔帐。一顶皇上用，再一顶给皇太子们，第三顶给妃子们。还有一些蓝色帐篷，是为太监们准备的。中午的时候，陛下在这里停留了二个小时，用餐和休息。在晚上到达的地方，我们发现是同样情况的帐篷，休息的方式也一样。

经过一天的休息和一天的旅行，我们在17日的下午开始了他们叫做“小猎”(little hunt)的狩猎，就是猎鹿、野兔和野鸡。我们欧洲人总是走在大队人马之前二个小时路程的地方，皇上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全军将士的马队腾起的灰尘和造成的混乱。但是现在为了让我们能欣赏这运动，他要我们紧随在他后面，不离开他的视线。我们到了一块被茂密植物覆盖的草原，士兵们围着皇上，组成了一个半圆形，皇上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他的全家和随从都跟着他，全部用弓箭武装着，还有猎鹰掩护。

当这个半圆形的猎阵缓步前行时，可以看到从草丛和灌木丛里跑出来无数的野鸡、野兔和鹿，四处惊逃。为此目的而训练的猎鹰被放出来，扑向奔鹿，箭矢和投标射向野兔、野鸡。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们走到了草原的尽头，就不得不跨过鞑靼的山谷和山丘，寻找另一块草原。这样的打猎重复了好几次，方法都是一样的。

穿过了好几座山岭，我们现在到达了一块空地，四周满是

青翠的高地。清晨时分，猎鹿开始了。这里我将详细地描写，他们和我们的打猎方式十分不同。在这两个场合，一万二千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分成两翼。一翼向东走过去，然后转向北去。同时另外一翼向西走过去。在队伍前进的时候，每隔一箭矢的地带，就留下一个士兵，直到最后包围了整个山丘。然后，一声令下，他们马上慢慢地向包围圈的中心挺进，保持着这样的队形，驱赶在他们前面的鹿群，直到相互间的距离不足半箭之地。这时，轮换前进的士兵停了下来，第二梯队继续前进，组成了两个包围圈，一圈和另一圈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此后，他们所有的人都保持向同一方向移动，直到内圈的士兵们靠近到能够相互握手的距离，这时又划出了第三个包围圈。当他们之间还保持有一定距离时，就继续前进，直到士兵和马匹之间的包围圈相互挨靠在一起。

里包围圈，或者说第三包围圈，与第二包围圈的距离不足一箭之地。但是从这里到外包围圈的距离就要远得多。三个包围圈的最终位置确定后，皇上带领皇族中的男性成员和其他皇亲国戚，进入核心地带。最优秀和最熟练的猎手围着皇上，武装好以保护皇上。嫔妃们被送到建造在周围山上的亭子中，在那里观看狩猎，却不为人们所见。我们也被分配在相似的地点，不过是留在马背上观看。

一声令下，皇帝亲自开始追猎，用弓箭射杀了身边大群中的很多牡鹿。疲劳的时候，他就允许太子们和皇亲国戚们仿效他。牡鹿们发觉它们已被围困，且处于四面杀戮之中，便企图冲破包围圈逃跑。但是士兵们早就习惯于此，马上用喊叫声，用马刺拍打马鞍响亮的声音，把它们赶回去。可是仍有许多牡鹿，在痛苦和恐惧的驱使下，越过马匹，用它们的鹿角，竭力冲出一条血路。这时，第二包围圈的士兵就竭力要把它们赶回到当中去。如果他们还没有成功，那些第三包围圈的士兵就被允许杀死这些精疲力竭者。没有什么动物有机会从士兵那里十分安全地逃出去。

老虎总是喜欢住在鞑靼地区最险峻的深山老林里，但是有

时也可以在丘陵地带发现它们在寻找鹿和其他猎物。要是发现老虎不止一只的话，包围圈就马上解散，士兵们小心地退回到营地里去，本年就不再试图在这里打猎了。然而，如果只发现有一只如此凶猛的动物的话，士兵们就下马，分成五人一组，占据各处地形，手握长枪，而不是弓箭。准备好了以后，放出一群猎犬，这不是为了猎杀野兽，而是用它们的吠声来恫吓老虎，把它从虎窝里赶出来。这一招马上见效。老虎现身时，士兵们依然不动声色，因为很清楚野兽的本性就是攻击。老虎盯住一组士兵中的一个，迅速地冲向它们。到达一定距离的时候，老虎更是马上跳跃起来，扑向它们。而这五个人，眼睛盯住，握紧长枪，等着老虎靠近时，用枪尖迎上去，猛力刺进它的胸膛，敏捷地将老虎摔倒，迅速地将它杀死。我从来没有机会见过这样的场面，但是我被告知说，只要是单独的一只老虎，从来没有逃脱过，也从来没有士兵受过虎伤。相反，一组士兵被多只老虎攻击的时候，就会有人遭殃。所以只要发现一个以上的老虎，狩猎活动就马上放弃，队伍移向另一个地区。这一地区有很多数量这样的野兽，满族人经常用这种方法捕猎它们，随后在北京出售虎皮，大约每张皮一两。这点中国钱相当于一克郎。

谈过了猎鹿和猎虎，我不能不谈到一个特别的事件。鹿被赋予和狗一样灵敏的嗅觉，当它根据强烈的气味发现老虎时，会立即飞奔逃到山背后去，以使自己的气味传不到饥饿的猛兽那里。几年前，当狩猎包围圈紧缩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块避风的山坡，发现那里被像鹿皮一样颜色物体所覆盖了，原来是一大群鹿躲在这里。这些鹿被猛兽吓坏了，以至于当大批人马靠近时，它们都不想逃走，让自己像绵羊一样地任凭宰割。这场屠杀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皇上猜想周围地方的鹿群已经全部集中到这里来了，于是他就命令打开包围圈，以免这种动物被完全灭绝。

皇上还参加另一种欧洲人不知道的，又不太疲劳的游猎运动。他会带上前面提到庞大的队伍，在晚上出发。在离选定的狩猎地点不足二英里的时候，他留下了军队，和六、七个猎人，从



头到脚披上鹿皮，一起登上山顶。有一个猎人戴上了一种有角的很像鹿头的面具，藏在灌木丛中。如此的样子，一眼看上去真像是只鹿。皇上和其他人蹲在附近，都带着好使的猎枪，枪杆的头上装着一小片鹿角。一般牡鹿的身后会跟着几只母鹿，它不让任何其他牡鹿接近它们。清晨时，牡鹿会发出本能的好斗的尖叫。于是其他牡鹿闻声而来，斗得不可开交，持续到其中一只鹿被杀死为止，胜利者就把它对手的母鹿据为己有。在这种游猎运动里猎人中会有人吹起了一种乐器，样子和音色都非常像我们的牧羊人称为“土玩”(swine)的东西，模仿出非常相似于鹿鸣的声音。听到这声音，牡鹿会赶紧下山，寻找它们自己以为的对手，而实际上落入枪口，遭遇死亡。皇上发出第一枪，如果不中，牡鹿很快就被其他猎人打死。有一天号角声召来的不止一只牡鹿，同时出现在射程中有两只牡鹿。开火以后，其中一只立即被皇上射中了，而另一只不但没有逃走，反而拼命去结果它的垂死的对手，结果给了陛下机会，被第二发子弹所杀死。狩猎持续约二个小时，白天稍晚以后，它就没有什么效果了。所以每天早上的5点到10点，牡鹿以这种游猎方式被捕杀。

这是康熙皇帝热衷的运动，每年的九、十月间，几乎每次都要改换地点，以便发现更大数量的猎物。如果陛下因为屈从于朔日的迷信，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不能从事这项娱乐，在这样的时期内，他并不因此而无聊。他走出帐篷，坐在某个高墩的地毯上，或者是观看他的满族摔跤手的机警的表演，或者命令他的几个孙子及其他一些高级将官在他的面前练习箭术。有时候，他甚至会亲自出马，和射箭差不多与他一样好的第三子比试。尽管我们大队人马的数量多达三万，这样的环境下，这个人数必然要制造出巨大的吵闹声和混乱，但是当太阳落山，皇帝扎营后，强制下的寂静，使人无比惊讶。一天，德理格和我在日落回到营地，我的朋友命令一个仆人来叫我的向导，想向他问话。这个可怜的家伙抵制了很久，不肯说话。在他主人的逼迫下，他最后顺从而战战兢兢地开口了。一开口，他就被值勤的士兵抓住，重重地鞭打了一顿。



第十五章

中文字——皇帝的赏赐——基督宗教的危机——谈话——严格的纪律——废黜太子——皇上的六十寿辰

我们逗留在畅春园的时候，我向陛下呈上了一些中国风景画的印本，它们是由一位宫廷画家画的，并由我和一位刻工完成。皇上看到这些画非常高兴，命令我用同样的方法刻印一些中文字。考虑到中文作品中很少不包含我们基督徒既不能刻，又不能印的迷信东西，我就选了两个中文字和两个西文字母。对于后者，我是尽可能小心地写好；其他的中文字，我就尽量地写得糟糕。把它们呈送给陛下时，我注意到那些欧洲文字都做得很好，因为我能够写它们；但是那些中文字很差，因为我不能写它们，也就不能刻好它们。我的工作被皇帝善意地接受了，有了天主的恩宠，我就躲避了进一步宣传错误观念的危险。

差不多这个时候，皇上赐给麦大成 (Cardos)、蒂里希、德里格神父和我四件用上等精选绸缎做的外套 (Why-ttao)，夹里做的是貂皮，每件至少值 20 英镑。除了另一件给我用来防雨的大衣外，这是我在为陛下效劳的十三年间，从他那里得到的唯一珍贵的东西。几个耗费了一生时间为他服务的老传教士告诉我，皇上从来没有送给他们什么礼物。陛下认为破格地赏成我们欧洲人供奉于他，已经是荣誉了。对此他曾经很明确地宣布过好几次。

几天以后，皇上起程去鞑靼，但是没有带任何欧洲人同去。这给了我们不小的担心。努力摸清这个新迹象的原因后，我

们发现有一个高层官员向礼部参了一本，刻意地诽谤中伤我们的圣教。陛下把我们全体留下，以免我们会用上书请愿来麻烦他。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在京的传教士除了皇上和朝廷恩赐的优势之外，再做什么也无济于事，现在只能专心致志地坚守我们的信仰。他们努力后的结果是，礼部宣布：欧洲人蒙陛下钦准，定居中国，献身朝廷，实有裨用于制历、造炮和御俄，及其他大量作用。除此之外他们从不开罪于他人，倘是仅仅根据这项指责，就禁止他们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完全不对的。最后决定是，凡那些最后领了“红票”(Imperial Piao)的传教士不能受到打扰，那些还没有做红票的，则驱除到澳门去。这项布告立即被送给皇帝，他亲自在底下批了三个字：“知道了。”(“I approve”)当他从鞑靼回来后，我们齐集在宫前，除了平常的三跪九叩外，还用语言和文字来感谢他。

同一时期，我继续改进雕版工艺。陛下看见我最近一版制出的一些版本后，说它们都是“宝贝”(Pan-pei)。他当场命令我刻印《热河四十景》图，准备把它们和一些诗文合为一册，作为赠送给满族亲王和贝勒们的礼物。他还问我是不是可以带两个中国徒弟，条件是不能把我的工艺传授给任何人。我回答说，除了让陛下高兴外，我别无所愿。皇上马上向北京派了两个年轻人，后来又来了另外几个人，我还算成功地教会了他们。从我到达热河的第一天开始，一个来自显赫家族的年轻人一直来访问我，在权力范围之内，我为他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作为履行一个中国人特有的礼貌，他总是受到我的论点的感染而信服。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转而嘲弄和笑话我的努力。有人告诉过我这些，但我从来没有停止把天主的话语装入他的心中。一天，他来我这里的时候，我正在给另外两个年轻人传授我们的教义，他们催促我指导他们的信仰。这个年轻人请求我允许他旁听。坦承事实：我不是很高兴他来，害怕他可能会影响别人作出信奉基督宗教的决定。不过为了不得罪他，我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我说了大约三刻钟，来证明天主的存在，以及偶像的错误，然后解释了基督宗教的基本神秘性。讲完这些

以后，他们三个人都真诚地恳求我给他们作洗礼。几次测试过他们内心的坚定性后，我无限满足地为他们作了洗礼。

康熙皇帝作了从热河回北京的决定之后，命令我们先行四、五英里。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军队（由无数车辆、骡子、骆驼和马匹装运的皇家行李组成，单是骆驼的数量就达到600只）行进时伴随着的混乱。谈到骆驼，我应该提一下，它们全都是从鞑靼地区弄来的。它们的数量，就像马匹一样充裕。从那些在为了绘制全国地图，测量过全中国的欧洲人那里我还确信：他们从没有在鞑靼地区看见过驴子和骡子。

在一行人停车投宿的地方，我们见到为皇帝建造的行宫。进入这些房子之前，皇帝迷信地命令喇嘛念咒祝福，驱除邪气。那天晚上，大家都盼着过长城，停在另一个离它几英里外的地方，因此许多照看官员已经跨过这道伟大的地区界线，那个设想皇帝会停留的地方，有建造好的凉亭。但是不久就下达了御旨，要他们全都回去。可是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长城的城门，名字被守兵记录在案，名单马上被报送给陛下，受到了严厉处罚。两个被任命来照看欧洲人的官员，被认为已经尽力召回了他们手下的士兵，因此被原谅了。另外一个人穿上了我的仆人的衣服，假扮后，没有被发现，结果也逃过了惩罚。因为卫兵不允许有任何行李拉回来，许多返回的人就只得睡在没有垫子的地上，还有些人睡在露天。当时早晨的天气，已经滴水成冰，甚至连土地都已冻住。

到达北京附近的行宫畅春园的时候，我们怀着巨大的惊恐看到，在正大光明殿前的花园里，八个，或者十个官员，还有两个太监跪在地上，光着头，双手被绑在背后。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皇子们站成一排，也是不戴帽子，手则被缚在胸前。不久，皇帝坐着一架敞开的轿子，出了宫殿，来到皇子们正在接受惩罚的地方。到达这一地点后，他的暴怒如老虎般发作了，一顿责骂降临在既定的皇位继承人身上，太子和他的家人及宫人，都被禁闭在自己的府邸。皇帝在随后的公开声明中，以谋反嫌疑废黜了不幸的太子的继承权，并向国人说明他没有统治能力。在



其他被控事项中，还有说他残暴地沉溺于冒犯行为，中国的法律虽然由异教者颁布，但却对这类事件怀有极大的厌恶。

皇上不能够长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待着，所以几天后他又离开了畅春园，去南苑行宫(Pa - chao, 按下文描述，应是南苑。此音或有误译)，这是另一座规模巨大的行宫，园子里的鹿有如此之多，看上去就像是羊群那样。在古代，这里就是中国的统治者们欣赏快乐乡村生活的地方。但是康熙建立了畅春园以后，只是每年修缮一下南苑，用来猎鹿和其他动物。狩猎以后，他回到北京庆祝他六十岁的花甲寿辰。在中国，“甲子”相当于我们“世纪”的概念。

1713年4月4日，所有各地的主要大员都赶到了北京，来协助大庆，参与这个盛大场合的欢乐，根据他的官价和权位，每个都向皇上呈送了最罕见的礼物。我们欧洲人各自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礼品。给陛下的礼物包括了欧洲葡萄酒，巴西烟叶，都是在中国最为稀罕的东西。还有一磅苏合香脂，一匹最好的亚麻布，两块高洛曼德尔的印花被面，几块饰有白色花边的手帕，四个刺绣荷包，各种各样的剪刀、刀子和小锁，三磅酒石，数学仪器，两瓶香脂，六瓶蜜饯，十二坛腌过的榲桲，八英石的藏红花、树皮、油和药材根。

到达宫殿以后，我们把礼物给官员们看，但是他们说要先把药物去掉，并把礼品总数减至偶数，才能接受这些。他们宣称说，这一天给陛下送奇数礼品或者药品都是一个凶兆。把礼品带回来后，我们中间讨论着不送任何礼物、撤下药品和把总数减成偶数，哪个做法更好些。但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为了避免冒犯，送礼还是权宜之计。关于这个问题，我退了回来，让其他人高兴怎样就怎样。结果他们取出了药品，把数量减至偶数。我们随后回到宫中，像平常一样跪见官员，并祝陛下万寿无疆。我们表示说，只送出这么微薄的礼品很不好意思。皇上的回复说，收到我们表达的好意之后，他非常高兴。在所有以上提到的礼品中，他选了十三件，这被认为是极大的恩惠了。在其他官员中，他只选了一二件，把其他的都退了回去。陛下后来还给了我



一个特别的荣誉，送给我一盒欧洲颜料，是一个朝官送给他的。当此机会，北京全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所有的人都戴上华美的服饰，流水宴席不断，烟花燃放，举行各种不同的庆祝，宛如新年。在以上所有事情中，最让我吃惊的是从畅春园到北京的御道上的表演活动，蔓延三英里长。御道两旁，用席子布置成人工墙，全部用最漂亮手艺的丝绸加以覆盖，每隔一定的距离，还搭建有奇异的房子、庙宇、祭坛、牌楼和戏台。戏台上演出的是说唱剧。我们欧洲人一致认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这么大数量的丝绸。官员们还在京城许多庙宇里举行公共祈祷，祝皇帝万寿无疆，清室福祚永垂。同时，在象征皇帝权威的像前，还有各种各样的跪拜和供奉。

如此庄重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在庙前骑马，每个人都要下马，步行进去，这是中国的普遍习俗。我不知道这个规矩，有一天差点违犯。当时我突然被一群士兵围了起来，他们手里都拿着鞭子，高叫着“下来！下来！”我立刻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不会参加他们的迷信仪式，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他们摸不到头脑地调转马头，疾驰而去。所幸的是，人人都能从胡须上看出我是个欧洲人。假如我是个中国人，根本不用提醒我下马，卫兵们马上就会叫我臣服，用他们的鞭子一顿痛打。



第十六章

公众的欢庆——各省代表——草莓和芦笋——第一个学生——中国人对胡须的看法——俄罗斯教士

1713年4月11日，皇帝离开畅春园，回北京的宫殿，并允许沿途的人民观看。通常陛下出巡，总有大批的骑兵开道，清除街道，叫所有的房子和商店都关上大门，每个巷口都用厚布遮上，这样就看不见皇帝了。皇帝的嫔妃和皇子们通过的时候，也采取同样的防备。陛下出行时总是骑马，嫔妃们乘坐在封闭的车子里。此次庆祝皇帝的六十寿辰，巷口不再禁止通行，门户也不勒令关上，也不把百姓们赶走。大街小巷挤满了无数急于一睹皇帝圣容的人民。皇上骑着马，穿着龙袍。龙袍是用华贵的金丝绣成的，绣龙有五爪，只有皇帝家族才能使用五爪龙。大约有两千名骑兵，排成豪华的阵容，在他的前面开道。紧随他的是皇室的亲王们，再后面就是大批的官员。最后是大群的士兵，杂乱无章地前进，看上去没有一点秩序。我们欧洲人被安排在离宫殿不远处的靠近一座桥的队列中。我们在那里跪着，等候着圣驾来临。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时候，皇上特别问候了每个人，微笑地问我们谁在负责绘制地图。

很多健康的古稀老人，被各省官员从各地送到北京，参与组成一个千叟团，标着自己行省的横幅。他们还带来各种模型和贡品，对称地分列在皇帝将要通过的街道上。他们构成了一道美丽而不寻常的风景。这些老人每人都给皇帝带了一份礼物，一般都是些花瓶和铜器等物件，陛下则给他们每人12两银



子，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五先令，还有一件用御用黄色制成的丝绸长袍。老人们随后在一个地方集合起来，候皇帝过去看他们。人们发现，这个高龄人组成的千叟团的人数竟然到达4000名。陛下对这壮观的场面非常满意，他问了很多人的年龄，用最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待他们。他甚至邀请了所有的老人参加宴会，就让他们坐在御前。他还命令他的皇子、皇孙们给他们斟酒。然后，他又亲手赏给他们每人一些礼物。皇帝给了所有老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大约有111岁的那一位一整套的官服，还有一根拐杖、一方砚台，和一些其他礼品。

值此吉祥时节，人们创作了许多诗歌词赋。我们中有几个传教士恭谦地请求陛下允许把诗文集做一个副本，送回欧洲。皇上恩准了，并命令白晋神父(Father Bouvet)翻译它们。在这些诗文中，给了康熙皇帝神圣的头衔和荣誉，而他也确实在全中国范围内拥有这样程度的崇敬，以至于他还经常得到“佛”(Fo)的称呼。这是一个全国的，人民都普遍崇拜的神祇，我自己就常常听到他被称为“活佛”(Living Fo)。

德里格制作了一架小风琴，只要碰一下弹簧，带有时钟装置的风琴就会自动弹奏音乐。他把风琴带到宫里，请求一个姓赵的官员转送给皇上。但是这个朝官觉得德里格越来越得到宠信，于是拒绝接受它，只是把另一种自动装置的乐器献给了皇帝。不久，赵姓官员病了，德里格利用这个机会，带了风琴进宫。其他官员认为让皇上高兴的职责更加重要，就不顾赵的意思了。他们把风琴送给陛下，皇帝高兴地接受了，对此发明表现出高度的兴奋。

因为皇帝不能忍受在一个地方久待，他从北京回到畅春园后，又于6月2日像往常一样到热河去了。路途全程，可以看到站在路边的成排的当地老年男女。他们手里拿着鲜花，等着陛下驾临，祝福他万寿无疆。这是为了庆祝皇帝的六十寿辰，特别向老人们恩赐的机会，其他时候是不允许任何人在路上观看皇帝的。

到达热河以后，我们欧洲人接到陛下的命令，要我们解释



草莓的用途是什么，在欧洲是怎样食用的。在中国的所有旅行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草莓，只是在鞑靼的山区里，注意到一些这类植物。我还被告知，在中国的某些野外地区也能找到它们，他们就是没有费心照料和人工栽培它们。然而皇上已经知道我们喜欢吃草莓，就把草莓种在御花园里，甚至还花了很多精力来栽培它们。我注意到鞑靼地区生长有蛇麻草和芦笋。但是听到我说这些植物在欧洲被视为珍品时，汉人和满人都大笑起来。

刻印完热河的风景图以后，我把印本呈送给皇上，他对此非常高兴，命令大量复制，送给他的皇子、皇孙和其他亲王们。因为对我把整个《热河三十六景》图装为一册的方式很满意，他还命令我用同样的方式雕刻一套《皇舆全图》。后来我用了44块版子来进行印制，现在可以在我们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大厅里看到这个印本。

随皇帝回到热河以后，我给一个13岁的孩子做了洗礼，他的父母已经是教徒了。就像我注意到的，从刚认识开始，我就看出他有某些杰出的品格，适合成为神职人员。我就进行各种必须的事情，指导他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他是我为此目的培养的第一个孩子。他后来跟我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成为我的现在写作的学院里的高年级学生。

1715年11月，我奉旨到皇帝御前，给两个刚刚到达的欧洲人担任翻译，一个是画家，一个是药剂师。我们在一个侧室里等待陛下御见的时候，一个太监用中文和我的同事讲话。因为没有得到回答，太监非常生气。我马上解释了他们不吭声的原因。听了以后，太监说你们所有的欧洲人长得太像了，一个一个的简直无法辨认开来。我经常听到其他人类似的议论。我们之间的外貌相像，主要应归咎于我们都有大胡子。中国人不剃须，但是他们的胡须很少，毛发寥寥无几。然而就是这几根胡须，他们也珍惜到了极点。有一次，徐日昇神父(Father Perreyra)从一个他熟悉要好的官员脸上发现一根白色须发，急忙把它拔下，还以为替他做了好事。哪里知道，这个官员对此损失是既烦恼

又伤心，拾起了须发，小心翼翼地用一张纸包了，带回家中。这个怪癖，皇帝本人也不例外。有一次，他让罗德神父（Father Rod），陛下的外科御医，给他治疗长在脸上的疮。罗德神父开了一帖膏药，说是为了合适地敷药，有必要剪掉陛下的几根胡须。皇上看了镜子，商量了很久，才命令他的一个最伶俐太监来剪。剪完之后，他马上又照镜子，显出深深的伤感，并严厉地责备那太监粗手粗脚，原本剪去三根就足够了，结果却剪掉了四根。

在北京有一个东正教修道院院长和他的12个教士。他们是彼得大帝派来照看俄罗斯战俘家庭精神安慰的。因为听说了一些有关这班教士们的奇闻轶事，我决定要和他们个人交往，目的是要给传信部写一份有关他们真实情况的报告。按照我们所在国家的习俗，我先是给修道院长送去了一份礼物，然后等着亲自造访。我发现这位院长的举止庄重而威严，服装和陈设都异常地整洁。当他走出教堂的时候，胸前佩带着十字架，手中拿着主教的权杖。他是一个教会分离论者，但在我面前却装得像是个天主教徒。他的拉丁文刚刚够让他听得明白。他还告诉我，他的一个教士也能讲拉丁文，可惜病了。我就去看望这位教士，但是我能够从他嘴里得到的唯一的话是：“懂了，懂了。”（intelligit, intelligit）院长告诉我，他的教派在北京的信徒，最多只有50人，都是俄罗斯战俘的后代。仍然有一个战俘活着，虽然年事已高。我问院长说他已经给大量的中国人做了洗礼的消息是否真实。对此，他回答说：他的洗礼仅限于俄罗斯战俘家庭。他没有指望能给中国人洗礼，因为他不懂他们的语言，他自己大量的教会事务已经需要他付出所有的精力。他们的教堂，就像中国人偶像崇拜的寺庙一样，也叫作“庙”，像我们的教堂一样，门前也有一座十字架，但是边上还有两根横木。他们把天主称为“佛”（Fo），是对偶像的称呼；称教士为喇嘛，如同佛教的和尚。他们在教堂里不举行任何仪式，允许男男女女同时进入教堂，这在中国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他们的男人和我们在欧洲一样，不戴帽子。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包括正规的教



士，总是戴帽子的，中国人认为这是礼貌的标志。虽然院长的服饰是如此讲究，他手下的教士们看起来却可以说是粗陋不堪的。我甚至看见他们中有人在教堂前的大街上玩耍，在中国这绝对被认为是不雅观的，任何稍有体面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



第十七章

对瘟疫的恐慌——蒂里希神父之死——基督徒中的警报——皇帝的确认——他的贪婪——中国学院的起源

1716年夏天，热河有大量的疾病发生，皇帝慢慢认为这可能是一场瘟疫。因此，他命令朝廷内所有御医都单独出去访问病人，分别写出每个病例的报告，并开出治疗药方。所有在热河的欧洲人，还有两个有着精通医学名声的喇嘛，都接到了陛下同样的命令。我们都开始出诊了，但是我们欧洲人不是医生，因此都拒绝开药方，但是那些官员们坚持要我们顺从皇帝的意愿。轮到我的时候，在无效地抗议，徒劳地说不懂医学以后，我漏嘴说出我知道如何治疗便秘痛苦的药方。听说这，官员们急忙逼着我开出这个药方，我便告诉了他们一种按摩方法。向陛下解释这情况的时候，逗得皇上大笑起来。在这件事，真正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听到两个喇嘛关于血液循环清晰而得体的描述，以及关于微生物引起血液循环削弱的谈话。

这一年的9月8日，蒂里希神父去世，让我承受了失去的重大痛苦。我和他一起从广州到北京，自从皇上给了我们在畅春园和热河的房子后，我们一直住在一起。他是死于一种缓慢而可恶的疾病，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疲倦，全心全意地护理着他。皇上也很关心他，对我为他所做的也很满意。我死去的朋友被安葬在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公墓里，陪伴他去那儿是我的命运。从皇帝使用的门里抬出死人是严厉禁止的，我们就走了另一条路，沿着不断高耸陡峭的山峦所包围的道路行走，因此我

也就看到了鞑靼地区和长城的另一部分。

在这一时期，一个住在离广州不远处吉溪(音 Kie-she)，名叫清穆的军事官员，给皇帝上了一封诽谤文书。在奏书中，他企图表明外国的通商和传教对大清朝十分不利。为了对这项指控认真考虑并做出适当的决定，陛下把奏书交给兵部议论。兵部回复说，此事关系重大，应该交由九卿(Kieu-king)讨论。结果建议被采纳了，九卿们决定要对外国人关闭广州；圣教应被禁止；所有的基督徒应被囚禁；教堂应该被拆毁。

听说这些，北京的欧洲人派出了三个传教士，在皇帝面前为他们的事业辩护。三个代表持着请愿书，谒见陛下。他们机警地提醒他，现有的法律是保护基督宗教的。但是这次和一般的情况相反，他们没有得到回答。这使得我们担心一场针对我们的严重迫害正在酝酿。好长时间内，我们都处在极端的忧虑状态。不久以后，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广东总督执行了皇帝的一项密旨，给兵部上了一份奏疏。疏中陈述说，广州的贸易并不会对大清朝的安全造成威胁，不应被停止，但是我们的宗教应该被禁止。皇帝对广东总督的奏疏感到满意，第二天就颁布了一项圣旨：广东的贸易应该重新开放，对基督宗教的迫害也应该搁置。

我们即刻就集中在宫里，想向皇帝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但是还在我们行必不可少的跪拜之礼，并用书面和口头的形式报答我们的感谢之前，大太监魏(Wey)公公走出大殿，对我们说：“陛下说你们不用感谢他，因为他并没有给你们什么恩惠。和去年在相似场合发布的谕令一样，禁止你们宗教的谕令只是被搁置了。陛下的话是说一不二的，从来不会废除他所颁布的谕令。”

每次我们跟随皇上从北京到热河沿途的费用，都是由八爷(Pah-yen)支付的。他是海关里的官员，被责令从他海关运转中得到的利润来支持我们。1718年，随着年龄的加大，陛下的虚荣和贪婪之心也增长了。陛下下圣旨说，以后八爷要把原先用来供给我们日用的钱，直接上缴给库府，充作修缮宫殿、马路、桥梁和其他类似用途的费用。这加起来是一笔高昂的数目，陛下

在这几个项目上，原是应该节省开支的。这个新安排的结果就是：我们每人只被容许用一辆车、四头骡装运行李，还有一顶帐篷、一匹马和每月 12 两银子，但是马匹的花费由我们自己出。所有开销大约要每月 3 英镑才够，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尽我们所能来补足余额。

1719 年 6 月，我像往年一样随皇上去热河。在老口店 (Low-kwo-tien) 附近见到几个天主教徒。他们来请我给古北口 (Koo-pa-kew) 一位垂死的妇女做终傅礼。古北口靠近长城，离这里有 5 英里远。古北口大约有 250 个天主教徒，他们对我们宗教的炽热之情，值得传教士们的赞扬和钟爱。于是我就去给这个垂死的妇女做告解，接着又给她做了终傅和终极重逢礼。应了另外几个人的迫切恳求，我把当天的剩余时间用来听他们的告解。夜幕降临，小教堂里还是满满的很多人，等待着轮到他们的告解。稍事休息后，我又重新开始我的工作。整个晚上我没有合一下眼，都在听告解。但是因为这些被遗弃的天主教徒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做告解，所以他们的告解都很长，以至于我最多只能听 72 个人。由于这个缘故第二天早晨，弥撒刚做完，我又满怀热心地听起他们的告解。所以在我逗留的三天内，我给 199 个人做了告解，给 167 个人做了圣礼，还给 54 个人授了洗礼。

我在古北口授洗礼的人中，有一个人是蒙国巴 (Mong-quo-pah 音译) 国王的王叔。这个王国位于贵州省 (Province of Kwey-chau)，但几乎是独立于中华帝国的，在我刻印的《皇舆全图》里面有这个王国。这位新人教者告诉我，在他侄子的辖区内，不能崇拜偶像、画像或自然神，结果是这个国度没有庙宇，没有僧侣，也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神职人员。他要求大量的宗教书籍，散发给他的同胞，并祈祷能够派一个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天主的“圣言” (Holy Word)。

1714 年，为了给教会培养人才的缘故，我曾经带走了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古北口人。这一次，我不得不在同一地方又接受了另外三个男孩。其中有已被祝福了的殷若望 (John In)，关于

他,我将更详细地讲述。这四个男孩和我一起到了热河。我定了一个分成五个单间的房间,每个单间前面都装有帘子,我在里面放了四张床,其中有一张是给我任命来教导孩子们中国语言和知识的老师用的。然后,我把时间分割成祈祷、谈心、学习和其他事情。这样一来,我刚建立的机构看上去与其说是我所称为的“学校”,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修道院。在这一时期,事实上我除了想组建一个学校外,没有更高的目标,并想以此来结束我在中国的生活。我很清楚这个辽阔的国度是多么地缺乏人手,而欧洲又不能提供。从1580年到1724年,欧洲送到这里来的传教士数量不足500人。我还知道,无论欧洲传教士是多么多,多么热情,但因为语言上难以克服的障碍,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我之前,还没有人能够克服这障碍,让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听得懂他说的话。因为这个原因,加上其他一些我想不必再说的原因,我坚定地相信在天主的教会里,应该责无旁贷地建立一个宗教团体,专门的目的就是使本地人有能力来行使传教使命。但是,因为我既没有经费,也没有便利设施,或者其他任何从事如此伟大的事业所需要的支持,所以我感到自己只能停留在目前的卑谦的境地中。

但是,我的兄弟们和其他欧洲朋友们听说了我想从事中国年轻人教育事业的意图后,赠给了我一大笔钱,出人意料地让我在这个时候就达到了我的需求。在中国,土地出租的利息是一厘二,房屋出租的利息更高达一厘八。我把资金作了投资,所收利息已经足够支付我每年的花费。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还收到了罗马的两个文件,教宗在文件中向我授予了“教廷学院院士”(Apostolical Prothonotary)的头衔,还有米雷托教区亚勒纳城圣老楞佐堂的奉金,还给了我佩戴主教桂冠和使用权杖的特权。在这么众多而尊显的天主恩宠鼓舞下,我现在竭力想扩充我的学校,专门从事于培养本地神职人员工作。但是我的努力受到了亚洲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反对,这种敌意很快让我觉得天主显示的是别的意思,并且中国并不是我想要建立一所成功而繁荣的学校的地方。

第十八章

妇女小教堂——中国人的嫉妒——德理格
被捕——针对学校的图谋——路西奥——殷若
望退出——殷若望父亲之死——殷若望归
来——一个梦

回到北京后，我在一个住在宫殿附近的忏悔者的房子里建了一所小教堂，这样，附近的天主教妇女就可以履行她们的宗教职责了。这个计划的成功，出乎我的意料。我还在北京建了另一所小教堂，地址是在畅春园，两所小教堂都是专为妇女设立的。因为过分的嫉妒和戒备，她们被严加看护，不能进入专为男人设立崇拜场所。耶稣会士在北京有一个专为妇女的教堂，但是六个月才开放一次。在另外地方的两个教堂里，不允许男女同时进教堂，但不同的时间是可以的。在专门指定给妇女的那一天，还有两个卫兵把门，防止男人闯入。

为了表明中国妇女是如何被看管戒备，以及传教士应该多么的小心，我愿意把在畅春园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一天，当我在上面提到的小教堂里，听站在帘子后面的几个妇女依次告解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男人在门口走来走去，观看我的举动。做完告解以后，我询问神职助理那个男人是谁？他想干什么？他微笑地回答说，他是个异教徒，但最近娶了一个天主教徒做老婆，他就愚蠢地认为天主教会允许她作自由的事情。在前一天，她曾经告诉他，第二天早上要出去“作工夫”(Atso-koong-foo)，意思是“办神工”，这是中国人表示做告解的一种方式。因为不明白他的年轻新娘和另一个男人有什么“工夫”可作，所以他在



既然已经答应让她来后，又悄悄地跟在后面，看她到底来做什么。神职助理知道这一情况后，就不再注意他，以便让他的思想能够从嫉妒戒备中摆脱出来。看了一阵子以后，发现我还是在那儿坐着，一动不动的样子，他就走到助理面前说，他想我们俩是疯了，因为我们俩坐着什么都不干，却假装着是有什么工夫在连通。助理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告诉他在帘子另一头的妇女，是一个接一个进来告解她们的罪过，经过合适的纠正和指导后，如果她们有所悔悟，我就宽恕她们。听了这个解释，他显得满意地走了。

1720年2月8日的下午，还在中国新年的欢乐和喜庆之中，有两个当差从房间里抓走了我们的朋友德理格。他们用手绢绑住他的双手，然后带走了他。杜德美神父和我焦急地想知道他被捕的原因及他被关在哪里，就跟着他进了宫。在那里我们发现一个太监逼着他屈膝和跪拜，这是对于皇帝表示忠诚的时候惯常做的。我们被告知说，之所以把德理格抓起来，是因为在早朝的时候，他没有和其他欧洲人一起履行那项义务，特别是他在皇后去世的时候，已经犯了类似的轻忽之罪。皇帝只是命令德理格必须过去，履行上面提到的礼仪。如果他拒绝按照这个命令做的话，就把他用绳子拖到宫里来，逼着他做。但是那个姓赵(Chao)的官员是我们的死敌，他不等看见德理格做出些什么，就越格执行了皇帝的指令，下令说我们的伙伴应该马上被当作罪大恶极者对待，其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全体欧洲人抹黑。

次日，狡猾的赵大人错误地把我的苦恼当作了恐惧，把我带到一边，假装出急切而仁慈的样子，竭尽他的能言善辩，劝告我照德理格的例子行事，除非我想陷入和德理格相似的困境。他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一种暗示，即让我放弃学校，继续在天主的大葡萄园里无所事事。赵大人对我要建立一个中国本土教士团体的努力十分憎恶，因此用尽他的权力来阻扰压制。还有其他多个朝官，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欧洲人，帮着他一起做这件邪恶的事情。他们中有的害怕赵的敌视，有的则是在一



些更基本的情绪之下摇摆不定。这个不正当的邪恶联盟，使用各种计策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良心可说，只要看起来能够让我的学校解散就行。有一天，他们伪造了一封学生家长们的信，说因为我给他们做过告解的古北口士兵们，现在拒绝在死去的官员面前做丧事礼仪，所以要求我把他们的孩子送回家去。还有一次，他们还给古北口同一地区的天主教徒们写了一封信，意图是说我绑架了他们的孩子，怀着各种不良的企图，除非马上把孩子们带回来，否则肯定会招致可怕的惩罚。在其他场合，他们还散布了大量有关我人格的诬蔑不实之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暗示说：皇帝即刻就要给我一些严厉的手段来表示陛下的不悦——他们试图以此来动摇我的决心。

尽管是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我的学生们、他们的父母，还有我自己，大家的决心坚定不移。但是为了尽可能地不要激怒更多的敌人，我决定除了目前已经接收的之外，不再多招学生了。于是我就写信让那一位尤路西奥(Lucio U)不要再来了，当时他正从江南行省赶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但是我写给他的信还在路上的时候，他花了40天的行程已经到达了学校，因此我就不能拒绝他的入学了。他要是从来没有踏进过我的大门就好了，读者们会看到，后来他被证明是我漫长而焦躁的一生中最大的烦恼。

就在这个时候，皇上的生日到了，我们又得像往常一样给陛下呈送礼品。德理格送了几个欧洲制造的奇器，皇帝还接受了他送的24张纸张，这些都表明该神父并没有过于失宠。我是怀着相当大的忧虑去送礼物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是德理格的伙伴，还因为我这里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東西。我的礼物包括了4磅欧洲颜料，1磅酒石酸氢钾，还有一些熏香芬芳剂。虽然这些东西并不值钱，陛下却给足了面子，全部收下了我的礼品。几天后我们在宫廷的花园里遇见皇帝，陛下问了德理格的年龄，因此表明他又开始宠信德理格了。

他们察觉到这一点以后，就再也不能利用皇帝的名义来作为恫吓手段了，于是那些迫害我的学校的人们又相机行事地给

北京天主教主教送去一个告诫，这是一系列针对我人格的最恶毒发明的一部分。撇开其他不论，他们这样说：中国天主教会里的某个成员，像某些大太监那样的所作所为，在皇帝的随从队伍里带着大群的孩子行走，这会引来中国人的极大怀疑，成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丑闻；像我这样的情形更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我在热河是住在佟国舅的府中，而佟国舅儿子正是九门都督(governor of the Nine Gates)和御使大夫(Censor of Morals)。为了不得罪那些有权有势的控告人，主教在与他们的沟通措辞中，显然是暗示了说他还没有批准我的行动。同时，主教还劝告我遣返三个学生，留下其他两个作为仆人，除了教他们识中文以外，不要教别的东西。对此，我替自己的所作所为写了一个简短的申辩，对每项诽谤都作了驳斥，还列举了很多事实，这反而让我的政敌们为自己的安全问题担心起来。主教马上把我的申辩转交给他们，他们看了以后感到如此羞惭和惊慌以至于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通过这一渠道来麻烦我。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成功地让殷若望的父亲把他的孩子带了回去。1720年夏天，在我经过古北口的时候，这个不诚实的人装着病了，强行要求我把孩子留下来。

当时另外几个天主教徒也在场，我对他说：他已经在口头上向天主做出了奉献，如果他的病只是假装的，这样做的话将铸成大错。不幸的是，他说自己知道如果他所说的不是真的，那将是对全能的天主的试探，而不只是骗我。听了这些话，我就和其他在场的人一起，祝福了这孩子后就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临行之前，殷若望又和他的大哥来看我们。我问他父亲是否真的病了，就像他头天晚上作出的证词那样。殷若望回答说：到家的时候，父亲亲自告诉他说他的身体很好。父亲装病不过是他带离学校的一个借口，因为他父亲得到可靠消息，说是皇帝马上就要为了我们的不端行为，处死所有的人。

可怜的孩子以泪洗面地过了一夜，眼睛红肿，脸色苍白并且虚弱。他跪倒在我的脚下，试着要作告解，但是不断的痛哭几乎让他泣不成声。告解完了以后，他自动地发誓要回到学校，一

且天主给他机会的话，他就加入教会。当时我劝告他要耐心、持久并满怀信心地对待天主，还又一次祝福了他。可是殷若望还是非常伤心，说在古北口的山区里，没有人能够引导他走上拯救之路。我把自己脖子上带着的十字架取下来给他戴上，这十字架在我所有的旅行中都引导并安慰了我。我向他保证说，如果询问仁慈的天主，就会得到远比从我这个可怜的老师这里能够得到的更好的精神教益。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于是赶紧骑上了自己的马，怀着一股撕心裂肺的分离的悲伤，踏上了日程。

我离开后不久，有朋友忽然前来，并告诉殷若望，说他的父亲快要死了，当时这年轻人正在作祈祷。他马上赶到父亲的病榻前，但是只来得及看到父亲在咽气。他父亲得了中风，临终找来的是大夫，而不是告解神父，死的时候并没有领受圣礼(Holy Sacrament)。我这一次可怖的造访，给古北口的天主教徒们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他们认为这是全能的天主对不虔诚的欺骗行为的惩罚。办了他父亲的葬礼不久后，殷若望决定重新加入我们学校。尽管他急切地祈祷和恳求，母亲再也不让他做这些圣事了。她甚至动用了父母亲的权威，用铁链和木枷来惩罚他，防止他逃跑。发现被隔离在如此炽烈地向往的生活之外，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夜又继日地以泪洗面，几乎很少吃食任何东西。到了月底，殷若望就骨瘦如柴，精疲力竭了。他母亲觉得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救他的命了，最后只能答应他走。殷若望不期而归的那一天，我们全体成员都非常高兴。他曾经是那么的苍白、哀伤，现在一下子恢复成自然的肤色并且精神愉快，就像是奇迹发生。他的大哥得到这出乎意料之外的安慰，激动得泪如泉涌。

有一件单独的小事情与这场事件有关，我把它告诉读者们，让读者们自己从中获得启发。那还是1720年2月事件发生后的3月28日，助手告诉我说，他听见殷若望晚上在哭泣，但是没有弄清楚他伤心的原因。于是我去看了这孩子，逼他说出是什么病痛折磨着他。他告诉我他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令



他产生极大的沮丧，以至到现在还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仿佛有一股真实的力量控制着他。他说他在梦中见到了自己的一系列遭遇：他的退学离校、父亲的突然死亡、母亲的固执己见、他的坚持和随后而来的病痛，最后是回到我们当中。他陈述的所有这些，后来都变为了现实，在时间顺序和细节精确上分毫不差，令人惊异。

我在创办学校的时期，必须面对很多竞争。我说了很多这样的困难重重的事，是让别人可以以我为鉴，即在你事奉天主的工作中，永远不要指望有人来赞美和帮助你，正如或早或晚，你会从主那里得到充分的回报。所有由撒旦掀起的风暴，在起航的时候就扑向我脆弱的小舟，这倒是一个吉兆，因为如果他不惧怕最终所产生良善的结果，那人类的敌人就不会用这么多的邪恶来反对我们的进步事业。

第十九章

俄国公使到达——礼仪要点——皇帝的声明——彼此妥协

1720年11月29日，沙皇彼得大帝派出伊斯梅洛夫伯爵(Count Ismailof)到中国担任公使，他由90个人的随从陪同，在喇叭、锣鼓、军号和其他军乐声中进入北京。伯爵骑着马，他的一边有一个大高个子，另一边却是一个侏儒，都在步行。他的随从有的在前面开路，有的在后面压阵，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所有的人都佩着剑，身着盛装。伊斯梅洛夫伯爵是一个善良的人，有着贵族的堂堂仪表。他能说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还略略懂得一点拉丁文知识。

为了和这个公使谈判，康熙皇帝任命了一套班子，由一名官员和两个朝臣组成，都是具有很高权威的人物。此外还有五个欧洲人和一个中国人充当翻译。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有幸和其他人一起访问了伊斯梅洛夫伯爵。互致问候以后，公使说沙皇有一封国书让他亲手交到陛下的手中。在被问知国书内容后，他制作了一个副本，交给了谈判班子。中国通事范罗思受命读此书信，但这信却是用拉丁文书写的。这个可怜的人只认得几个拉丁文，他曾经不得已请求过教宗豁免他每天用拉丁文做弥撒。他嘟嘟囔囔，含含糊糊，直到边上的人看不下去了，要他说出里面的意思，他才被迫承认他不能翻译出来。然后这封信就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立刻就读出了其中的内容。信中透露出的意思是，沙皇渴望加强迄今为止已与皇帝建立的两国之间良好的默契。为此，他派出了伊斯梅洛夫伯爵作为公使，请求陛



下能够详细倾听一下他所提交的所有事情，在他所有被委任的使命完全安排好之前，不要把他送回莫斯科。

谈判班子的成员们不断地询问国书中提到了什么内容。但是慎重的伊斯梅洛夫总是回答说，在这封国书交给皇帝本人之前，他无权说出其中的主要内容。伯爵的外交能力是公认的，但是班子成员们坚持要先知道内容，公使最后在讨厌的纠缠和要求之下，说出了他的全部任务是要签定一个俄中条约，以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误会。在我们全神贯注地与公使谈话的时候，陛下送给他的宴会餐到了。当公使被要求向皇帝谢恩，也就是习惯上的跪拜时，他拒绝了。公使声明说，他代表自己的皇帝，与中国皇帝在级别上是平等的，他只能按照俄罗斯的习惯来完成觐见。班子成员们不能得到更多的让步，不得已认可了他的做法。

皇帝马上得知了这些情况，他对国书的内容和公使带来的使命十分满意，但对他不肯履行必不可少的跪拜之礼感到不悦。但是皇帝佯装不知，为了让他臣服而又不使关系破裂，他设置了一个计谋，邀请伊斯梅洛夫伯爵参加私人召见，并推托说皇帝会在下一个正式场合接受沙皇的信。公使马上就察觉了这个圈套，他对皇帝愿意单独召见他表示感谢，但补充说他是为沙皇效劳，请求必须先呈递沙皇的国书。

这时候，皇上让我们告诉公使：鉴于他在递交沙皇国书之前拒绝面见皇帝，陛下既不会接受信件，也不会接受沙皇的礼物，他最好还是回俄罗斯去。对此，伊斯梅洛夫回答说：在执行完沙皇所交付的使命之前，他不能接受任何个人荣誉。当被问到递交国书的时候，他会不会履行跪拜之礼的问题，公使回答说不会，宣称他会按照欧洲使节参见亲王们的敬拜礼节行事。

于是皇上让他的一个太监总管和侍从，还有礼部尚书、五个欧洲翻译去告诉公使，不管沙皇如何，他必须履行跪拜。按照中国的不可改变的礼仪制度，参见使节必须要跪拜，他要把国书放在案桌上，然后由本国重臣取过来，递送给陛下。虽然这是规矩，但皇帝在特定的场合也可以灵活处理，在大殿里召见

他。也就是说，除了这种向皇帝呈送什么东西的方式外，还有陛下政府的正式渠道，公使可以在这两种方法中选择他觉得最合适的。对于那个正式渠道，公使报之以微笑。对于另一个方式，他回答说：他的主人命令他把国书送到陛下的手上，他不会违背沙皇的指令。太监告诉他，如果他对这些方式都不满意，他可以自己设法去求见皇帝。比如可以到北京去，在陛下面前跪下，在宫中过道上向他陈情送信。伊斯梅洛夫伯爵也拒绝了用这种方式让沙皇和陛下交往的建议。他坚持要亲自把国书交到皇帝自己的手上，地点也应该在他平时接待其他国家使节的宫殿。这种专横，极度冒犯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太监总管笑了，侍从则说：公使真是疯了。不用多说一个字，我们都站了起来，中断了会谈。

翻译们再次被召见入宫。皇上亲自拟了一道谕旨，给大家翻译，并且指令说翻译们应该是代表陛下的部臣们的工作，应该要求公使对每一条内容都给予明确的回答。翻译工作由我们中的一个人专门负责，他对满族语言掌握得不够，使得这个声明的有些部分不是很清楚。

帝国的谕令，是由理藩院向公使宣读的，内容如下：“大清皇帝历来接待朝贡，怀柔远方。皇帝与俄王关系多年，交往熙洽。初闻沙皇有使节来京，便派出重臣加以会见，招待入馆，并赐于各项旅途所需。一俟公使入京，陛下便派出某大总管，携御膳房所制菜肴前往探视，并谕知不日即可在朝廷接见公使。陛下想必凡此恩赐，能使公使打消其无理之要求，不使亲手递交书信与皇上，因其不过为俄皇一使臣而已。此人之行为，实有嫌疑。如其指望得到俄皇亲自来访所应有之隆重声誉，则此地之礼遇实有未足，还有其他礼仪必须施用。然此人毕竟不是俄皇，仅仅是其特使，甚而俄皇陛下亦未授其全部信任，虽然他夸称不止为公使，还任为首相。他或是个商贾，只是假扮公使而已，不如去忙他的生意。他既已为俄皇所派，充任为使节，则不应如此无理，亦不应固持己见亲手呈递书信，应守中国不可变易之礼仪，恰如熟识朋友往来之故。此间道理不仅公使必有所知，且

俄皇本人亦必知之。公使之行事规矩，乃使其出使目的为不可行之事。”

这就是帝国声明的大致意思。如其结论所指出的：公使的行为如此可疑，理藩院应该严格审查该事件，对他每一点的细节解释都要弄清楚。

我们翻译结束后，管事太监问我们，公使和他的随从先生们是否懂得拉丁文。我们回答说，他们懂得一些，但不多。于是他就要我们翻译成意大利文。我担心伊斯梅洛夫伯爵会怀疑我有份参与了这份饱含抨击的谕令，并惹起沙皇对传信部的仇恨，我就回答说：公使的法语比他的意大利语更熟练。有鉴于此，管事太监马上命令说要把谕令翻译成法语，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巴多明神父的头上。我很幸运地由他把我从这份差事中解救出来，因为伊斯梅洛夫伯爵对其他翻译已经抱有怀疑，但对我倒是从来没有。如果换了别的样子，会让我很伤心的，因为后来北京主教用罗马传信部的名义，把公使推荐介绍给了我。

皇帝谕令的法语译本，还有用满文字写的原文副本，一起由官员们送给了公使，不再使用翻译。我听说公使对信中加之于他的斥责一点点都没有感到惊讶，他再次表示自己的决定：不答应按要求行跪拜礼；要把国书亲手交给皇帝。

官员们回给了公使一道皇帝亲自拟定的谕旨，语气较为和缓，用的是内阁的名义。伊斯梅洛夫伯爵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宣布，不能行跪拜之礼，并要求允许把沙皇的信亲自交到皇帝的手中。

陛下知道这个使节坚持固守他的决定，就不再以内阁的名义和他往来，只是由他直接派了几个官员由翻译陪伴（我是其中之一）去谈。我们陈述说：皇帝把俄皇家族和他的家族认作一家，俄皇与陛下同样尊贵等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表述，以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补充说，将来皇帝派使节觐见沙皇时，一定答应给沙皇行脱帽致敬礼，尽管在中国除了有罪的囚犯露出头颅外，没有人会脱帽，此外还会行使所有其他莫斯科习惯的礼仪。我们说完这些话后不久，中方的主要官员马上在



公使面前脱下了他的帽子。公使这次满意了，答应按照中国规矩，行使跪拜之礼；还答应让皇帝坐在皇位上，在他的注视下，把书信放在书案上，以便让一个朝官随后把书信递给陛下。该官员进一步说，公使获得皇帝特许，可以用他进入北京城的同样方式，集体进入紫禁城大门，也就是说佩着出鞘的剑，乐队伴奏和其他仪仗。此后，伊斯梅洛夫伯爵竭力要证明他的行为的正当性，还取出沙皇授意给他的指示原文，除了很多其他指示之外，他被命令说不履行跪拜礼，并坚持要亲手把国书交到皇帝的手上。最后的安排是：觐见之礼应该在本月9日举行。

第二十章

招待伊斯梅洛夫伯爵——宫廷晚宴——
对欧洲传教士的赞颂——礼物——皇帝给沙皇
的劝告

伊斯梅洛夫伯爵在商定的那一天进宫，根据达成的协议，用通常的礼仪和跪拜，向皇帝递呈国书。递交国书以我描述的方式进行。

公使和他的 90 个随从在正大光明殿 (The Great Audience) 外面敞开的门厅里等了好久，皇帝由内阁的重臣们随从着进入大殿，从左边的几步台阶登上他那华贵的皇位。同时其他的人从右边登上台阶。陛下在一个装饰华丽的椅子上坐下，他的三个皇子则分坐在他右侧的坐垫上。稍远处，站立着的是禁军、侍从、太监、宫廷大臣，还有我们欧洲人。我们这些翻译穿着高级官员的服装和标志。皇位的下面，也就是正大光明殿的地面上，一排排地放满垫子，其上跪有大清百官之首——宫尹 (Koong-yeh)，即清室的总管，还有许多其他较为下级的官员。皇位前面，靠近大殿的入口处，放着一张案桌，上面有给陛下准备的甜品。在大殿往下几级台阶的门厅里，放着另一张案桌，伊斯梅洛夫伯爵就站在案桌的那一边。按照大清的礼节，公使应该跪在大厅里，把国书放在这张案桌上。但是皇帝让人把这张案桌搬到大殿里面，这样公使可以把位置靠前，这是给了很大面子的事情。

随后，伊斯梅洛夫伯爵就进入大殿，他马上在案桌前跪下了，把沙皇的国书用双手递上。当初对伊斯梅洛夫伯爵显示过

宽厚仁慈的皇帝，现在想到正好可以羞辱他一下，就让他在这个特殊的姿势上停留了一段时间。骄傲的俄罗斯人对此待遇感到屈辱，他用把头撇向一边，加上一些嘴部动作的方式，发出了明确的愤怒讯号，这些动作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是不合适的。陛下严肃地要求公使本人可以把信拿给他，伊斯梅洛夫伯爵跪下照办了，他亲手接过了国书。这是皇帝又一次给了伯爵荣誉，赐予了他原先已被拒绝的恩惠。

递交国书以后，公使在礼部尚书的陪同下，回到先前的大厅里。不久，他又移到皇帝座位对面的大殿中央。公使后面站着他的主要随从，再后面是他的仆人和士兵们。

当所有出席人员排列整齐，各就各位后，司礼大人发出一个特别的讯号，他们全体跪下，隔了几分钟后，他们的头部三次触地。做完这些，全体起立，然后又跪下，再叩拜三次。以这种方式，他们跪了三次，叩了九个头。做了所谓“三跪九叩”之礼。

公使随后再次被带到皇帝的跟前，通过我们的翻译，陛下问站着的公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伊斯梅洛夫伯爵用法语回答说：沙皇派他来，先祝陛下的健康长寿，然后确定一种业已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还有就是他自己也借此机会向陛下请安。

皇上用非常礼貌的态度一一作了回答，然后补充说：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谈论政事并不合适，可以另外赏给他一次机会加以召见。随后陛下就让伊斯梅洛夫伯爵及其随从坐下。公使被允许坐在矮垫子上，靠着上面提到的那位宫尹的边上。他的四个主要随从被安排在他后面一排的末端，所有其他随员都被告知留在大厅里。他们全都坐定后，陛下开始说话，对着公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说：在此会见场合，请公使不要因为看见欧洲的传教士穿戴着大清朝的高官服饰而感到吃惊。我们都不是官员，而只是按照他的意思打扮成这样的，如此他们才能参加这个盛典，因为不穿这服装，无论是谁都不能进来。尽管我们不是官员，但不能推想说我们不配这样的荣誉，而仅仅是他还不愿意升级到这个尊贵的地位，或者其他荣誉，说不定什么时

候他就会赐给这些。他还请公使不要见怪，因为他把我们安排在比公使、重臣及爵爷们更接近皇上位置。我们在这里是一个特殊的位置，只在特定的场合才能赐予。伊斯梅洛夫伯爵占据的位置，也是皇帝赐予的。他还希望公使理解，住在北京的欧洲人并不是被迫的，或者像是战俘一样囚起来，带到首都来的。他们都是自愿从遥远的国家来到陛下身边，供奉左右。即使像今天这样帮助皇帝翻译的事，也不是出于命令，而是受到邀请。他最后宣布：在他登基后的全部日子里，我们没有犯过什么应受谴责的过错。皇上给我们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想赢取我们的忠心。陛下这一天在他的御座上很高兴地说这说那地赞扬欧洲人，不仅是为了告诉公使，而且还为了在他的朝臣面前显示公正。朝臣们很惊讶我们得到如此高的荣誉。

皇上赞扬完了欧洲人之后，他向公使就各种题目提出了很多问题。这时候，他把公使请到御座前，亲手递给他一杯由金杯盛着的葡萄酒。他还屈尊俯就地给前面提到的四个随从赐了酒。然后皇上又让内阁大臣们赏赐留在大殿门口的余下的公使随同人员。五人一组，赐给御酒。同时，给公使端来了一桌的甜品。然后，又搬来一张桌子，放上了从皇上御桌上拿来的佳肴。所有的人，都以满族人的方式坐了下来，就是盘腿坐在非常低矮的垫子上，桌子差不多只有一英尺高。所有坐在大殿地上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每人都安有一张桌子，供我们吃喝所用。陛下则留在御座上。

宴会期间，皇上吩咐乐师演奏和吟唱中国风格的乐曲。稍后，两个年轻人被叫来了，跳起非常优雅的舞蹈。我们欧洲人对这种表演都感到非常惊讶，公使的随员们在门厅处欣赏着相同的娱乐表演。两个小时过去后，皇上退席了。我们则到皇宫的另一处，继续参加欧洲人的聚会。在这里，我们全都跪拜在官员面前，对陛下刚才提到的给我们的那些荣誉表示感谢。陛下请清福(Ching-foo)公公传话给我们说：刚才他讲的那些赞誉我们的话，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良好品格，缓和一些对立的情况。还有，尽管他惩罚了德理格，但是应该看作是家务事，就像



父亲对待他的儿子所做的那样，不足与外人论。

次日早晨，皇上要宴请公使及其全体随行人员。因为陛下是在畅春园，而公使住在北京，我们不得不花上三个小时路程，骑马前往。太监向公使问了很多问题，一部分是皇帝让他问的，另一部分则是满足他自己的好奇心，我们一直被缠到下午三点才到达。我们后来是疾驶回宫的，因为我还没有吃过早餐，我觉得自己浑身无力，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没有从马鞍上掉下来。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痛苦经历，我只是提这一件，想告诉大家说，我们只是帝国朝廷里的一种荣誉性的“苦工”(Galley-slaves)而已。

在一个先前约定的日子里，公使代表沙皇赠送礼物。礼物包括了两块镶嵌有钻石的怀表；一只装在水晶盒里的时钟；一幅沙皇的画像。中国人一点都不欣赏，他们不喜欢看到沙皇的画像作如此公开的陈列；还有一只精美的饰有水晶的首饰盒；八面大镜子；几箱子数学仪器；一个大的半球仪；一个水平仪；一架显微镜；几架望远镜；一百张黑貂皮，以及同样数量的貂皮和狐皮；还有几件沙皇自己点中的礼品。陛下接受了所有礼品，正如我在别处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是给予特别荣誉的表示。皇帝回赠给公使和他的四个主要随从每人一件御制的景泰蓝鼻烟壶。

皇帝接受了这些礼物后，公使和两个主要随从又被陛下请到他的居处。履行了通常的跪拜之后，他们又被邀请赴宴，也让我们这些翻译参加。这一次，专门讨论了和平的议题，商量如何能够在两大帝国之间保持友好。皇帝再三地命令俄罗斯人安静地听他讲，用他们的文字记下他所要讲的话，这样他们可以向自己的主子报告。他同样也要求满人用自己的文字，欧洲人则用他们各自的文字记录下来，以后提供给公使一个精确的翻译文本。这样，公使就能把皇帝想传递的重要旨意带给沙皇。在这个夸夸其谈的开场白之后，陛下开始说：两个民族的和平与福祉，取决于俄皇的健康。听说沙皇是多么地喜欢航海，陛下急着警告说，要当心大海的反复无常。皇帝用一句谚语结束了他庄



重严肃的说话：“高山临产，将要出生一只可笑的耗子。”（Parturiunt montes, nascetur ridiculus）伊斯梅洛夫伯爵后来告诉我，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没有笑出来。

皇帝的大象，养在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会所附近。陛下让公使和他使团的四个主要随从哪一天去和这些传教士们联欢一下，然后陪同他们一起来宫内赴宴。这里有33头大象，它们能表演各种各样的技艺和把戏。在给公使表演中，大象们用它们的鼻子吹喇叭，跪下来，或者随着饲养者的指令跳起舞蹈。

那天我们和伊斯梅洛夫伯爵及他的秘书们一起回到宫里后，陛下赐给了他们每个人一件黑貂皮的华丽外套，一个金属的艺术花瓶和两杯葡萄酒。

公使还应邀参加了法国耶稣会士住所的宴会。法国耶稣会士们安排了精彩的娱乐节目，表演了那个地方能找到的最好的音乐，听起来非常地顺耳。接下来是舞蹈和杂技表演，使出席者都感到非常地兴奋，赞赏不已。

1721年3月13日，伊斯梅洛夫伯爵在北京乘车，踏上了向莫斯科的归程。他们随身携带了皇帝赠送给沙皇的很多珍贵礼品。因为我的注意力马上要被另外的事情吸引过去，我就不试图来描述这些礼品了，或者是公使的其他任何活动，以免犯什么错误。我只想补充一个小插曲，也许能够给出一个中国皇帝有多么富裕的概念。一天，我奉命给公使和他的一些随员们展示一下陛下的钟表收藏。一踏进房间，伊斯梅洛夫伯爵大吃一惊，这么多数量和品种的钟表展示在他的面前，他开始怀疑这些东西都是赝品。我请他亲手拿几件看看，他照办后，吃惊地发现它们全是极品。当我告诉他，现在看到的所有钟表都是准备拿来送礼的，陛下拥有的钟表数量远不止这些时，他更是惊讶不已。



第二十一章

皇帝在床上——热河生活——一种报
答——艰难生存——希普病了

俄罗斯使节在北京的时候，米兰教士兼内科医生佛奥塔博士(Dr. Volta)也来到了畅春园。他被引见给皇帝的时候，我受命陪同他。问了他几个问题之后，陛下就让他号脉。佛奥塔博士马上照办，但是他说为了作出陛下健康状况的正确诊断，必须在这个晚上和次日早上号脉。这就使得皇帝在就寝后，和起床前再次被号了脉，随后佛奥塔博士向皇帝宣布说：陛下的健康状况非常好。利用这个机会，我观察到：皇帝的床宽得足以容纳五六个人，且没有床单。床褥的上下两部分都是用羊皮铺垫的，皇帝不穿任何睡衣，就躺在两层褥子的中间。因为很少会有陌生人看见皇帝躺在床上，陛下就对我们说：“你们是外国人，倒是看见我躺在床上。”我们回答说：之所以有这样的荣幸，是因为陛下把我们视同亲子。陛下加上一句说：“我认你们是自己的家里人，很近的亲戚。”

当我们再赴热河的时候，就注定了我这一年的生活很像是囚徒了。皇上对希普(Scipel)的雕塑很满意，惟恐这位艺术家偷偷地为别人干活，因此陛下认为最好还是把他关在内宫里，于是就任命我担任翻译，两人都关了起来。这个星期里，皇帝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外宫准备好，使卫兵把守，对内阁所有人开放，用来办理公事。但是内宫里，包括了陛下的寝殿和闺房，则由太监看守，哪怕是皇子和皇侄们也不让进。如果有事，宣陌生人进去，他就只能在20个太监组成的护卫队伍下行走，太监们寸步



不离,时刻提防着,以防备他看见任何宫内女眷。

按照中国人严格执行的规矩,皇帝不能住在他父母曾经住过的房间里,也不能坐在他前任者的皇位上。因为皇帝的母亲在几年前死了,于是就让希普和我占用了她的空屋子。它包括一个客厅和几个其他房间,建在一个小花园里。花园则坐落于一个掌控着一片湖区的漂亮小山岬的顶端。把流经热河的河水引到陛下的花园里后,皇帝构建了一个人工湖和几条运河,并在其中存养了大量的活鱼。

在这个人工湖的另一边,面对着我们的花园是一座小别墅。陛下经常在退朝以后由他的几个妃子陪同,到那里看书学习。中国窗户的高度和宽度,都和房间本身一样大小,因为暑热,夏天都是窗户大开。窗户用纸糊,透过一个小洞,我看见皇帝又读又写,只要那些吵闹女人留在闺房里的时候,这里就像修道院一样安静。透过这些窗洞,我还看见太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捉鱼。陛下有时候会坐在一艘漂亮的小船上,和跟前的五六个妃子一起。妃子们有的是满人,有的是汉人,都是穿着本民族的服装。皇帝的船后面,总是还有很多船只跟着,上面载的都是宫女。

当皇帝需要到外宫上朝的时候,他通常是坐船去。因为他必须要经过我的窗下,因此我就能看见他。他总是和几个妃子坐船一起来,其他的船上还有一些宫女。到达这一地点后,有一扇秘密的门,他把妃子们留给太监负责照看,自己就进到召见大臣的房间里。我几次在花园里看见他,但他都不是步行。他总是在轿子里被抬着,由一群说说笑笑的妃子们簇拥着。有时他坐在像皇位一样的高座上,大群的太监围着他。皇帝看见他喜欢的东西,就突然抛开嫔妃们,把一些捕捉了的蛇、蛤蟆和其他令人讨厌的动物都聚到他面前的毛毡地毯上,就是为了看着它们一瘸一拐地蹦跳逃窜来取乐。有的时候,他还派嫔妃们到附近的山上去采集植物根茎和其他水果。他还假装渴望得到某些妃子,去追逐那个尖叫着的残缺可怜的生灵,直到皇帝把她们中的一个按倒在地上。他就在那里发出畅怀的大笑声,沉湎其

中。帝国的陛下经常是这样度过他的闲暇时光，特别是在那些夏日夜晚的凉爽时分。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在北京，他的周围除了嫔妃、太监之外，别无他者。在我看来，这是最为堕落的生活方式之一，尽管全世界都把这看做是最高幸福。

住在别墅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太监告诉我，如果我想见识一下在中国极其有名的“神佛”（Holy Bonze），从窗户纸洞里就能看到他的经过。我倒是试图去看了一下，但是没有按他指示我的那样从北面看——那里是神佛经过的方向，而是往西面张望。我发现湖边有一个人，穿着红色的披风，戴着华丽的宝石做的头饰，与那种佩戴在中国的女神头上的样式差不多。还有一个大约五岁大的小男孩，在他的膝间说话。后来太监问我神佛怎么样，我回答说：一个如此漂亮、如此年轻的人，如此早地就要学习一种欺骗的艺术，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因为他已经让皇帝相信他懂得长生不老术，还真的让自己变得像神一样，让陛下的一个孩子来仰慕他。这太监听我说到“年轻”、“漂亮”和“仰慕”等词语，就问我是从哪个方向看的。“朝西看的”，我回答说。他开怀大笑，然后告诉我要朝北看，现在还不太晚。在他的指示下，我现在看到了神佛在一艘小船上，由太监陪着，正把他载到皇帝那里去。随后，这朋友告诉我，我看见的这个神佛，其实不过是陛下的一个大妃子，没有被暴露正在呼吸湖边的空气。我所见的在她膝下的那个孩子，正是她的儿子。

每天早晨，除了节日，我和希普就要整理别墅，开始我们新的一天。也就是说，在嫔妃们离开闺房之前，我们必须留在这里，直到她们都重新回到房间里为止，这通常是要等到落日时分。在这些大暑的月份里，她们有时候差不多会在户外待到次日的凌晨一点。那时候，太监就会把我们看管到这么晚。御膳房里会给我们送食物，但常常是凉的。因为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我们极其痛苦。

晚年的时候，皇上变得非常节俭。他听说我们的食物由御膳房配送，就派了清福太监来问：是不是一直收到他答应供给我们的每月12两银子。我作了肯定的回答。这太监就非常凶地

谴责我，说我们是试图骗取双份的配额。但是我告诉他，我们根本没有试图骗取，我们经常请求允许按照欧洲的方式，在自己的房间用餐，但我们的请求从来没有得到回复。这时候，太监又变得非常地困惑。陛下马上被我们行为的正当性折服了，但是他不想我们在晚上离开别墅，以免我们会碰上他的嫔妃们。最后我们所得到的：今后不必在日出时分，而是改在日出后4小时进宫，那时宫女们已经回去进餐了。我们两人都很高兴得到这样的改变，这样一来，就给了我们足够时间来整理房间，并履行我们的宗教义务。

各种各样的因素，已经使得我的健康大受影响。尽管我年轻的时候身材瘦弱，现在则变得又胖又壮，但我却担心这种生活方式会全然地摧垮我的身体。早上去别墅之前，我把胃吃得撑不下为止；下午，吃一块自己带来的面包，和着茶一起食用；回到自己房间，我又胃口极好地大吃大喝。但是，希普就没有这么幸运。他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是一场长期而严重的疾病，几乎要夺取他的生命。

第二十二章

康熙皇帝之死——葬礼——惩罚两个高官

1722年初，我受命担任安吉洛神父(Father Angelo)——皇帝的钟表匠的翻译和指导。由于整天要在北京内府的钟表收藏处度过，而那离我们在畅春园的住处有二个多小时的路程，因此官员们就要我们在法国耶稣会(北堂)，或者葡萄牙耶稣会(南堂)住下来。但是那里的院长们却借口没有地方安置，拒绝接待我们。我决定乘此机会，在北京为传信部的传教士们弄一处房子来使用。我希望皇帝不会反对这个基本想法，要么他就逼迫耶稣会士接待我们。于是我就在耶稣会不知不觉间，买下了一座地段不错，外面有黄墙围住的大宅院。那房子原本是毁坏了，我几乎是重新修造了一遍。房子一到刚能住人的时候，安吉洛神父和我就马上怀着说不出的喜悦住了进去。

同一时期，陛下在海子(Hae-tsoo)旧御苑忽然染上了炎症。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关系，这种疾病在中国北方没有像在意大利南部那样流行。在北京，从9月份到3月份，天气有规则地不断地变冷，然后从3月份到9月份，又以同样的方式逐渐变暖。而在那不勒斯，由于西罗库斯(Sciroccos)的流行，天气可以在一天里面从这一极端跳到另一极端。因为病了，陛下就回到了畅春园，也称为“海淀”(Hae-tien)的宫里。一、二天以后，欧洲人赶到这里来询问陛下的病情。在这个场合，法国和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发现了我购买的住宅，于是主动提出要我住到他们的房子里去。我婉言谢绝了。他们说如果皇帝知道了我做的事，会迁怒于全体欧洲人的。我回答说：尽管我不认为是过错，但我还



是准备承担任何后果。

1722年12月20日，在所住的佟国舅的房子里吃完晚饭后，我正在和安吉洛神父聊天。当时我们听到了一种不寻常的低沉的嘈杂声，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声音从宫中渐渐响起。鉴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我马上把门锁上，对同伴说：要么是皇帝死了，再要么就是北京爆发了叛乱。为了摸清这次骚动的原因，我爬到我们居处的墙头上瞭望。墙角下有一条马路环绕，我吃惊地看到数不清的骑兵，相互之间谁也不说话，驾着马疯狂地往四面八方去。几次看过他们的行动后，我终于听到一些步行的人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就被告知，御医们断定皇帝不治后，陛下指定了第四子雍正为继承人。雍正即刻继位，人人都服从了他。新皇帝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装殓好他父亲的遗体，在当天晚上，由他自己骑着马，还有他的兄弟、孩子和皇亲国戚们随从着，更还有无数手持利剑的士兵们与他们一起，护送灵柩回到北京的宫里。次日凌晨，我和安吉洛神父及希普一起收拾行李，其目的是回北京去，以表示我们对康熙逝世的哀悼。但是，当天我们没有被获准随队前往。

我已经描述过康熙皇太后逝世时，自己和其他欧洲人所做的一切。现在为了新死去的皇帝再做一遍同样的仪式。我们都身穿丧服，和其他传教士一起直接从乾清门进宫。在门口，我们看到有大量官员集中在那里。有几个传教士和一边的官员们说了话后，就随着他们进到内宫门道里，那地方停放着灵柩，葬礼也在那里举行。这时，我看到里纳尔弟神父(Father Rinaldi)他们正在向灵柩走去。这神父是新来的传教士，完全听命于我的辅导。我也不知道他们打算如何开始葬礼。里纳尔弟神父问他们下面怎么办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不会供奉不合适的，或者是偶像崇拜式的牺牲品，不烧纸制的冥器，也不会奠酒。有此保证，我们就随大家一起做了。通过了上面提到的城门，我们进到一个宽阔的华庭，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官员们跪着，全都身着丧服，哭泣着。在典礼官的示意下，他们还时不时地提高嗓门嚎啕大哭，声震苍天。做完后，他们又履行了三跪九叩之礼。

我们也被要求跪下，不过在官员们旁边的一个地方。在这个位置，我们和他们一起哭泣，同样也做了三跪九叩，没有觉得这种表示悲伤的方式，有任何非法的，或者非天主教的。在这几天里，我们在同一地点，重复了同样的礼仪。

葬礼过后，我问协助仪式的官员这次做的是什么样式的葬礼。他回答说：尸体躺在宫里的全部期间内，没有烧过纸钱。但是灵柩移到景山(Kiah-Shian)，即所谓“金山”（这里作者误读了原意，“景”误为“金”——中文译者），就在紧靠着宫门的一个地方，烧了大量的纸钱，结果一时间弄得周围空气里好像是腾起了一层烟云。他还告诉我：“奠献”(Tien-tsien)，即用酒祭奠，已经做过了，是用这样的方式举行的，即礼部尚书给皇帝送上一杯酒，皇帝把它倒进一只大金碗里。同一时刻，礼部尚书给出信号，文武百官，还有我们传教士一道，施行三跪九叩之礼。听说我们实际上参加了这场迷信活动，尽管是无意识的，但我无法表述出自己内心的悲伤和惊恐的程度。为了防止再度发生这样不幸的事件，我决定离开这座危险的“巴比伦”(Babylon)，越快越好。

康熙皇帝死后不几天，上述的葬礼还在进行的时候，继位皇帝雍正颁布了一条谕令，以一种让整个帝国感到吃惊的方式显示了他的掌权。在他的命令下，官员赵昌被抓了起来，戴上了重重的镣铐，宣判以枷刑处死。木枷是一种戴着走的板子，有200磅重。这位傲慢朝臣的财产被没收充公，家人受罚为奴，妻妾被分配给他人。陛下在他的一份谕旨中宣布，他之所以要如此地惩罚赵昌，是因为他太傲慢，还滥用职权迫害欧洲人。所有这些，我只能把它归结为全能的天主的判决。这就是著名的赵昌的下场，他是铎罗枢机主教和所有天主教的公敌。

比赵昌的下场更惨的要数是他的亲密朋友勒什亨。这位大人物几个月前去了澳门，意在购买一些昂贵和漂亮的欧洲玩艺，打算献给康熙皇帝。接到皇帝驾崩的消息后，他急忙赶回来，并打算把他收集的珍物送给新皇帝。他的朋友们十分清楚朝政中发生的变化，比如目睹赵昌被打入牢房，此外还有许多

他所认识的其他贵族们，都劝他延期回来。然而，他却相信他那饱含奇技淫巧的礼物会产生奇效，把他们的忠告置若罔闻。回到北京后，他把自己的厚礼献给了皇帝。皇帝照单全收，给了他很大的面子。这些我都是亲眼所见，因为陛下刚刚登基，命令希普和我在宫里做事。几天以后，勒什亨奉召进宫，他春风得意地来了，穿着他最为华贵的披风，前呼后拥的一大群随从，还指望得到什么赏赐。然而，他发现自己得到的远不是他所期待的。他刚刚踏进门槛，在靠近希普和我站立的地方，皇帝的第十三个兄弟就命令他跪下，并以陛下的名义，要他立即充军去，去参加抵抗准葛尔头人策妄阿布坦（Tsoo-wang-ar-pat-tan）的战役。此外，还宣判他有重罪嫌疑，并且必须承担所有宣判后的有关费用。面对这个意外打击，不幸的勒什亨被吓懵了。过了一会儿，他才鼓起了勇气，卑谦地提出：他既缺乏军中生活经验，而且身体状况很糟糕，完全不合适去服这项兵役。他请求仁慈的陛下给予赦免。但是亲王完全懂得皇帝的意思，坚持这个命令，他回答说：“勒什亨，你最清楚朝廷的规矩，服从，不要多说，否则强制执行。”说完亲王转身就走了。勒什亨回到显然被搜查过了的家里，房子里的所有亲人都被拘禁了起来，大家知道了他的不幸消息，看见他回来后都极其惊恐。他躺在床上痛苦地哭泣的时候，他的仆人在为他准备出发的行装。第二天他就离开首都，到陕西充军去了。到达了目的地后，他被带到一个房子里，皇帝的一个兄弟也关在这里。这个亲王被怀疑向他违法地提供了资金去购买那些礼品，这些礼品过于豪华，任何私家个人都负担不起。

虽然被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两个流放者却设法互相通信，卷入反叛活动，但最终败露了。他们两人都被上了镣铐，带回北京。悲惨的勒什亨享受了三次大刑，他的腿被夹在两块木板之间挤压，木板压在一起的巨大压力，几乎要把他的骨头弄断。在此酷刑之下，他承认了自己有罪，但是没有牵连出亲王。他的招供被公诸于世，在他招供书的底下，写着他的死刑宣判，是由礼部宣布的。



朝廷判决勒什亨斩首，这在中国是非常耻辱的事情，就像欧洲的绞刑一样。但是皇帝没有批准这个判决，而是命令把他重新带回陕西。于是他又被戴上了镣铐，不允许见任何家人，也不让任何仆人来照顾他。他到达目的地后，在一个喇嘛庙里被关了好几个月。最后他被告知，皇帝命令他自尽。刽子手打开了他的镣铐，给了一杯毒酒，一条绳子和一把短剑，就是没有留下食物，让他可以选择他喜欢的死法。第二天，刽子手回来，准备收尸，却看见他还活着。他就敦促勒什亨必须马上执行死刑。勒什亨脱下镶满金子的盔甲大衣，送给这人以换取更多的时间。刽子手收下礼物，却跑到官员那里报告说他还没有自尽。又过了一天，发现他还活着，刽子手就用一包沙袋把他闷死了。此后，他的尸体被焚毁；悲剧还没有完：他的骨灰还要被随风飘散。

第二十三章

把欧洲人驱逐出宫廷——密谋——皇太后之死——困难重重——最终决定离开

康熙皇帝的灵柩将被移到鞑靼地区的祖陵安葬。我们接到命令要护送他们到首都城门外的一段路程。但是因为知道在葬礼队伍行进过程中，常常要停下来做牺牲和祭祀，我们就决定不加入这种异教的迷信活动，也不参加送葬。但是为了不给我的宿敌们以反对我的借口，当行进队伍走出超过2英里远，已经看不见他们迷信活动的时候，希普和我才骑上了马，跟着大队的送葬队伍，到达我们奉命要到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期逗留期间，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像这样的烦恼和侮辱，即不得已诉诸这样一个懦弱的计谋，以使我的良心躲避我个人的安全威胁。

几个月后，所有的欧洲人都受命集中到内务府(Board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官员们以内务大臣暨皇帝第十七兄弟的名义通知我们：以后无论有什么事情，也不再要进入宫内了，只要和内务府联络就可以了。这个措施显然是由皇帝布置的，其目的就是要把一直允许出入的欧洲人驱除出宫廷。从那以后，除非陛下的特别恩准，如像希普和我那样的情况，没有欧洲人能够获准进宫了。

尽管我的敌人们因为官员赵昌和勒什亨的失败而老实了一些，但是他们的恶毒行为没有改变，还在继续。他们的矛头总是对着我和我的朋友们，以阻止我们在北京的事业。自从得知他们在密谋，逼迫我们住到法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北堂和南

堂去以后,两个月又过去了。他们已经知道我买下了那房子,而德里格还在购买另一所更大的房子。他们也知道,我在北京开了两个小教堂,举行了宗教仪式;德里格也打算照此办理。为此原因,他们害怕我们可以在北京为所有的天主教徒做灵性辅导,所以竭力地要我们和其他欧洲人同住,来加以阻止。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有独立的正式教堂了。

康熙之死带来了新情况,他们的计划一个都不能实现了。然而经过他们恶魔般的活动,我又被召到内务府,受命写下由传信部派来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国籍、年龄和职业。更有甚者,内务府官员还询问了我朋友的情况,建议我搬到法国人或者是葡萄牙人的房子里去。对此,我回答说:这个计划并不能产生好的结果,因为我们分属于不同的修会,不同的民族,不能采用同一种生活方式;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再要让他们与别人住在一起,既不合适,也不体面,会给他们和我们都造成极大的不便。我还告诉官员们,就是这些法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曾经顽固不化地反对已故康熙皇帝要把所有传教士合为一体的努力,并以此来支持我的论点。我进一步陈述说:我们到北京来的目的,就是要进宫来供奉皇帝。我们是如此地忙碌,因此对陛下来说大家住在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房子里都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对我们来说丢失的舒服和不便,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当时,我们三个人,即安吉洛神父、希普和我,被陛下选中继续直接地供奉于他。为了不打断在宫中的事情,在北京买了一个小房子,就能更好地伺候陛下的旨意。我们还有另外五个人住在海淀,靠近皇帝的行宫,获准买了房子,他们中有什么人要为皇帝做事,就会很高兴地住到我们的房子,或者是德里格正在打理的房子里来。我找到了可以在官员面前说明同一状况的种种论点,好在内务府还没有成文的谕令,官员们对这件事也没有多大兴趣,他们便对我的理由表示满意,答应向内务府大臣陈情。这件事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我猜想一定是得到了大臣的认可了。

1723年6月24日,雍正皇帝的皇太后死了,要再次举行

像康熙皇帝去世时的葬礼。再次参加这样令人厌恶的仪式，还不如让我去死。于是我写信给在海淀的五个同伴，警告他们不要参加即将举行的仪式，除非是像上一次我们在康熙皇太后葬礼中跟着做的那样。我还请他们到康熙皇太后葬礼时我们去过的地方参加活动，而不要到举行过康熙葬礼的那个地方去。

送出此信后，我就到内务府去领取丧服。丧服是免费分配给所有欧洲人的。官员们问我：康熙葬礼时，欧洲人是在宫中的哪一地方集合的；皇太后葬礼时又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去过景山；我们当时都做了哪些仪式；我就把上面描述过的情况一一说了，最后我说：请允许我们进入慈宁宫（Tsy-nin-koong），穿着丧服待在那里，完全像康熙皇太后葬礼时我们做过的那样，坐在地上。那官员回答说：那就这样做吧。然而当他们把全部请求上交给不知哪一级机构时，又决定要我们到另外一个我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地方参加葬礼。幸好事情改变不过如此，如果这官员决定是把我们送到龙潭门（Loong-tan-men）去，为了遵守罗马的指令，我们就只能决定拒绝参加了。这个不该记不起来的新地方，是我决定要赶紧回到欧洲去的另一个原因。

我和其他欧洲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探听应该在宫中什么地方碰头，也猜不透要我们应该如何做。因为弄不清楚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合法地参加某些仪式，我决定在葬礼期间，不随其他传教士一起入宫，但又要在仪式结束的时候，在官员面前露个面。但是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其他传教士没有被迫都参加这些仪式，他们都是在做完了奠献酒牲的仪式之后才到达现场的。

当天下午，一些同伴回到宫里，我就直接去了内务府，在那里待到他们都离开为止。后来我听说，欧洲人到达那地点后，只是被要求站成一排，待在那里，直到仪式过去，没有做任何跪拜活动。

大家继续穿丧服，但是没有被要求参加其他任何仪式。根据已故的皇太后的遗愿，葬礼不要拖延到第三天，不要耽误了大清朝的政事。

陛下想到了要建一座永不停歇的喷泉，下旨来问我们当中谁能够设计。一个法国人说他有两个新来的同胞能够从事这项工作。安吉洛神父通过我的翻译，毫不迟疑地表示他也完全胜任这个任务。其他人则宣布他们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当我得知这位迷信的皇帝要想建造的喷泉，有他自己的一个初衷时，安吉洛神父已经开始了设计，并把他呈送给了皇帝。陛下曾经问过某一个被认为是握有神法魔力的僧侣，他的王朝如何才能永不衰败。僧侣回答说：建造一喷泉，让水流从龙的口中永不停息地流出，王朝就能永垂不朽。给我提供这个消息的人们认为：鼓励这样的异教迷信是错误的，他们一致认定不能干这样的事。我问了一些发布这项谕令的朝官，皇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回答说：不过就是让他自己高兴而已。然而因为对他的迷信意图十分了解，我认为有责任阻止安吉洛神父从事这项工作。为了避免得罪皇帝，还特别需要有礼貌的借口和合适的做法。随后，我把想法告诉安吉洛神父，但是却发现要让他接受我的想法非常困难。

这件危险和复杂的工程都安排好了以后，宫里反而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情。处理了整个事件后，就把我暴露在进一步的难堪之中。皇帝有旨来问，安吉洛神父能不能根据他送来的样品，协助制造一些铜钟。从这些钟的特殊样式，还有钟上面的铭文看，它们显然是要放在偶像崇拜者的庙宇里，作为供崇拜使用的东西。有几个朝官还进一步告诉我：皇帝还打算把这些钟和大量的弓箭，一起放在一尊大佛像的肚子里。皇帝已经在宫殿附近的一座豪华庙宇中建了这座佛像。因此我就希望安吉洛神父不要接受这项工作，免得沾上偶像崇拜的罪名。在我给出回答之前，我提醒他不要在姿态上暴露出他精通这类事情。安吉洛神父听了我的说法，却反对我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急着要我翻译说他懂得必要的知识，并准备参与其事。安吉洛神父的机械知识非常丰富，但是他在神学和哲学上却知识贫乏。朝官们察觉出他想取悦于皇上，而我却反对，于是严厉地责备了我，置我于冒犯陛下的意愿和兴致的不利位置。



我发现自己完全暴露了，就公开地宣布说：尽管安吉洛神父有能力做，他也不能做，因为我们的宗教禁止参与制造任何可以用来从事偶像崇拜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威胁说，要把我的行为报告皇帝。我回答说：因为对朝廷的行事方式很了解，知道这样做的必然后果，但是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去做我的宗教最为严格禁止的事。这样，由于他们看出了我已经完全决定了自己的行事方式，又对我非常了解，就同意回去告诉皇帝，说安吉洛神父不懂做这项工作。安吉洛神父发现他未被任命，变得极端地恼怒，说我剥夺了他为陛下服务的荣誉，马上离开了我们在海淀的住所，宣布永不再和我同处一室，以后他要另找翻译。

我再次陷入倍受争议的进退两难中，要么同意进一步的偶像崇拜，要么给传教事业带来更大的麻烦。我决定回那不勒斯去。几天以后发生的情况，更坚定了我的这项决定。为了激发中国天主教徒更经常地履行他们的神圣职责，我争取到了祝圣“天主的羔羊”(Agnuses)取得豁免的特权。每到星期五早上，我就在小教堂里做神工，分发“羔羊”给出席者。我的一些对头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当几个天主教徒的面说我无权祝圣“羔羊”，还说我欺骗了我的信徒们。朋友们对我所受到的人格侮辱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后争论双方都到我的房子里来查明真相，我立即出示了授予我特权的证书，他们就都满意了。

这场新的争议，更加使我相信所有的努力都被我的敌人恶意地抵消了，除了丑闻和混乱外，很少生出什么积极的结果。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义，我个人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多么的微小，我又是多么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参加偶像崇拜活动的危险中。遵循《圣经》上的话：“他们在这个城市迫害你，你就到另一个城市去。”我决定回那不勒斯，并不是想无所事事地游逛过活，而是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贡献出来，从事天主教义传播的神圣事业。

离开上司指定给我的这个职位，这个念头早就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如上所述，它经常是我祷告的主要题目。不管怎样，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步，我不敢自说自话地决定。于是，我就把自己置于使徒圣玛竇的庇护之下，自我禁闭，经历一个宗教修炼过程。经过几天不断地默念和祈祷，我觉得自己的打算再次强化，我终于下定决心走了。



第二十四章

准许离开中国——告别礼物——离开北京——便宜的旅行——多样化气候——到达广东——资金困难——超自然的使命——主的显现

除非是发生了什么健康上的问题，从来没有欧洲人自己提出要离皇帝而去。在康熙朝，我根本不可能获得离开皇帝的恩准，我的健康状况完好。现在要从雍正那里获得这个允许看起来也不容易，他还在为父亲的死而伤心着。在中国，新近死了双亲的人们普遍遵守一种守制的做法。于是我希望能宣称有类似的损失，以便成功离职。我向皇帝的第十六兄弟申请，他表示非常倾向于答应我的要求，并给我出主意向内务府申请。内务府把我交给陛下的第十三兄弟，他负责收藏钟表，自然就是我的直接主管。亲王对我的情况犹豫不决了很久，他一直微笑着，和我说了很多话，有时甚至转过身去，假装看不见我跪在地上，等着他的回答。他提出了各项允诺，但我终于发现了他不让我走的原因：在中国，礼物有神奇的威力。我拿出还藏有的所有欧洲来的珍玩，统统送到他的府上。它们全都被收下了，这是一个好兆头。不久，我就接到一个令人高兴的通知：皇帝考虑到我已经为他的父皇服务多年，就欣然同意我的申请，还命令说，我可以得到一些珍贵的丝绸、瓷器，作为告别礼物。

11月13日，亲王领着我去了皇家的收藏库，吩咐我随意挑选。听从他的命令，我选定了4个瓷花瓶和不少件的丝绸。为此还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亲王坚持要我多取一些，直到我取

了200件瓷器，他才高兴。完了以后，用通常的跪拜礼作了答谢，就永远地离别了这座宫殿。最后告别的时候，亲王特别提醒要选一个吉日启程。这些异教徒总是用一种迷信仪式来选日子。我说：所有的日子都一样。这个回答令亲王身边的人们大为吃惊。他看着他们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泰西人不信有王道吉日。”

仅仅在七年前，已故的康熙皇帝曾严厉禁止他的臣民离开中国。我现在也看不到把自己的学生带出去的可能性，于是我就决定把他们留在广州，由一个朋友照顾。正巧，皇帝的第十六兄弟听说我要回国，赠给了我一大批丝绸制品，两匹配了鞍的马和各种汉人制造的工艺物品。前去向他感谢的时候，我提出说：马匹是禁止出口的，需要有特别许可才是。他说：“打一个报告，写明你想带走的马匹、人和武器的数量，会得到恩准的。”靠着这样一时冲动下提供的特许，我就成功地领受了“全能天主”（Almighty）的使命，把我的学生带到欧洲。

克服了不用细说的种种障碍之后，1723年的11月15日，我终于带着我的4个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离开了这座“巴比伦”——北京。我自己坐一顶轿子，两个最年幼的学生坐另一顶，其他三个人加上两个仆人，都是骑马。那天，风刮得猛，天气又冷，我们的轿子几次被吹翻。那个“魔鬼一号”好像已经预见到未来什么时候，在我小小的中国信徒团里会升起一个伟大的将来，就集聚起他所有的力量，要把我们赶回他所掌控的那个首都。

25天以后，我们到达了南昌府（Nan - chang - foo），没有雨，没有雪，也没有任何其他不便。除了第一天离开北京时是例外，余下的旅途算是一帆风顺。两顶轿子，四匹马，一个仆人骑的是我的一匹马，我一共付了61两银子，相当于18英镑。在北京和直隶行省，货品供应要比其他省份来得昂贵，一般要花七八分（Fens）钱来吃饭，用同样的钱来住宿，一共是每天不到6便士。因为中国的旅馆里不提供床榻，我们还自己带床。而往南旅行，各种价格都便宜下来了，我们每人的全部日常花费降到



了不足五分钱。每餐有蔬菜汤、两种不同的肉，米饭随便吃，还有酒和水果，不包括需要另外加付的小食。

第十一天，我们花了不到2镑钱，雇了条小船，到了南赣府。到达梅岭关口 (Mei-ling Pass) 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片美妙的景致。离开北京时，因为实在太冷，根本没有一点点翠色可见，在开始的大约一个星期里，只看见几片枯萎的树叶挂在枝头。此刻攀上了山顶，我们发现所有的绿树都被茂密和葱茏包裹着。几天以后，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的收获到达顶点。1月10日，我们到达了广州，发现是满园春色。这样，56天的行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颠倒过来的四季，因为我们是在从北到南地旅行。

到了广州，我欣喜地发现还有一条英国船停在港内，因为海关官员没收了一架珍贵的自鸣钟，既不还给他们，又不肯付钱。我不失时机地努力要搭此船去欧洲。但是好几个朋友告诉我，再多的钱也没有用，我应该放弃今年回去的念头。创办自己学院的炽热愿望激励着我，我又问了自己和剩下的四个中国人——我打算留下尤路西奥，他的身心都疲惫不堪，状态很糟。感谢所有的好事都凑在一起了，用150英镑谈妥了，我成功地得到了我想要的舱位。这项重要的事情搞定后，此外只要付一些食宿费，这没有很多困难就可以凑到。

受传信部的派遣，我有大约350镑的信用额度。我在各种场合借出款子，供在华传教士们使用。尽管那借款人掌握着充分的经费，他也不同意支付我的旅费。他宣称这笔钱一般都要优先用在单个项目的花费上。我徒劳地陈述，说我并不是要占用这笔钱，只是收回出借的欠款。除非他归还至少是一部分的欠款，否则我和我的学生就不得不滞留在广州，但是他的决定不可动摇。我的沮丧显而易见，在同事们对我的善意作出毫无信义的奖赏后，神圣的天主又来帮助我了。暹罗 (Siam) 来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得知我的困难后，十分出人意料地提供了大约120镑，主动借给我，不要任何保证金和利息，唯一的条件是完成使命后，在方便的时候还给他。拿着这钱，我立刻跑去付

给船长，于是我和四个中国人的旅行全都搞定了。

我在北京被加授荣誉的消息，在我离开前通过《朝报》(The Gazette)传到了广州。因此接下来就受到广东全省所有当局，特别是粤海关的极好的招待。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人对我也相当不错。不仅是在广东逗留期间如此，在海上，到了伦敦，也都是如此。

各种各样的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第二天早晨我做弥撒的时候，感到了非同寻常的焦虑。我刚刚开始念：“给他们和儿子们起名字，”(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我就清晰地听到这几个字：“我把他给了他们吗？你会遗弃他吗？尽全力带上他，如果你失败了，然后留下他。”我马上明白他指的是路西奥，尽管没有提到他的名字。21年过去了，这件神秘的事情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这证明我没有全力带上路西奥同行是个错误。我决心尽全力来做这件事的。弥撒以后，我又沉浸在大量的事务中，全然忘记了我的决心，还有听到的那不寻常的话语。

第二天我做完弥撒，又重新拾起我已经提到过的工作，我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在重复：“你把他给了他们吗？”等等话语。这次我深深地被它震动了。我必须要在这一带交代一下：我从来不会让自己受这样一类事情的干扰和欺骗，一直是奉行良好的教导，应用理性的帮助。但是耳边的这些话语如此有力地作用于我，以至于我当天就去找船长，问他带上路西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在大街上遇到船长，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请他帮忙，船上的货物管理员就走了过来，告诉我说他需要我的帮助。他告诉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情况：一架属于东印度公司的价值400磅的自鸣钟，被粤海关总理没收了，既不归还，也不付钱。货物管理员很清楚粤海关总理对我最是尊敬，所以就认为我能够说服他，要么还钟，要么付钱。我说很愿意帮助他，如果必要，我还愿意延期出发，当时已经定下次日开航。这个回答令货物管理员十分满意，他给了很多酬谢，指示船长把我和中国客人的行李，立刻搬上甲板。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作了看护，就好像它们是公司的财产。此后他就走了，留下了我和船长的时候，在翻译的帮



助下，我请求他带上路西奥，并保证他肯定会对有关的费用表示满意。

我本不指望船长有什么好的回答，可能就是拒绝，或者是加价收费。船长在货物管理员请我帮忙的时候在场，他立刻回答说，欢迎路西奥上船，费用的问题甚至根本不提。谢过了他的好意，我随后就借此机会给了他一些好处作回报。回到家里，我的朋友们听说了这个故事，都非常吃惊。

我赶快给粤海关的官员们发了消息，劝告他们归还自鸣钟，或者给钱。对此消息的回答是一份赴宴邀请。我马上前往。提到这件事，官员说这是自己的管家搞错了，已经下令还过去了。英国人高兴得跳了起来，结果在整个旅途中对我都非常照顾和尊敬。



第二十五章

驶往英格兰——中国人遇到麻烦——留在风
暴中——又来了——中国人的忠厚——爱德
蒙·戈德弗雷先生——代替指南针——匿名的
慷慨解囊

1724年1月23日,我终于和五个中国人一起,起航前往伦敦。一个月以后,我们跨过了赤道。一直到那时,中国人都被允许使用船长舱位,并且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本来这将是一次最愉快的旅行,但是许多黑暗的力量迅速传播,把航船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它们传递出来的一些基本做法,最终被证明对他们的利益并无好处。当时他们用一种含盐的液体把一个中国人的双手和脸部都包裹起来,治疗他的疾病。几天之后,这可怜的孩子变成了最受讨厌的对象。这个外科医生是个德国人异端教派,是我们天主教的最顽固的敌人。他宣称这种疾病是麻风,并被证明可能有传染性。同时,发生了尤路西奥把船舱弄脏,使他们讨厌的事件。当时路西奥还只有13岁,智力上还不够成熟。他和同伴睡在那个船舱里,而英国人在同一个地方睡觉、吃饭和饮酒,如此就大大地冒犯了他们的清洁观念,于是船长决定把中国人赶出他的船舱。

这艘船装满了东西,没有留下可以供我的学生们遮风避雨的地方。他们的衣服被打湿后,还不得不穿着,等着太阳光,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热度烘干。好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中国的海岸线了,因为这些英国人咒骂着说,要不然早就把他们全都送回岸上去了。不用多说这些可怜的中国人在4个

月的旅行里，遇到了多少艰辛。我恨不得想看见这些人全都消失，看到那个外科医生的残忍行为，我的这种痛苦的焦虑强烈地增长起来。这个恶毒的异端教徒，看到前面提到的那个男孩的悲惨境遇，几次三番认真地对我说，他认为要给这孩子一个强有力的措施，把他扔掉。我费了很大劲来阻止他采取这种恶棍行为。后来他看见中国人身上湿得难受，跑过来对我说：“马先生 (Signor Ripa)，我们必须把他们一个个地都扔下船，因为不可能把他们养活到航行的终点。”

五个中国人经历着艰辛，他们的坚毅和忍耐简直难以置信。他们中没有人表现出一点点的怒气，或是对这次航行有什么后悔。他们总是那样的欢乐和知足。他们的老师让我特别感动。他已经有30岁了，留下了母亲和妻子，还有四个孩子。我只是在离开北京的4个月之前才给他授了洗，尽管对于这样一个新人教的人，不指望会有很多，但当我告诉他要耐心的时候，他却满脸微笑的样子，请求我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好像这事没有让他难过一样。他说，他知道一切都是“天主的意愿”。

4月10日晚上，来了一场大风暴。大海和天空咆哮如雷，似乎随时都要把航船撕成碎片。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海上风暴如此可怕和疯狂。感谢天主，一个小时以后它就过去了。此后，风力减退了，接下来的是一场暴雨，没有间隙地下，直到所有船员都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不止是大家的衣服全都湿了，雨水还渗入了文件箱和办公密舱，损坏了部分货物。我像过去一样晕船，更对淋透冻僵的可怜中国人的悲惨境遇深感担心，因此难受得生不如死。我渴望他们和我在一起，曾一起向天主祈祷了多次。这次我满怀信心地把一只教宗因诺森第十一的“天主的羔羊”扔进海里。我们接着看到狂暴的大风变成了和煦的微风；大海平静而安宁；空气温和得让我们觉得就像是身处最快乐的春天，这感觉真是美妙。有一个懂得葡萄牙语的异教船员告诉我，他和其他水手都曾历经风浪，像这样异常的天气变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他们都说是自然之原发生了变化，要么就是神迹的显现。他再三地说，他真是看到了上帝



的神迹。来自一个异端教徒的口供，证实了我的信念：是我们的祈祷起了作用，经过我们神圣的主的干预，如此大的救恩赐予了我们，以保护这些中国人。

5月7日，天空阴沉下来，刮起了西北风，又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和中国人在一起，我们又一次做了常规的努力，也就是说祈祷。我们又一次把因诺森第十一的“天主的羔羊”扔到海里，风暴就溜走了。但是风夹着雨，继续使劲地吹过来，航船靠着舵保持平衡。这样的风通常一直要吹30到40天，船上的淡水却只够使用30天。一直留在这个位置，等风力过去显然是危险的。于是船上的职员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在这个地方再待一个星期，到时候如果风向还是不顺的话，就往回航行，到马斯科林(Mascaregna)岛去过冬。看见这些职员们，特别是那些支持这个馊主意的人们，都是一副倒霉的样子。他们坐在穿舱里，脸色发白，一声不吭，时时刻刻都是受了沉重打击的样子。他们内心的忧虑，来自于他们都知道的一个情况：一艘大的海盗船，挂着黑旗，船头上悬着一个死人骷髅，正在这个岛边上的海岸线上巡游，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地方可去。在如此不快的环境中，我告诉中国人，一定要乞求天主的再次干预。我们做了，不但风向变了，而且此日的天气变得如此宜人，以至于我们又重登航程。

到达好望角的时候，因为经济的以及其他的原因，我被要求和船长及其他英国人分住不同的房子，他们没有让我作任何解释。我带着中国人上岸，活动筋骨，恢复身子。可不久中国人就求我回到船上去，因为实在是不能承受这些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嘲弄。记得有一次听到了一团慌乱的嘈杂声，从中我辨认出殷若望的声音，就马上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刚进房间，看见很多英国人和荷兰人聚在那里，其中一两个人为了逗大家乐，把店主的女儿推向了殷若望。面对着这种勾引，这年轻人害怕得哭泣、颤抖，最后爬着躲到了床底下。

我进去后，他们停止了折磨这个可怜的小兄弟，可他还在哭泣和颤抖。我花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他留在岸上，和其他人再待上一会儿。他用最大的真诚恳求我应该马上带他回到船上

去，说这种粗俗而放荡的玩笑他已经受够了。

我很清楚在到达那不勒斯之前，我们会有大量的花费。因此有一些上等的中国衣服，我决定在经过那些异端教派的国家时把它们穿起来。在船上，我总是穿着中式服装。有一次到达了伦敦，我必须要到东印度公司，或者大概还要去法院等地方，他们问我会穿什么样的衣着，我回答说，我没有其他的俗世便服，我只能继续穿中式服装。对此，那位异教徒，名叫爱德蒙·戈德弗雷（Edmund Godfrey）的货物管理员不知道我的意图，拿出了全套的礼服，坚持要我把它作为礼物收下。在好望角做这套礼服的时候，光纽扣就花了二英镑。

当接近圣赫伦纳（St. Helena）地区附近的时候，我们航行了好几天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小岛。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都有严格命令要在这个岛上靠一个。因为航海季节早就过去了，职员们最终决定：除非在24小时内找到它，否则就直接驶向英国去。但是这事情在船员中招致的不愉快，使他们陷入很大的恐惧中。有鉴于此，我立刻告诉中国人在第二天——帕杜阿的圣安东尼（St. Anthony of Padua）的主保日日出的时候，为了获得这位大圣徒的保佑，希望他们和我一起祈祷。他们又做了。我们炽热的恳求一直没有停止，直到所有的甲板上响起了大声的欢呼，大家看见了梦寐以求的海岸线。

在圣赫伦纳停留的六天里，岛上没有旅店，我们就和船长及大副一起，住在一个职员的房子里，饮食和住宿都非常好。临结束的时候，我以为要付一大笔钱。问起房东，我和这些中国人要付多少钱，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帐已经结了！然后，我逼着他告诉我这个秘密施主的名字。接受了这样一个不难查出的匿名捐赠，我的感觉难以名状。没有人能够想象我所经历的内心慰藉：我看到了神圣的天主如此仁慈地眷顾了我们的需求，他激励了一个异端教徒，为我们付了一笔不会少于30英镑的款子。有理由怀疑这事情是爱德蒙·戈德弗雷先生做的。为了答谢，我去拜访了他，但是他甚至不让我提这件事。

第二十六章

在戴尔下锚——小艇船夫的强索——海关职员
的贪婪——民族纪念物——国王乔治一世的
慷慨解囊——东印度公司经理——爱德蒙·戈
德弗雷先生——驶向利伏诺

9月5日,终于幸福地看到了英国的海岸线,并于7日在戴尔(Deal)下了锚。从这里到伦敦,顺风航行的话只要三天。因为天气情况并不稳定,一般总要四个晚上。另一方面,到了戴尔以后,每天都有邮差到伦敦去,如果先发信,你就可以在不到40小时内到达伦敦,费用只要26先令。考虑到这一点,我决定下船,去和东印度公司的经理安排一项协议,以防止我们的财产被夺走,按他们的规定被拍卖掉。

同时,海关职员上船检查,看有没有货物被卸下。我当机立断改变计划,同意付4英镑给小艇船夫,让他们把我的货物带走,条件是在两天之内把我们带到伦敦。但是在固定的启航时间之前,他们还没有准备妥当,所以我就决定跟送信船走。这一次,我碰到了像是在舞台上大出洋相的冒险经历。我乘坐的小艇,因为水太浅,不能在最靠近海滩的地方上岸,就由一个船夫背我上岸。他要走过的距离大约有20英尺,但走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他开始蹒跚不稳,要叫朋友来帮忙。还没有等到朋友过来,他就让我掉在齐膝深的水里。

刚一上岸,我们就被水手们弄得恼怒起来。我们答应他们的收益,但他们假装说,要么保持预订金不变,要么再给他们一些补偿费。他们还威胁要控告我们。他们的吵嚷声音很大,不

会就在我们身边围起了一大群人。我们不会说英语，也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们非常困惑，不得不承受他们敲诈勒索的痛苦。感谢天主，直到晚上很晚才有一个绅士走过来，对我们表示同情，把他们痛骂了一顿，赶他们回家睡觉去了。

在这些水手制造骚扰的同时，我们接到通知，把行李拿到海关接受检查。同时，那个传达命令的人已经开始非常注意地翻看行李了，以防我们从袋子里取出走私货物。这个人说话非常客气和慈祥，以致于我们都还疑心他内心是个天主教徒。我们的行李包括替换衣服；一个文具盒——其中有几叠书信；中国地图——我自己刻印的；还有各种不值钱的其他东西。所有这些都难以想象地严格检查。但是没有什么违禁物品可供敲诈，他们就抓起我的一件中式服装，借口说是中国丝绸。随后他们打开了地图，我提醒他们要特别当心，告诉说这是打算不久后要送给国王的礼品。他们还不满足，要查看信件，声称信件一定要通过邮局传送。我锁上了盒子，递给他们，说到伦敦时送出。他们不接受盒子，坚持要我到邮局寄信。我不愿照做，他们就把我们关在监护室里。上面提到的那个职员，假装用朋友的口吻劝说，捐献4英镑了事吧，要不然我们永远出不了海关。争议一直持续到半夜，最后从里面房间出来了另外一个职员，各打五十大板，命令他们说罚半个克郎足够了。我马上把钱交了。

我们在戴尔和邮局局长达成了协议，每封信27先令六便士，一半在这里付，另一半到伦敦付。我们中午出发，同船的还有一位中校和一个商人的太太。英国女人尽情地享受这样的自由，因为在这个岛国，完全没有什么闺房制度。

毫无疑问，从北京到伦敦，神圣的天主一路眷顾着我们。然而我们在英国收到的神宠更是巨大。把在英国的时时刻刻都描述下来，那就会是另一本厚书。我只想说：这些新教徒除了让我们合理地失去了一些从中国带来的财物外，倒是给我们献足了百般的殷勤。

伦敦这个大城市，有习惯每周两次公布一些期限之内发生

的重要事件。于是,我们上岸不久,公众们就知道马神父从中国带了五个孩子,要让他们在那不勒斯受教育,然后送他们回到祖国传播神圣福音。一天,英国国王乔治一世(George I)和几个朝廷大公爵及显赫的外国人谈话,这件事随来在他面前被提起。于是陛下表示了要见我们的愿望。撒丁尼亚公使认为我是意大利皮埃蒙特(Piedmontese)方言区的人,也提出要接待我。

到伦敦只有几天,一天晚上我们刚回到旅店,有人告诉我公使来过了。没有料到有这样的荣誉,所以不算是我对他的无礼。他当时留下了一个签名信,说国王想见我们。接下来的好几天,我们六个人都一直为进宫作准备。在宫里,国王和我们谈了大约有3小时的话。出席者还有王室成员和宫廷公爵们,国王对我们兴趣盎然,以至于当时在场的几个新教大主教对身边的贵族们不断抱怨。最后国王和这一大群人谈累了,谕令中国人在平日里是宫廷公爵们用餐的那张桌子上吃饭,而我则和他的亲戚——阿灵顿女公爵(Duchess Arlington)共餐。陛下之所以下此谕令,是因为这位小姐恳求国王允许由她来招待我们。陛下还高兴地以各种其他方式来款待我们,此地不烦赘述。但是不可省略地要说一下:陛下谕令说,所有我们从中国带来的财物被海关职员检查之后,都可免费转装上船,送去意大利。

关于其他几笔要付给东印度公司的钱,经理不但宽免了,还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聚会,表示准备提供任何方式的帮助。他们甚至请我一起吃饭,还派了士兵护送我们的货物上船。因此,所有财物在离开英国的时候没有招致任何费用,也没有受到一点点损失。我们原是应该付关税的,数目可能要达到100英镑。

上一次谒见国王的时候,从晚上9点开始,到半夜结束,阿灵顿女公爵出席。当时国王给了我50英镑的赠款。

离开了16年,重返伦敦,发现城市大有改观。建了很多楼房,老房子也都修缮一新。异端教派已经建成了圣保罗教堂(St. Paul's),想媲美罗马的圣伯多禄主教堂(St. Peter's)。许多从没有到过罗马的英国人,都相信它是举世无双的。确实要承

认，圣保罗教堂在外观是具有艺术风格的，整体上极度的华丽。但是在内部，它的比例是所有我能记起来的教堂当中最糟糕的。建筑的主体长而窄，非常高耸的穹窿顶，采用明暗对比法的壁画。内部全是用拉毛粉饰法装饰的，没有任何大理石贴面。国王召见的时候，他曾当着许多贵族和外国使节们问我：两个教堂哪个看起来更漂亮些，是“圣保罗”，还是“圣伯多禄”。我坦率地回答说：罗马圣伯多禄教堂正面的宏伟壮观的廊柱除外，“圣保罗”的外表肯定要比圣伯多禄等其他教堂都好。但是“圣保罗”的内部不能和“圣伯多禄”相比，它才是建筑史上的杰作。“圣伯多禄”还有雕塑和画像来点缀，“圣保罗”却既无雕塑，又无画像，还有在比例关系上，建造得非常糟糕。国王在罗马住过，他转身对着那些伯爵们，以为我不懂，用法语说：“这正是所有外国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带着中国人参观过新建造的教堂后，我又领他们去看皇家海员医院(Royal Hospital for Seamen)。这座大厦规模巨大，建筑精美，詹姆斯·托尼尔爵士(Sir. James Tormel)正在画着内部的壁画，确实值得一看。王宫的外观看起来并不壮丽，但是如果你从尚存的一些部分来观察，它确实曾经辉煌。因为它的一部分已经在过去的数次大火中烧毁了，重建工作一直没有完成。我们还去看了一座用哥特式风格建造的教堂，无论说起它的建筑，还是保存有的大量古迹，它都是伦敦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我们还去温莎看了另一座教堂，同样值得称赞。但是这个首都里值得注意的东西，许多作家已经作了更好的描述，他们比我更为胜任。相信对眼前的目的而言，我的这个简短说明已经够了。

10月5日，我们离开伦敦去意大利西部港口利伏诺(Leghorn)，并在11月1日安全到达。我几次提到的那位绅士爱德蒙先生请我带一封信给一个商人，没有透露信中的任何内容。送上此信后，我极度吃惊地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张我可以任意选择数目，随便填写取用的信用书。我非常吃惊地知道有如此善良心和慈悲感的人，把他敞开的主人翁精神带给我们的信



仰。但是因为我还有英国国王给我的钱，所以并不需要更多，因此我相信拒绝他的施予是正确的。但是爱德蒙先生竭力地推荐了我，于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商人送了我一桶葡萄酒和一盒甜食，供我们在去那不勒斯的路路上享用。



第二十七章

到达那不勒斯——圣亚努阿里之血——
准许建立中国学院——接受两个中国学生

刚一到达那不勒斯，就接到消息说传信部对我擅自离开岗位很不高兴。他们也反对养育五个中国人，理由是他们现在的花费都没有着落。我没有直接从利伏诺到罗马去，因为知道他们急于在自己的学院里找几个中国人，害怕会逼迫把我的给他们。不过现在我高兴地听说不用害怕这样的事情了，我受到了教宗本笃十三的召唤，向他提交了一份沉思很久的宗教群体的计划。听说我没有传信部的帮助，靠自己在从事必要的经费筹集以后，教宗立即批准，把我的请求提交给正当渠道，这样就可以进入常规程序了。因为各种充分的理由，我建议把学校建在那不勒斯，而不是罗马。传信部主任和几个枢机主教坚决反对这一点，理由是一定不允许我“建一座神坛来反对另一座神坛”。经过了大量的艰苦谈判，其目的是为了不得罪教宗，并允许我在那不勒斯开始。最后达成的默契是：保留教宗的批复，直到我想建立的学校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教宗指示传信部秘书把我推荐给那不勒斯的红衣主教，还有当地政府。他还答应一旦财政状况允许，就拨出 1000 英镑。

在罗马三个月的滞留期间，不寻常的努力使我身心俱疲，我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回到那不勒斯，我常常陷入不安和沮丧的状况中，对于能否找到执行项目所需的资助已经失望了。我开始后悔没有接受传信部为我们提供的设施条件。一直习惯于看见我的快乐神情的中国人，深为我的沮丧而不安。一天他们

来到我的房间，抱怨我是不是想抛弃他们，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牺牲，就是为了追随我。我尽可能地安慰他们，坚定他们的信仰。此后我抓住了一个机会去崇拜圣亚努阿里之血（The blood of St. January）。中国人从如此遥远的国度来接受圣教，得到他们的崇拜，这位圣人或许也是格外地满意。这些中国人将来会回到他们偶像崇拜的国家，为基督的事业流血，就像那不勒斯的圣人亚努阿里所做的那样。这次他是用非常特别的方式，愉快地安慰了中国人。在接近“大主教区宝藏”（Archiepiscopal Treasury）——以固体形式保存圣人神奇血液的地方，朋友们把我们介绍进教区办公室，我们在里面的圣坛前跪下。花了一点时间祈祷之后，“宝藏”的司牧把血捧在手上，让我们观看、抚摸和亲吻，给我们无尽的满足。他甚至允许我们用自己的手来拿那个小瓶子，随便翻转，给了我们以精神上的极端快乐。当时有一个中国人把瓶子拿在手里，我们都在看那血，那血的绝大部分原本都是干的。突然，那瓶底的血开始融化了，它不停地化，到司牧开始颂唱《啊，神》（Te Deum）的时候，那血最后全变成了液体。因为中国人仍然还穿着民族服装，所以许多人围观，早就集聚来等着看神迹的发生。他们把中国人误认为是土耳其人，目睹了这个奇迹，马上就在全那不勒斯到处传播说：有一些年轻的穆斯林信奉了天主教。这一事件，深深地教育了我的学生们，以至于几天以后我再建议他们去看另一些景致的时候，他们中有一个人不愿再去了，说看过这样的奇迹，他不会再留意其他东西了。

我在那不勒斯建立一个宗教群体的证书申请，经过教宗的特别推荐，被努西奥（Nucio）送到了总督即枢机主教奥尔坦（Altan）那里。7个月以后它被批准了，条件是除了中国本地人，还有发了誓言要到中国去当传教士的人，其他人一律不得入学，入学的权力应该属于那不勒斯行政当局。因为这个规定与我的计划不合，更有甚者，还因为罗马朝廷反对这个庇护计划，我决定去维也纳，从查理六世（Charles VI）皇帝那里取得更好的条件。我有幸受到皇帝和皇后最热情的接待，不但授予了我所

恩求的豁免，还答应每年分配给我 800 个达克特金币，给学院打基础，还有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免费搭乘奥斯坦德公司 (Ostend Company) 的船只。

不幸的是，在维也纳获得如此成功的同时，罗马方面又出现新的障碍。传信部现在声称要拥有将来学校的教授任命之前的考试权。对这种要求，那不勒斯政府是不会服从的。在这种讨厌的谈判中，三年多的时间就这么浪费掉了。权力三方最终达成了一个谅解，1732 年 4 月，在经过 7 年的忧虑和苦恼之后，我的努力终于在最幸福的成功之中，修成正果。各方面都同意：这个新的机构应该按照我的建议，由一个学院和一个教团组成。

学院有年轻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组成，用学校的钱款作花费，培养他们成为合格的职业传教士。

教团则是由教士们组成，愿意给学院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没有任何金钱上的报酬。

学院学生要做五次发愿：第一，安贫；第二，服从尊长；第三，加入圣会；第四，参加东方教会，听从传信部的调遣；第五，毕生为罗马天主教会服务，不进入任何其他社群。

教团成员不必发愿，但是除了参加学院学生的教育外，还要和团体住在一起，履行属于本机构教会的职责。

当我想尽一切办法达成这个重要安排的同时，还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克服那些不断生出来的反对我接受教宗和皇帝那笔赠款的阴谋诡计。购买一座大小合适，地点适中的房子，也是一件满困难的任务。一直要等到我和五个中国人一起用特别的方式，在 9 天里面连续向圣母玛里亚祈祷，才克服了困难。所有的麻烦都在 1732 年的 7 月 25 日得到了充分的回报，那一天我们的教团和学院开张了，到处是欢乐和喜庆。

一段时间以后，传信部送来了两个学生。为了在相似的场所遵守同样的规定，我将接待他们的仪式。

进入我们的大厅后，他们受到了我们全体同仁的拥抱和欢迎。然后我领他们进入教堂，两人一边一个，跪在高级祭坛前面。我感谢天主，让他们安全到达，然后把他们推荐给全能的天



主，把我自己交由他们，为他们服务，恳求天主协助完成我的职责。然后我们走到另一个祭坛，在它面前祈祷。结束以后，他们被带到我的房间，我洗净、亲吻他们的脚。我的首席执事持盆，次席执事持碗。最后，他们的名、姓、国籍和年龄，都被记录在登记册上。

第二十八章

两个中国学生的考试——他们去中国——
殷若望之死——尤路西奥的逃跑——逮捕和
审讯——规避和再次被抓——神秘的结尾

1733年初，我通知传信部的秘书：我的两个学生顾若望（Baptist KU）和殷若望马上就要结业了，请求为他们安排一个考试，但是拖了7个月还没有下达这个命令。最后，还是从中国传来的驱逐欧洲传教士的消息刺激了传信部的热情，于是要求我陪两个学生去罗马。考试结束后，考官们极度地满意，两个中国人在传信部当场宣誓。当时佩德哈枢机（红衣）主教（Cardinal Petra）转身对殷若望说：希望能把他培养成主教。这位年轻神父回答说：还不如让我当红衣（枢机）主教吧。枢机主教大人吃惊地看着他，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他的意思。殷若望拿过枢机主教的权仗，补充说：“我说不如当个红衣主教，并不是指穿上像大人您这样的一套外衣，而是为基督的事业，流出我的鲜血，把我自己的黑袍染红。”在场所有的人都赞美他的这个回答，并马上传遍了整个罗马。

梵蒂冈还愉快地授予了他们几项特权。受过教宗的恩泽之后，两人回到了那不勒斯。为了在服装上面暗示激励过他们的殉难者圣亚努阿里之血，他们配给的法衣用了紫红色的束带。他们由最虔诚的祈祷者陪同，开始了自己的使命。

这次远行，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深切的关注。《那不勒斯公报》（Neapolitan Gazette）表达了这种愉快：“根据从中国得到的最新说法，我们知道中国皇帝不断提高反对圣教的严厉程度，



下令驱逐了 35 个欧洲传教士，把他们流放到广州后还不满意。他还下达最严格的命令，搜查了剩余几个在北京躲藏起来的留守人员。我们还得知，已经有两个传教士被捉住。我们满意地获悉：就在天主的葡萄园——中国传教领域内的神工们被剥夺的关键时刻，我们新办学院里的两个中国学生已经作为传教使徒开赴中国去了。因为是中国人，他们不是这么容易就被捉住。我们可以指望他们在为当地同胞的良善与福祉等广大方面取得成功。”

经过非常愉快的航行，他们到达了广州，随后就离开那里奔赴目的地。他们给我写了一封介绍旅途快乐的信，是两个人的签名。打开这信，还有一张小纸条，是顾若望饱含着泪水，单独写下的。读了以后，我马上跌落到最深刻的痛苦中。纸条中说：我们最可爱的殷若望死了，祭日是 1735 年 10 月 15 日。这个消息令我心碎。后来听说我们的朋友是在中国的大江里，因为一条大鱼偶尔跳上了船来，给吓死的。他后来就高烧不退，5 天后死的。他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离开人世的，完全沉浸在对身后幸福的思想中。

在那不勒斯，从事着上面所说的旷日持久谈判的时候，我的内心常常为了一个消息而流血：某些学生在我们新兴的团体里面做着不名誉的事情，严重地破坏了学校规定。但是，我把所有因着原罪而来的痛苦交由天主来审判。开学以后不久发生了如下事情，没有人受到了哪怕是其所承受的一半的精神拷问。

那个中国神父路西奥违反了很多规定以后，又被确认是弄坏了门锁，防备上司打开，自己却用假钥匙开了别人的门，偷了 9 件衬衫、5 件短套和 6 双鞋子。这已经是该受谴责的了，更恶劣的是，他还败坏我们团体名声，说什么我们让他挨饿，轻视他，并声称如果能搞到护照，就要逃走。听说了他的行为，我就下令把他关了禁闭。但是几小时后他就失踪了，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我被告知，他躲在蒙地卡西诺(Monte Casino)教区的一个村庄里，充作助理神父，可是接收神品的条件是去当传教士。为了阻止他的紊乱生活，也为了挽回我们学院和他自己的



声誉，我给蒙地卡西诺的修道院主教写信，努力用最隐讳的方式告诉他这个人的弱点，逼他还给我们。我答应赔偿他的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不久就接到消息说，他被监禁了起来，我派了一个教士把他带了回来。

还不过3个月，路西奥又逃跑了。他在佩勒格利尼的圣三一教堂(Trinita de Pellegrini)，被我的弟弟发现了。当时我的弟弟正在做朝圣者洗尘，他也在。但是，因为路西奥装着说是短期出门，不用得到我的允许，就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给了朝圣许可证后，他实际上是在教堂里过的夜，并拒绝回到教宗的身边，借口他穿的是平民衣服。他用一份伪造的，假装是从那不勒斯教区主教那里得到的证明他教士身份的证书，在西尼加哥里亚(Sinigaglia)留了下来。然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承认了他的过错，答应改正，请求我原谅他。我回了信，他确实应该得到同情。但是，他一直是用他的不成熟来对付我，这段时间内他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和经费。如果我原谅了他，他就会丧失自己。另外，把这样的中国人从这么远的地方拉回来，困难和经费都很大。作为这个新事业的创办人，我决定送走他、惩罚他的越轨，同时我也准备了用做精神修炼的有益方法，纠正他的行为。于是我派了一个弟兄，带了一封给西尼加哥里亚副主教的信，请他转送罗马，并等罗马的回音。为了把路西奥从最终将囚禁至死的危险旅途中解救出来，我给了他打开信件的权力。

为了让路西奥因为畏惧而产生悔改意识，同时也为了鼓舞和激励他，我还请信使带了一封写着路西奥名字的信：

“按照天主的指示，向你告知我们收到了你的信。我以前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苦口婆心对你所说一切，现在都已经过去了。由于你过分自负，你绝不会相信这一点。但是你现在可以从‘天主的’(Dominus tetigit me)感觉到它。你想得到神父品级证明文书，以免于死罪，而我已经应你的要求，转送给教宗。但是他们都不能让你免于囚禁或牢狱，这种惩罚全是因为你该被诅咒的伪造罪。你又说你知道做错事了，希望得到天主的原谅，就像他原谅那些真诚悔改的人那样。但是，我们的主并不能搜索

人的心理，来相信你表白的真心诚意，尤其是在你再三地欺骗了他之后。当然，他知道你面临的危险，承受着你经历痛苦，可能真的会指引你的改造。但是，也可能直到你被猛然推入地狱的死期之前，天主仍然不被你所求。不过他是可以像父亲对儿子一样，向你提供所有的帮助。为此，天主不但可以使用他的权利来免除对你的惩罚，实际上他还向你提供了本学院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帮助。他的各项恳请，或许能让你如释重负。但是这又非常难做到，因为你自己很清楚，你已经违犯了由教宗批复，并由你每年在教会内反省的‘五项誓言’。如果你想改正自己的行为，遵守我们的规定，就一定要请天主来协助你，摆脱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

接到教宗的答复之后，安德拉达神父(Father Andrada)把信转到西尼加哥里亚，那个囚徒在那里由他照看。信里有一个判决书的副本，里面严厉地责成路西奥回到学院，给了他不得领受圣餐和暂停神事的处分。离开西尼加哥里亚两天后，他们到了罗利托，路西奥想在那里做告解。他的要求被满足了，除了告解者路西奥和安德拉达神父外，没有其他人在场。路西奥以极大的热忱和谦卑作着告解，告解神父非常满意。但是，恶魔又抓住了他，就在安德拉达神父给他做告解的时候，他又逃走了。西尼加哥里亚的主教给我送来了判决书，宣判了路西奥违犯了神品、伪造那不勒斯主教的证书，以及两次从教区逃跑叛教的罪行。教会法庭判决他在中国学院被实施12个月的监禁，教宗给了我缩短刑期的权力。路西奥的名字从我们团体的名单上划去了。但是因为获悉他正在马切拉塔(Macerata)，我就请求当地的教廷法院发布通缉令抓捕他，并答应由我来出钱支付他的费用，以免出现进一步的丑闻，并在大劫难中能够拯救他。几周以后，我获悉路西奥在佛里格诺(Foligno)被抓住了。我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传信部，目的是要进一步控告他，宣判他的罪名(Civita vecchia)成立，特别是在我确知他在密谋要逃亡日内瓦之后。借此机会，我送给传信部一份有关这个不可救药刑事犯人痛惜的详细历史。我担心传信部能否提供一个安全的监禁，

让他接受对自己罪行应有的惩罚，防止他逃跑到日内瓦和中国，这可能会导致一场可怕的灾难。此外结束他在天主教会的生活，也许可以拯救他那可怜的灵魂，靠基督之血获得救赎。

弗里格诺主教告诉安德拉达神父说，他没有地方可以关押路西奥，害怕不健全的监狱条件给路西奥带来害处，此外还有增加出来的经费。为了减轻他的痛苦，要借一张床，每天花费1便士，这使得他现在每天的花费达到了5便士。安德拉达神父给主教回信说：关于监狱的状况，他只能等待传信部的决定；关于路西奥的花费，他注意到路西奥已经被从我们团体的名单上除名了，我现在对他所做的只是一种慈善行为了。这样的话，路西奥就不能在教廷提供给其他犯人的条件之外，得到更多的东西。否则如果要他们多提供一张床，我就必须出钱。一段时间后，弗里格诺主教通知我，对路西奥的控告结案了，文件正传递给传信部。他在这里补充说，他和主教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罗马传信部的决定。体谅到这个可怜的中国人在监狱里待了二个月，教廷考虑不能让一个司牧神父睡在地上，就给他配了一张床。路西奥则苦苦地抱怨他不能生活在如此狭小简陋的地方，乞求至少每天增加一便士。但是他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

最后，我收到了传信部秘书的信，告诉我教宗已经为路西奥发了一道谕令，带他来罗马，用多种措施防止他将来再逃跑，所以任何害怕他回到中国诋毁我们教会的恐惧就消除了。

——马国贤神父在意大利的工作，就以这样一个郁闷的故事结束了。但是编者又在后面加了几页，说明了这位令人尊敬的神父死在1745年的11月22日。好几个人在不同需要的情况下，怀着真心请他作了代祷（Intercession）。他们的祈祷都灵验了。

鉴于英语读者可能会对有关马神父学院之外的一些东西有兴趣，译者就把一个德国人如下的叙述也附在这里。他是我应该感激的一个朋友。

——英译者

结 语

参观马国贤神父创办的 那不勒斯中国学院

——摘自卡尔·奥古斯特·梅叶尔博士
(Dr. Karl August Mayer)的《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Neapel und die Neapolitaner)

靠近桑尼塔桥 (Ponte della Sanita) 西北方向斜坡的一个社区内,有一座中国学院。这个名字指的是罗马传信部直属的,一个为了他们祖国培养年轻的中国人传教士和教师的宗教机构。一座高墙围着这块美丽的地方,但是每个人都能自由访问这里的教堂,以及这里正做着公开礼拜的隶属于该教堂的神父们。

进入大厅,我们发现几个人正把一个巨大的酒桶滚进地窖,我们就想到:啊,我们的传教士朋友,看起来还不满意像桑尼塔的僧侣们那样面包加三个苹果的生活。一个仆人在餐厅里——指明了这个学院的创始人马国贤神父的画像、学院所有继任教师的画像,以及几个年轻中国人的画像。画像上还注明了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过了一会儿,校长出现了,是一个高个子、温和而油滑的那不勒斯人。他说了很多次对不起,说让我们久等了。话题马上转到了马国贤身上。他是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大约200年前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在那里被任命为宫廷画家。我们听到了以下和画像有关的轶闻趣事:中国年轻人受了足够的教育,差不多懂得如何传教的时候,就回到中国去。每个年轻人在离开的时候,都被画了肖像。倘若有人死在那不勒斯,也要在死前或者刚死后画下仪容。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人的脸明显地死气沉沉。校长指给我们看一幅肖像下的注释文字,说这个

中国人在这里的学院住了多年，后来作为传教士走遍了全中国。但是他从事的工作性质被发现后，就被抓了起来，流放到鞑靼地区，死在那里。校长接下来给我们描述了中国当地教徒们的现状：皇帝残酷地迫害他们，情况极其糟糕。他还补充说，到现在他还是对最近几个离开学院，进入中国传教的年轻人怀有很大的担心。

目前学院有 8 个学生，6 个中国人，其他 2 个是希腊人。授课用拉丁文，但是学生们通过和仆人们的交往，学会了意大利文。校长本人不懂中文，新生们只能从同胞那里学了一些拉丁文后，才能跟上他的课程。

然后，我们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几个中国人出现了。他们穿着教士长袍，由导师陪着，只能根据穿戴的紫红色束带来区分他们。他们以最热情的方式欢迎我们，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观察他们的行事方式，和他们用意大利语谈话。他们的脸是黄色的，但是并不讨厌。闪亮的黑发，既直又平地盖在低矮的额头。他们小小的，奇怪地半开半合的眼睛乌黑发亮，满是活泼，还朝鬓角方向往上翘过去——这是典型的鞑靼人种的特征。他们的脸型椭圆而平坦，鼻子也平坦而短小，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轮廓。因为喜欢孩子般的玩笑幽默，他们常常大笑，露出了所有的牙齿。沉重、单调的移动方式，正好配合他们圆润、矮小的身体。他们和希腊人及意大利校长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几乎可以把这些中国人放倒，像酒桶一样地推着走。

他们给我们看了一幅中国地图，还有从自己国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只雕刻精美的木盆，他们用来放茶叶。还有一只非常可爱的著名的南京琉璃塔模型，他们很快乐地给我们作了必要的解释。我们被逼着告诉他们自己的名字，他们就用意大利文和中文，描在草纸上，作为我们的参观留念。他们使用一把蘸了墨汁 (Indian ink) 的毛笔，来写这些字。我们的名字在他们听起来是如此奇怪，引起了很大麻烦，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用一些中文里面的近音字拼读出来。

他们中有一个人念了几段翻译成中文的《新约》，听起来是

够怪，大多数字都只有一个音节。另一个人可怕地张大了嘴巴，用最不文明的调子，给我们演唱了他们的民歌。

和我们较熟的那个中国人来自北京附近地区。他们向我们提到了自己国家的气候，虽然坐落的纬度比那不勒斯更靠南，但还是相当地冷。虽然如此，他们却有意大利南部的所有水果。

接着校长带我们到了房子的漂亮阳台上，从这里，我们可以俯视城市的东北部。附近一阵可爱的风琴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听起来是属于学院的，是在花园里为学生们弹奏的。他们有时由导师陪同，到城市的各处走走。

我们问教士是否对学生们的进步感到满意。他回答说，学生们的记忆能力出色，其中一人在科学方面表现出他的喜爱和聪颖。最后我们告别了这个好人，说了很多感谢，不过我们带给学院的一点点微薄的礼物他也拒绝接受。

附 录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陈 垣 整理

李天纲 校点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影印本叙录

康熙四十四年及五十九年，罗马教王格勒门第十一两次使节来华。汉文记载极少，中国教会史对此事叙述亦极略。今所影印者十四通，皆有康熙亲笔删改，为极可宝贵之汉文史料。原存故宫懋勤殿，最先发见者为第十一及十四两通，时在民国十四年七月。其次发见者为第一至第七及十二、十三等九通，时在民国十七年三月。又次发见者为第八、第九、第十等三通，时在民国十九年二月。其所以能保存至今者，亦因有康熙朱笔，例应保存也。去年《文献丛编》第六辑，曾照康熙改稿排印一次，阅者以未见原稿为憾。今复照原稿影印，并略考定其年代次第。因其中有不著年月者，有有月无年者，颇费钩稽也。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新会陈垣识。

康熙为白晋事谕多罗朱笔第一（康熙四十五年）。何以知为康熙四十五年？因多罗到京后，移住北堂，系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第一次觐见，系在十一月十六日。康熙派沙国安、白晋赴罗马答拜，系在多罗第一次觐见之后。此云“白晋已与沙国安不和，叫回白晋何如？”知其时白晋已首途，总在康熙四十五年春初矣。

康熙朱笔谕多罗凡今年来明年去之人不得在内地居住第二（康熙四十五年。）何以知此谕在前谕之后？曰：“前日曾有上谕，多罗好了，陛见之际再谕。”即指前谕也。又曰：“今闻多罗言：‘我未必等得皇上回来。’”据《康熙实录》，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谒孝陵。十二月十九日还京。四十五年二月四日又

出巡近畿，二十九日还宫。“未必等得皇上回来”，即指康熙出巡时也。

康熙教西洋人带信与多罗说第三（排印本第四，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十六日）。何以知此三月十六日为康熙四十五年？因多罗以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出京，回澳门。此言“不如听我们的话悄悄回去罢”，知此时多罗尚未出京也。

康熙在苏州谕众西洋人第四（排印本第五，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何以知此三月十七日为康熙四十六年？因未有“俟朕回銮时，在宝塔湾同江宁府方西满等十一人一同赐票”之语，正康熙南巡驻蹕苏州时也。

康熙为多罗事传旨与众西洋人第五（排印本第三，康熙四十九年）。何以知为康熙四十九年？因其中有“多罗所写奏本，抬头错处，字眼越分，奏摺用五爪金龙”等语。据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月十四日两广总督赵弘灿奏报多罗病故摺称：“奉旨，尔等差人问哆啰，你国并无用五爪龙边之理。皇字亦非尔等之话。种种违式，与例不合。”所言与此实同一事，故知为康熙四十九年也。

康熙朱笔删改德理格、马国贤上教王书稿第六（排印本第十一，康熙五十四年）。何以知为康熙五十四年？因其中有“臣等在中国御前五年”之语。据北平西郊栅栏德理格墓碑，德理格以康熙五十年奉召进京。“在御前五年”，当为康熙五十四年也。

康熙面谕德理格并德理格誓词第七（排印本第六，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九三十日）。

康熙谕广东巡抚调查费理薄等是否系教王差使第八（康熙五十六年）。何以知为康熙五十六年？因其中有“五十五年”之语，知必在五十五年后。又有“前岁山遥瞻已病故”之语。据北平西郊栅栏山遥瞻墓碑，山遥瞻奉命往云南测绘地图，以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卒于道中。此云“前岁”，故知为五十六年也。

康熙谕新来西洋人探问艾若瑟去信消息第九（康熙五十六年）。何以定此为康熙五十六年？一因此件与前件同装一匣，且纸式字体及传旨之人大概相同。前件既在五十六年，此件亦当

相隔不远。二因艾若瑟、卢若瑟、龙安国、博贤世四人，于康熙四十六年十月派赴罗马。四十九年九月，两广总督奏：“据海关报告，龙安国于出洋时淹死，博贤世不知下落，而艾若瑟则于五十八年复航来东，患病道卒。六十一年四月遣官营葬于广州”。此云“至今数年，没有信来”，当在未得艾若瑟死信以前，故假定为五十六年。三因《异域录》载，图理琛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经俄罗斯还京，俄罗斯达喇嘛跟随来京居住。又《龙沙纪略》载俄罗斯康熙丙申岁来文，称一千七百一十六年丙申为康熙五十五年。此云“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或即于此二年间使鄂罗斯人带信去，故亦假定为五十六年也。

康熙谕利国安第十（康熙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康熙于嘉乐来时面谕西洋人第十一（排印本第十二，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康熙为德理格不写名字谕嘉乐第十二（排印本第七，康熙五十九年）。何以定此为康熙五十九年？因此言“德立格昨日不写名字”，即指《嘉乐来朝日记》末页无德立格名字也。《嘉乐来朝日记》末段称康熙已允将严档、德里格从宽不究，后因德里格不署名此日记，仍将德立格监禁，至雍正元年始行释出。此殊笔，乃康熙阅《嘉乐来朝日记》后批示嘉乐。其中两“尔”字，系指嘉乐。《嘉乐来朝日记》成于康熙五十九年年底，故定此为五十九年也。

康熙朱笔删改嘉乐来朝日记第十三（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记事）。

教王禁约译文第十四（康熙五十四年重定，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译呈）。何以知为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译呈？说见《嘉乐来朝日记》。



一、康熙为白晋事谕多罗朱笔

览多罗所奏，朕知道了。无用再谕。但白晋已与沙国安不和，叫回白晋何如？还有不尽之谕，等多罗好了陛见之际再谕。传与多罗宽心养病，不必为愁。



二、康熙朱笔谕多罗凡今年来 明年去之人不得在内地居住

前日曾有上谕，“多罗好了陛见之际再谕”。今闻多罗言“我未必等得皇上回来”之话，朕甚怜悯，所以将欲下之旨晓谕。朕所欲发旨意者，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得教化王处有关系，只得将定例先明白晓谕，命后来之人谨守法度，不能少违方好。以后凡自西洋来者，再不回去的人，许他内地居住。若今^①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许住。此等人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以服之，况且多事。更有做生意^②、跑买卖等人，益不可留住。凡各国各会皆以敬天主者，何得论彼此。一概同居同住，则永无争竞矣。为此晓谕。

① “今”原作“近”。

② “做生意”三字为后加上的，原来三字被涂去，不可辨。



三、康熙教西洋人带信与多罗说

三月十六日奏闵明我等带信劝多罗等语具奏：奉旨教西洋人带信与多罗，说你起初来时曾面奏^①过，谢恩之外，并没有甚么事。如今只管生事不已，我们在中国也不多，不在中国也不少，^②我们^③甚是无关。你当仰体皇上优待远臣恩典，自今以后，再不可听颜瑋等的言语生事。万一皇上^④有怒，将我们尽行逐去，那时^⑤如何好？你以后悔也迟了。不如听我们的话，悄悄回去罢。

① “面奏”：原为“说”，被删改。

② “不少”以下，原有“并无用着”四字，被删去。

③ “我们”以下原有“的去处”三字，被删去，改植“甚是无关”四字。

④ “皇上”下原作“恼了”，删去，改作“有怒”。

⑤ “那时”以下原作“怎么”，删去后改作“如何”。



四、康熙在苏州谕众西洋人

三月十七日直郡王张常住奏西洋人孟由义等九人请安求票并履历摺，字呈览，奉旨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因此不准尔等传教，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们遵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教你们回西洋去，朕不教你们回去。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教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教化王若说你们有罪，必定教你们回去。朕带信与他，说徐日升等在中国，服朕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教他们回去，朕断不肯将他们活打发回去。将西洋人等头割回去。^①朕如此带信去，尔教化王万一再说尔等得罪天主“杀了罢”，朕就将中国所有西洋人^②等都查出来，尽行^③将头带与西洋去。设是如此，你们的教化王也就成个教化王了。你们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尔等放心，不要害怕领票。俟朕回銮时在宝塔湾，同江宁府方西满等十一人一同赐票。钦此。

^① “将西洋人等头割回去”，原稿作“把徐日升等杀了，将头割了，与你带去”。

^② “西洋人”，原作“徐日升”

^③ “尽行”以下，原有“杀了”二字，被删去。



五、康熙为多罗事传旨与众西洋人

赵昌等传旨与众西洋人多罗所写奏本，抬头错处，字眼越分，奏摺用五爪龙。着地方官查问。再新来之人，若叫他们来，他俱不会中国的话，仍着尔等做通事，他^①心里也不服。朕意且教他^②在澳门学中国话语，以待龙安国信来时再作定夺。尔等意思如何？^③钦此。众西洋人听见圣旨即跪称：皇上如此料理，是皇上大恩，我们万万想不到如此。我们实情甚难与多罗做通事。

①② “他”，原作“他们”。“们”字均被圈去。

③ “如何”，原作“怎么样”，被圈改。

六、康熙朱笔删改德理格马国贤上教王书稿

德理格、马国贤谨启：教化王教下臣等已前难屡奉书，未曾详言。臣等西洋人在中国，皇上圣德俱一体同仁，并不分何国何会，咸恩养荣耀。即今中国随奉大皇帝，各处各国人，总不分内外。①圣德恩养，俱是一体，此乃臣等在中国御前五年亲自经历。②今中国之太平，亘古③未有如今④日也。臣等每蒙⑤诏对之际，惊⑥圣聪与人不同。中国古书极多，无一不背诵。西洋来书虽广，无一不精通，反为西洋人之师。中国书与西洋书，古人所未及者，俱发明之。圣德圣学可⑦知矣。西洋人之所闻者，不过万分之一耳。至于律吕一学，大皇帝犹彻其根源，命臣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修造新书。此书不日告成，此《律吕新书》内，凡中国、外国钟磬丝竹之乐器，分别其比例，查算其根原，改正其错讹，无一不备。西洋人受大皇帝之恩深重，无以图报，今特求教化王选极有学问，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以效⑧力，稍报万为妙。⑨前原说沙国安回西洋去时，教化王预备几人与沙国安同来。后因沙国安不曾回西洋去，此几人竟未见来求。教化王将所选之人仍着他们速来中国，则臣感激不浅矣。臣等亲听得大皇帝旨意，云：中国供牌一事，并无别意，不过是想念其父母，写其名于牌上，以不忘耳，原无写灵魂在其牌上之理。即如尔们画父母之像，以存不忘之意同也。然画“像”犹恐画有工拙，不如写其名则无错矣。至于“敬天”之字，亦不是以天即为天主，乃是举目见天，不能见天主。天主所造之物甚多，其大而在上者莫如天，是以望天存想，内怀其敬耳。其艾若瑟所奉去之旨意乃

是朕的真旨意。钦此”。此书乃是奏过大皇帝带去者。求教化王着人来时即将教化工所欲寄之书带来，一并奏大皇帝。为此特启。

- ① 以下划去“大皇帝亦不分何国之人，但看其才能授以官职”。共十九字。
- ② “亲自经历”，原作“亲眼所见者”，“眼所见者”被删去。“亲自经历”以下删去“大皇帝治国，平待各外国之人，俱如同一家”。共十七字。
- ③ “亘古”以下划去“之皇帝”三字。
- ④ “如今”以下删去“之太平”三字，改植“日”字。
- ⑤ “蒙”以下删去“大皇帝”三字。
- ⑥ “惊”之前，划去一“每”字。
- ⑦ “可”以下删去“谓自古以来未有及大皇帝者也”。改植“知矣”。
- ⑧ “效”以下算作“犬马”，划去，改作“力”。
- ⑨ “……为妙”以下，删去“前有书求教化王着人来中国，未知可曾寄到，览过否”共二十一字。

七、康熙面谕德里格并德里格 誓词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九、三十日，上召德里格同在京西洋人等，面谕德里格云：先艾若瑟带去论天主教之上谕^①，即是真的。^②你写去的书信，与旨不同。杂草参差，^③断然使不得朕的旨意，从没有改^④。又说论中国的规矩，若不随利玛窦规矩，^⑤并利玛窦以后二百年^⑥的教传不得中国，连西洋人^⑦也留不得^⑧。朕数^⑨次与尔^⑩说多罗、颜当的坏处，尔^⑪为何不将朕的旨意带信与教化王去，倒将^⑫相反的信写与教化王。尔^⑬这等写，就是你的大罪。若朕依^⑭中国的律例^⑮，其可轻饶^⑯。尔坏尔教^⑰，害^⑱了众西洋人。不但现在^⑲，并从前的西洋人，都被尔所害^⑳。这就不是天主的意思。天主常引人行好，朕尝闻西洋人说^㉑：魔鬼引人行不善^㉒。由不得他矣。今览教化王处来告示^㉓，必定是假的。朕差往罗马府去的艾若瑟回时，朕方信。信而后定夺^㉔。德里格在天主前发誓：这真是万岁下的旨意。我新来到中国，不甚懂中国的言语礼法，不识中国的字义，不曾同马国贤商量。彼时若是我带去的信有与皇上旨意相参差^㉕的话，是我错写了。如今教化王发告示来中国，断断行不得教。

① 《论天主教之上谕》，原为“论天主教的旨意”。

② “即是真的”，原句为“真是朕的旨意”。

③ “杂草参差”，原作“一个这样写，一个那样写”。被删改。

④ “从没有改”，原来句前有“只是一样”，句后有“也断乎改不的旨意就”，均被删去。

⑤ “若不随利玛窦规矩”：原作“你们若不跟着利玛窦行教”，被删改。

⑥ “二百年”以下，被删去“来的人，你们”五字。

⑦ “西洋人”，原作“你们”。



- ⑧ “留不得”以下，原有“在中国”三字，被划去。
- ⑨ “教”，原作“好几”，被圈改。
- ⑩⑪ “尔”，原作“你”，被圈改。
- ⑫ “倒将……”之前，原有“为何”二字，被删去。
- ⑬ “尔”，原作“你”，被圈改。
- ⑭ “依”，原作“以”，被圈改。
- ⑮ “律例”，原作“法律”。
- ⑯ “其可轻饶”：原作“待你们，你们如之何？”“其”：应为“岂”之误。
- ⑰ “尔坏尔教”：原作“你坏了你们的教”。
- ⑱ “害”，原作“杀”。
- ⑲ “现在”以下原有“的西洋人”四字，被删去。
- ⑳ “被尔所害”，原作“被你害了”。
- ㉑ “朕尝闻西洋人说”，原作“朕常听的”。
- ㉒ “不善”，原作“不好”。
- ㉓ “今览教化王处来告示”，原文为“这就是从魔鬼来的教化王的告示”。
- ㉔ “朕方信。信而后定夺”，原文为“朕自有定夺”。
- ㉕ “相参差”，原作“相反”。

八、康熙谕广东巡抚调查费理薄等是否系教王差使

养心殿、武英殿等处管制造带西洋人事伊都立、张常住、王道化、赵昌钦奉上谕，传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九月十六日到西洋人费理薄、何济格二人，称系教化王所差，并带来教化王奏帖一件。询其来由，并无回奏。当年所差艾若瑟传旨之事，但云教化王随即差人复命，因无真实凭据，其奏帖皇上亦未开看。费理薄、何济格二人，亦不曾着与在京西洋人见面。此二人现留在京等候，此字到日，尔等可即速将此二人来历问^①明回奏。又先年西洋来^②山遥瞻、德里格、马国贤三人，自称系教化王差来之人，皇上待之甚厚^③。前岁^④山遥瞻已病故，德里格、马国贤二人看其行止亦不似教化王差来之人。此二人果系教化王所差否，查明回话^⑤。再五十五年曾有教化王带来《禁约》告示一件到山东省。因此告示可疑^⑥，皇上故发红票去。此告示^⑦果系教化王带来，或真或假，一并查明回奏。

① “问”，原作“查”。被改动。

② “又先年西洋来”，原作“再先自西洋来”。

③ “甚厚”，原作：“甚有体面”。

④ “前岁”，原作“今”。

⑤ “查明回话”，系后来插入添加。

⑥ “可疑”前原有“悖理”二字，被删去。

⑦ “告示”之前原有“带来”二字，被删去。



九、康熙谕新来西洋人探问艾若瑟去信消息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年^①已曾差西洋人□□□、□□□、□□□、□□□^②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③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④差去人回时^⑤，事情都明白之后^⑥，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⑦甚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⑧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

① 纪年空阙，应为“四十六年”，本年艾若瑟赴罗马。

② 人名空阙，应为“艾若瑟、卢若瑟、龙安国、博贤世”。该四人同年赴罗马。

③ “又有乱来之信”：原文为“书信只管乱来。”

④ “必竟我等”原文为“必定我们”。

⑤ “回时”，原作“回来”。

⑥ “之后”，原作“了”。

⑦ “虽有”，原作“随他”。

⑧ “唯”，原作“还”。



十、康熙谕利国安

康熙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福建住堂西洋人利国安赴京陛见。奉上面谕：利国安并众西洋人等，尔西洋人之事，朕前后旨意俱无分别^①。先年^②发去上谕并红字^③旨意，并向年面谕多罗，俱是一旨。尔等来中国者^④，有优劣不等^⑤。利国安系新会长，以后^⑥西洋来信必先奏闻，毋得隐讳。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⑦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⑧，断不姑留^⑨。

① “分别”，原作“两样”。

② “先年”，原作“前年”。

③ “红字”前“上谕并”三字为后来添加。

④ “来中国者”，原文为“来中国众人内”。

⑤ “有优劣不等”，原为“有优有劣”。后接“亦有最不堪者尔”，被删去。

⑥ “以后”，原文作“如有”。

⑦ “在中国亦无用处”，系后来添加。

⑧ “逐回”后原有“各国”二字被删去。

⑨ “断不姑留”，后原有“此谕”二字，被删去。

十一、康熙于嘉乐来时面谕西洋人

谕西洋人：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召西洋人苏霖、白晋、巴多明、穆敬远、戴进贤、严嘉乐、麦大成、倪天爵、汤尚贤、雷孝思、冯秉正、马国贤、费隍、罗怀忠、安泰、徐茂盛、张安多、殷弘绪至乾清宫西暖阁。上面谕：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①，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②。朕因矜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③，使尔等各献其^④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⑤致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因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⑥。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⑦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⑧。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跪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据尔众西洋人修道，起^⑨意原为以灵魂归依天主，所以苦持终身，为灵魂永远之事^⑩。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⑪。譬如幼稚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诚动于中，形于外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⑫哀恸。倘^⑬置之不问，即^⑭不如物类矣，又何足与较量中国敬孔子乎？圣人以^⑮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⑯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尔西洋亦有圣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多罗、阎当等知识扁浅^⑰，何

足言天，何知尊圣？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⑬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今尔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共同答应，中国行教俱遵利玛窦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安，谢皇上爱养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奏皇上。我等不能应对，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又^⑭致紊乱是非^⑮。各宜凛遵，为此特谕^⑯。

① “二百余年”，前原有“修道”二字，被删去。

② 本句原文为：“尔等自西洋航海九万里投来，情愿效力”。原文下句“率非俘获之人”，亦被删去。

③ 本句原文为“以示中国之大，何所不容”。

④ “其”：原作“微”，被圈改。

⑤ “优容”以下删去“亦寓中外一家之意，改植“敦意”二字。

⑥ “妄诞议论”至“亦为可恕”，原文为：“妄诞之言，假若阁当若深通中国文理，亦为可恕。”后经删改，今从。

⑦ “目不识丁”，原作“字也不识”；“如何轻论”，原作“如何讲得”。

⑧ “不可敬天……等语”，原文删改前为：“不可敬天，此即大不通之论，譬如上表章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

⑨ “起”：原为“其”，被删改。

⑩ “为灵魂永远之事”；前删去“不过”二字；其后删去“其他无甚奥义”六字。

⑪ “父母养育”，原作“父母所在”。

⑫ “自”，原作“必”。

⑬ “倘”，原作“如”。

⑭ “即”，原作“乃”。

⑮ “敬孔子乎，圣人以……”；原句为“敬孔子，盖因孔子以……”。

⑯ “使人”以下，原作“尊君、秉上、作忠、移孝，此……”。

⑰ “知识庸浅”；原作“井蛙之见”。

⑱ “赖”，原作“稽”。

⑲ “又”，原作“以”。

⑳ “是非”，原作“尔等”。

㉑ “特谕”以下原有“欽此”二字，被删去。



十二、康熙为德理格不写名字 谕嘉乐

德理格乃无知光棍之类小人。昨日不写名字，甚属犯中国之罪人。即尔在御前面谕之际，每每关系自己之事，即推开叫别人传说。此等奸人，中国少见。看此先景，恐有带信去，又是一件令教王疑惑难辨严档之事。朕已保全，令尔体面。今只得要严档完此犯中国之罪。大约西洋之叫^①，不可行于中国，不如不行。诸事平稳，亦无争竞。良法莫过于此。

^① 原文如此，以“叫”代“教”，污辱之词。



十三、康熙朱笔删改《嘉乐来朝日记》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员外郎李秉忠奏：西洋教王差人嘉乐于明日当至寰店，上差伊都立、赵昌、李国屏、李秉忠：“尔等前去传旨与嘉乐。尔九万里远来，称系教王使臣，真假莫辨。因问在京众西洋人，俱云真是教王所使。朕轸念远来，且系外国使臣，朕必曲赐优容以示柔远至意。尔在广东并在途中，但云：‘教王差臣嘉乐请皇上安，谢皇上爱养西人重恩。’并无别事语言关系体面，前后不可增减。况目今鄂罗斯国使臣并各国之人俱现在京师，尔倘有他说临时更变，关系尔之体面，本应着在京众西洋人前去迎尔。因事体尚未明白，故未遣去。传此旨时，众西洋人俱在御前公听。钦此。”伊都立、赵昌、李国屏、李秉忠于二十六日至琉璃河，传旨与嘉乐。嘉乐跪请皇上圣安。讷随奏云：“远臣嘉乐，实是教王所使。教王使臣请皇上安，求皇上隆恩有两件事。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臣管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中国人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此二件求代为转奏。”

伊都立、赵昌、李国屏、李秉忠于二十七日回奏：奉旨：“尔等传旨与嘉乐。尔教王所求二事，朕俱俯赐允准。但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此即准尔教王所求之二事。此旨既传，尔亦不可再行乞

恩渎奏。尔若无此事，明日即着尔陛见。因有此更端，故着尔在拱极城且住。再严档原系起事端之人，尔怎不带他同来？钦此。”于本日至拱极城传此旨与嘉乐，并赐克食。嘉乐无言回奏，哀泣求皇上隆恩，将教王表章求皇上赐览。臣嘉乐默祷天主，开导我心，再回奏此二件事，求代为转奏。于二十八日回奏，奉旨：“尔等仍去传旨与嘉乐。朕之旨意前后无二，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教王表章，朕亦不览。西洋人在中国行不得教，朕必严行禁止。本应命尔入京陛见，因道理不合，又生争端，尔于此即回去，明日着在京众西洋人于拱极城送尔。西洋人中有不会技艺之人，尔俱带去。再尔等问嘉乐带来会技艺之九人，伊等情愿效力者，朕留用。不愿在中国者即同回去，朕不强留。钦此。”

本日至拱极城传此旨与嘉乐。嘉乐叩首流涕，奏称：“臣自西洋九万里奉教王命远来，臣福分浅薄，不能一覲天颜。教王表章不能上达天听，臣之福薄。臣何敢再多言，但臣哀恳皇上天恩。臣一路海中来，身体疲惫，容臣候至明年开河时于水路回广东去，未知可否？求代为转奏。”随遵旨问：会技艺之九人，独会天文之陆嘉爵一人愿同嘉乐回去，其余八人俱愿在中国与皇上效力。于二十九日回奏，奉旨：“尔等仍去传旨与嘉乐。先严档、德里格等不通小人，妄带书信，以致坏事。朕因教王使臣到广东，地方督抚并差去员外郎李秉忠俱奏称：使臣言语顺当，毫无他说。朕已经于众西洋人前面谕严档之罪，朕不再问，即德里格亦从宽恕。德里格^①已经谢恩，众西洋人亦感激涕零，同谢朕恩。不意尔如此辩论是非，又致生事。朕今以国法从事，务必勅尔教主将严档送来中国正法，以正妄言之罪。德里格之罪，朕亦必声明，以彰国典。且尔系白多罗会之人，此事原因白多罗会之严档、德里格与耶苏会等众人争辨成隙，以致坏事。尔教王办事必当从公，似此当将西洋各国各会，每会遣一人来议论方是。又遣尔白多罗之人来争论生事，分明存私，公道何在？尔有何辨处？尔西洋人不通中国诗书，不解中国文义，如何妄辨中国道理。钦此。”

本日至拱极城传此旨与嘉乐。嘉乐俯伏，叩首泣奏：“臣无他说，只求皇上隆恩，将教王表章并发来禁止《条约》赐览。其中有合中国道理者，求皇上准令人教之人依行。有不合中国道理者，亦求皇上明示。臣嘉乐系使来之人，不能违教王命。能遵旨改正者，臣即遵旨奉行。臣不能自己改正者，臣即寄字与教王，明白传皇上旨意。涕泣俯伏，求代为转奏。”本日回奏，奉旨：“着李秉忠向嘉乐将教王表章底稿并《条约》底稿要来朕览。伊系使臣，其表章并《条约》内言词，伊必知道。倘无有底稿，可着伊将记得的写来呈奏。钦此。”本日，御前太监陈福又传旨：“着将西洋使臣嘉乐并随来众西洋人等，俱移来在五哥房内暂住。钦此。”

十二月初一日，员外郎李秉忠向嘉乐处要来教王表章底稿一张，《条约》底稿一张，俱西洋字。着在京众西洋人共同译出呈奏，奉旨：“尔等传旨与嘉乐。览此尔教王必交与尔有两样表章、《条约》，命尔到中国见朕呈奏。尔既如此吁恳朕恩，朕将严档、德里格等俱从宽免究。但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西洋人所可妄论。朕念教王使臣于后日令尔陛见，明日着御前侍卫存问，并在京众西洋人俱去看尔。钦此。”

于十二月初二日，上遣乾清门头等侍卫宗室勒什亨、御前侍卫佛伦莱保存问嘉乐。伊都立、赵昌、李国屏、李秉忠等领在京众西洋人，以西洋礼相见。嘉乐于侍卫前跪请圣安，叩头谢恩。讷随奏：“臣奉教王命来中国，蒙皇上念教王所使，特遣宗室大臣等存问远臣，恩难言述，臣感激之至。但臣在西洋，不知严档、德里格之事。臣今闻此旨意，方得知道。且臣得覲天颜，喜不自胜。臣惟有凡事遵旨，求皇上教导。”奏毕，向在京众西洋人云：“我奉教王命，远来中国，谕尔众人，当同心和睦，勿生争竞，仰报皇上历年蒙养隆恩。”

次日初三日，上御九经三事殿，筵宴嘉乐。嘉乐着本国服色，于丹陛下进教王表章。上特命引至御前，亲接其表。嘉乐行三跪九叩礼毕，命坐于西班牙头等大人之次。赐上用克食，上亲赐酒一爵，问嘉乐云：“朕览尔西洋图画内有生羽翼之人，是何道

理？”嘉乐奏云：“此系寓意天神灵速，如有羽翼，非真有生羽翼之人。”上随谕：“中国人不解西洋字义，故不便辨尔西洋事理。尔西洋人不解中国字义，如何妄论中国道理之是非？朕此问即此意也。”于殿庑下着伊都立等赐随来西洋人酒各一爵。上念天寒，外国衣服甚薄，赐嘉乐亲御貂褂一件。宴毕，上回宫。嘉乐谢恩而退。

十二月初五日，西洋使臣嘉乐进献教王所贡方物。上赐嘉乐鼻烟壶一个，火镰包一个，荷包四个，法郎碗二个，葫芦瓶一个。复传旨问嘉乐：“尔教王遣尔远来。朕念远人，特赐尔殊恩，尔亦当先遣人回西洋通知尔教王方是。”嘉乐随奏：“臣来中国，蒙皇上隆恩有加无已，臣亦甚愿先遣人回西洋通知教王，俾教王闻之心喜，益感隆恩。”随谢恩而出。

十二月初六日，上赐嘉乐貂冠一顶，青欣袍一件，里衣二件，靴袜全分。十二月初七日，嘉乐进献方物。上赐克食。十二月十二日，上遣伊都立、赵昌：“尔等传旨与嘉乐，伊欲先差人回西洋去，当即料理遣人驰驿往广东趁明岁二月回小西洋船起程之便回去，迟则不及矣。钦此。”本日传旨与嘉乐。嘉乐随奏：“臣前日原奏过，欲差人回西洋去，但不曾听明皇上旨意。臣于明日求皇上赐臣陛见教导，以便寄书与教王。”本日回奏，奉旨：“明日着嘉乐来。钦此。”

十二月十三日，上召西洋使臣嘉乐同众西洋人至清溪书屋。上面谕嘉乐：“尔当于随尔来人中出二人回西洋去，传谕朕恩。朕旨意无多语，一教王遣尔来谢恩，朕深嘉念。二教王遣尔来请安，朕躬康健，尔等所目睹。三教王所贡方物，朕念远人胥服之情，俯赐存留。只此三事，当写出与尔，以便尔译西洋字寄去。钦此。”写出上谕一件。

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帝上谕：“意达里亚国教王所差使臣嘉乐，于十二月初三日到来，请朕躬安，兼谢朕历年爱养西洋人重恩。朕軫念西洋距中国九万里，自古及今，从无通贡，兹尔教王竭诚遣使远来，殊属可嘉。尔使臣嘉乐朕念系教王所差，特锡殊恩，备加荣宠。兹因使臣嘉乐遣人回西洋，特寄赐

教王玩物数种,以示怀柔至意。特谕。”

十二月十七日,上又召西洋使臣嘉乐,同带来众西洋人并在京众西洋人至渊鉴斋。上面问嘉乐:“尔系教王所使大臣,有何辩论道理之处,尔当面奏。中国说话直言无隐,不似尔西洋人曲折隐藏。朕今日旨意语言必重,且尔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朕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即始利玛窦以来,在中国传教有何不合尔教之处?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如有悖尔教之处,尔当带回西洋,照尔教例处分。尔逐一回奏。”嘉乐随奏:“利玛窦在中国有不合教之事,即如供牌位与称天为上帝,此即不合教处。”上谕嘉乐:“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后人尊敬之意,并无异端之说。呼天为上帝,即如称朕为万岁,称朕为皇上。称呼虽异,敬君之心则一。如必以为自开辟以至如今,止七千六百余年,尚未至万年,不呼朕为万岁,可乎?且此等事甚小,只合向该管衙门地方官员处议论,不合在朕前渎奏。”嘉乐随俯伏叩首,奏称:“臣嘉乐哀恳皇上,教王使臣来中国,止为请皇上安、谢恩,并不许臣辩论中国道理。臣亦不敢辩论,臣惟有嘱咐众西洋人同心和睦,竭力报效,仰答皇上隆恩,于天主前保佑皇上万寿无疆。”上谕嘉乐:“尔此奏甚是,尔如再辨,朕必与尔辩论至极。^②据尔所奏之言,事体可以明白。再严档等不通小人,妄带书信,颠倒是非,委屈当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罗丽山、徐日升等旧西洋人行悖教之事。如此妄书妄信,亦当不必再存。伊等负屈,朕深怜悯。”嘉乐随奏:“臣亲聆天语,得知皇上怜念旧人莫大之恩,仍求皇上宽恕妄带书信小人之罪,臣不胜感激之至。”因率新旧众西洋人谢恩讫。

本日奉旨:“尔等可将嘉乐遣人回西洋去之事定议具奏。钦此。”于十二月十八日,伊都立、张常住、赵昌、李国屏、李秉忠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据嘉乐奏称‘教王使臣来中国,得觐天颜,臣受皇上殊恩,有加无已。臣甚愿寄字与教王去差随臣来利若瑟、罗本多二人回去’等语。今将嘉乐通知教王之书,着嘉乐

写出，交与旧西洋人等译出呈览过，再行寄去。其利若瑟、罗本多往广东，云现有广东总督巡抚之人在此，即将利若瑟、罗本多交与总督巡抚之人照管，由驿站送去，仍寄字与总督巡抚。利若瑟、罗本多到时于明年二月内趁回小西洋船之便，将利若瑟、罗本多急速照看起程可也。谨此奏闻，请旨，用清字摺奏。”奉旨：“知道了，钦此。”是日在御前通事，众西洋人言语参差，彼此错乱，各存私意，将旨意不能尽传与嘉乐。嘉乐回奏之言不能明白奏上。德里格、马国贤等以为皇上俯允教王所请，着入天主教之人俱依教王所定《条约》行，与嘉乐称贺，嘉乐亦偏信德里格、马国贤之言，中心摇动。先是上曾面谕嘉乐，云：“在中国众西洋人中，耶苏会之人与白多罗会之人彼此不和，各成党隙。尔勿偏信一面之言，尔当执定主见，信朕之言方是。”至是嘉乐不能辨别，心持两端。

上于二十日遣伊都立、赵昌传旨与嘉乐：“尔前日在朕前，亲见众西洋人言语参差，不成规矩。朕之旨意，通事之人不能尽传与尔。尔回奏之言，又加私意上奏。言语不同，事体不能明白，作何处置方可明白，尔当回奏。钦此。”本日传此旨与嘉乐。嘉乐回奏：“通事众西洋人不能明白传旨与臣，臣回奏之言不能尽达天听。臣深以为苦，但臣无他意，凡事只有遵旨而行。臣有带来教王《条约》一件，求皇上命众西洋人译出，赐览。有与中国道理相合者，求皇上批准。有不合中国道理者，亦求皇上批示，以便寄信与教王去。”本日回奏，奉旨：“尔等可将众西洋人俱带往嘉乐处，将教王《条约》译出呈奏。钦此。”

于次日，将众西洋人俱带至嘉乐处，将教王《条约》译出汉字摺一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呈览。奉上朱批：“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本日持朱批旨意，传与嘉乐。御前太监陈福又传旨：“朕前日已有旨意辩论道理，语言必重，以后亦不令尔陛见。尔有回奏之言，可写字奏朕。先

前亦曾面谕，尔当执定主见，不可摇动。尔今如此偏信坏事小人之言，欲传此悖理之《条约》，中国断使不得。尔既要辩论，必与尔辩论到底。况目今鄂罗斯国使臣现在京师，朕必将朕前后旨意，并尔辩论之言照先样刷印红票付鄂罗斯，并广东船上，俱带往西洋去，传示西洋各国，自有公论。钦此。”嘉乐闻此旨意，惶惧之至，随写西洋字回奏之言。又跪奏，云：“臣嘉乐来时，教王还付与臣《条约》解说一张，已经奏过，仍求皇上再赐全览。臣能遵旨行者即遵旨行，臣力量不能改正者，求皇上令臣回西洋去传与教王，臣必亲身作速回来复命。臣再无他说，惟有哀恳皇上隆恩。”

本日将西洋字着众西洋人译出，于二十二日同先译出教王《条约》解说汉字摺一件呈奏。奉上朱批：“朕理事最久，事之是非真假可以明白。此数条都是严档当日御前数日讲过使不得的话。他本人不识中国五十个字，轻重不晓，辞穷理屈，敢怒而不敢言，恐其中国致于死罪，不别而逃回西洋，搬闾是非，惑乱众心，乃天主教之大罪，中国之反叛。览此几句，全是严档之当日奏的事，并无一字有差。严档若是正人，何苦不来辨别。况中国所使之人，一字不回，都暗害杀死。而且严档之不通，讹字错写，被中国大小寒心，方知佛道各种之异端相同乎？钦此。”本日又奉旨：“尔等传与嘉乐：尔教王《条约》内指中国敬天拜孔子诸事有异端之意，尔不通中国文理，不知《佛经》、《道藏》之言，即如尔名‘嘉乐’，乃阿杂里喇嘛之言，先来之‘多罗’系佛经多罗摩河萨内之字。称天主为造万物之主，乃《道藏》内^③诸真诰内之语。朕无书不览，所以即能辨别尔等西洋人一字不识，一句不通，开口非《佛经》即《道藏》异端小教之言^④，如何倒指孔子道理为异端，殊属悖理。且中国称天为上帝，大小之人皆一样称呼，并无别说。尔西洋呼天主为‘陡斯’，乃意达理亚国之言，别国称呼又异。况‘陡斯’亦与蒙古话相同，即此一端，敬天之事孰重孰轻？在中国之众西洋人，并无一人通中国文理者。惟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义，亦尚未通。既是天主教不许流入异端，白晋读中国书即是异端，即为反教。尔系教王使臣，着尔来中国办事，尔即

当将白晋拿到天主堂聚齐。鄂罗斯国之人，并京中大小人等同看，着令尔偏信之德里格、马国贤动手，将白晋烧死，明正其反教之罪，将天主堂拆毁。再天主堂内，因当日旧西洋人汤若望曾在先帝时效力，因世祖曾赐匾额，朕亦赐有匾额。既是与尔教不合，尔亦当将匾额毁坏，方为办事。且尔偏信德里格、马国贤一偏之言，德里格曾在中国行不合尔教之事，于五十四年内曾告过赵昌、王道化。其告人之字现在，尔等可带去同众西洋人着德里格翻与嘉乐看，朕必将前后事体明白写出，刷印红票付鄂罗斯带去，传与西洋各国。钦此。”随将朱批旨意并口传之旨，传与嘉乐。嘉乐恐惧之至，不能答应，跪奏，云：“皇上圣学渊深，无书不览，故能辨别西洋人等一字不通，错处甚多。臣惟有哀恳皇上隆恩，随写西洋字回奏之言。本日着众西洋人译出，于二十三日呈奏。”

上召嘉乐并众西洋人等至清溪书屋，面传谕旨：“朕先已有旨，辩论道理，语言必重。尔西洋人自己流人异端之处，自己不知，反指中国道理为异端。及至辩论之际，一字又不能回答。且中国称上帝，人人皆知，无不敬畏。即朕躬膺大宝，凡事法天，罔敢或敷。六十年来，朝乾夕惕，祇承帝命。中国敬天之道如此，岂尔西洋只知为造物主区区祈福求安者所可比拟哉？况祈福求安，与佛道之理^⑤何异？尔既再四哀恳，准尔少息二三日，再写明回奏。钦此。”

先是耶苏会会长，福建住堂西洋人利国安于五十八年曾自福建来陛见。至是利国安闻西洋使臣来，即往广东煽惑使臣，仍潜至京师藏于西洋人坟所。上廉知其实，于本月二十一日传旨与提督隆科多，着将利国安查拿。于二十二日隆科多将利国安拿到，奏闻伊都立等奉旨：“尔等将利国安带往嘉乐处，讯其藏匿之由，务必将德里格告人之字翻与嘉乐看。钦此。”于二十二日将利国安带至嘉乐处，讯其藏匿之由，取得利国安口供一摺，于二十三日呈奏，讫将德里格告人之字于二十三日着众西洋人译出与嘉乐看毕，嘉乐跪奏，云：“告人一事，与天主教不合，即所告是实亦不可。况虚捏之词，益为不合。再臣嘉乐蒙皇上殊



恩，有加无已。今又承恩旨，着臣休息二三日再奏。臣窃思此事不可缓，臣于今日即写回奏之字，求于明日呈奏。”本日嘉乐随写西洋字回奏之言，着众西洋人译出，于二十四日呈奏。

上召嘉乐并众西洋人等至清溪书屋，面传谕旨：严档、德里格等俱系不通小人。朕先已有旨将严档、德里格之罪俱从宽不究。尔嘉乐偏信伊等之言，欲传教王《条约》。其《条约》之词俱系严档当日在朕前讲过的话，明系严档在西洋搬闾是非，以致教王心疑，将向年所差艾若瑟之事一字不回，仍欲传此《条约》。朕此番故将严档之罪声明，将德里格告人之字译与尔看，此《条约》内之言，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断使不得。尔既如此再三哀恳，朕将严档、德里格等之事仍从宽不究。嘉乐一闻此旨，感激涕零，叩首不已。随嘉乐来众西洋人无不心悦诚服，翕然称善。嘉乐复叩首，奏云：“利国安之罪亦求皇上概从宽恕，一视同仁。”俯伏在地，随奉旨：“尔既如此求恩，利国安朕亦从宽释放。尔欲传朕旨与教王，尔欲遣人回去，或尔自欲回去。”嘉乐复叩首，奏云：“臣自己回去传皇上旨意，方能明白。求皇上隆恩，命臣自己回去。”奉旨：“目今蒞近，尔于明岁再定回去日期。今事体俱已明白，朕之旨意尔亦全晓。尔系使臣，辩论道理之时，朕必直言无隐。尔既不复争辨，朕仍前优待。朕原视中外为一家，不分彼此，尔可少息一二日。京城内天主堂随尔便居住，以副朕怀柔至意。钦此。”

苏霖、穆敬远、林纪格、郎石宁、倪天爵、严嘉乐、戴进贤、巴多明、白晋、雷孝思、冯秉正、马国贤、莫大成、费隐、罗怀忠、张安多、李若瑟、徐茂盛

① 德里格即德里格，下同。

② “至极”，原文为“到底”，被圈改。

③ “《道藏》内”，以下划去“《圣经》第三卷”五字。

④ “即《道藏》异端小教之言”，原文为“即《道藏》内异端之言。”

⑤ “佛道之理”，原文为“佛道之异端”。

十四、教王禁约译文并康熙 朱批

禁约

教王第十一格勒门得,传为永远,世世悉知之事。自从我作教王第一日以至今,我料理诸事虽多,至于众西洋人在中国互相争论,此系我第一件要紧事。在中国众西洋人,因看见中国有几个字,还有几件礼,也有说此有异端之事,也有说此无异端之事,因此争论寄信与我,彼此相告,要我自己决断。我所定夺,叫他们众西洋人一心一意。此一件事从先前在位教王第十二般诺深爵料理起首,因他亡故,此事到我跟前。我将两边所告言词细细详审后,于天主降生一千七百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内)俱已定夺,开写于后:

一、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扁,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悬挂。

一、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人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人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

一、凡人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子庙行礼。

一、凡人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

一、凡人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

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再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

一、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还使得。

一、凡人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文指牌位上边说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以上我虽如此定夺，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礼，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与不可行之礼，俱由教王之使臣定夺。若教王之使臣不在中国，有主事之人同主教之人，即可定夺。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俱决断不行。

天主降生一千七百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内），以上禁止条约之礼屡次查明之后，仍定夺照此禁止条约遵行。再我差使臣多罗于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内），在中国亦如此定夺，照此禁止条约遵行。我所禁止之事如此而已，我教王自今以后不论你们大人小人之言语，我俱不听信。于天主降生一千七百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内），我已定夺主意，诸事俱各完毕。还有人不肯顺从，我闻得在中国西洋人，也有说我自己把我发的票禁止不行，也有说此票不明，也有说此票之解说还未到中国，也有说于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位教王第七亚勒桑多准行此禁止条约之礼等语。以上之言，我心甚是不悦。因此我于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一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内）又写此禁止条约带去，申明严示在中国之众西洋人悉知，即便遵行。如或不然，我依天主教之罚处之。自今以后，凡西洋人在中国传教或再有往中国去传教者，必然于未传教之先在天主台前发誓，谨守此禁止条约之礼。随后即将发



誓之音信寄到罗马府来。

康熙朱批：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同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